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杨虎城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盛世才 杜聿明 胡宗南 白崇禧 阎锡山 冯玉祥 孔祥熙 杨虎城 张学良 李宗仁 蒋经国 蒋介石

离冯附蒋，又如何与中共蛛丝暗联？
谁“罢谏”？谁“兵谏”？
西安事变的幕后台前
蒋介石为何两次召见？
欲擒故纵？还是调虎离山？
出国考察的前因后果
为何被囚12年？
多次化险为夷，是蒋介石良心发现？
囚禁岁月里的真实与谎言
见证人的生动口述
凝固历史书瞬间的真实图片
将带你穿越时空隧道
置身悲壮的历史现场……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ISBN 7-5034-1337-9



9 787503 413377 >

ISBN7-5034-1337-9/K·0914

定价：15.00 元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杨虎城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文思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34-1337-9

I. 我… II. 文… III. 杨虎城 (1893~1949) —生平
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25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875 字数: 223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经略西北…………… (1)

15 岁时，父亲被清政府处以绞刑，杨虎城将父亲的尸体埋葬后，不久便约集志同道合的弟兄们上了山，由一杆枪到一个营，到主政陕甘、威震西北。他明里附蒋，暗中却与共产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发起“中秋会”，劫贪官，除恶霸，声震四方 … (1)

二、组织靖国军，参加北伐，卷入派系纷争…………… (4)

三、远走日本，养精蓄锐…………… (23)

四、离冯附蒋，经略西北…………… (30)

五、筹建反蒋基地，与中共蛛丝暗结…………… (60)

第二章 西安事变…………… (92)

1935 年，张学良率东北军到西安，张、杨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与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张、杨联手，发动“兵谏”。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改变，张、杨的命运也因此改写……

一、蒋介石完成“剿共”策划，内战危机空前…………… (92)

二、先“哭谏”，后“兵谏”，发动西安事变…………… (103)

三、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 (129)

- 四、国民党耍手腕分化瓦解，西安城四面楚歌…………… (132)
- 五、投机者利欲熏心，杨母被扣作人质…………… (141)

第三章 欧美之行…………… (164)

蒋介石对杨虎城恨之入骨，但一时又莫可奈何，只好玩起惯用的手段，让杨出国。一方面，眼不见心不烦；另一方面，先调虎离山，再慢慢想出惩治办法……

- 一、陈立夫暗中策划刺杀未遂…………… (164)
- 二、蒋介石两次召见，明拉暗打…………… (170)
- 三、无孔不入，杨夫人上海遇险…………… (176)
- 四、调虎离山，被迫出国军事考察…………… (184)
- 五、遥望家国烽烟起，被羁他乡空忧愤…………… (203)

第四章 囚禁岁月…………… (229)

烽烟中的祖国，使杨虎城再也无心考察。他自动归国，主动请缨，但等待他的，却是漫漫无涯的囚禁岁月……

- 一、抗日心切，岂料甫归国即被软禁…………… (229)
- 二、要求一次抗战，加重一次惩罚…………… (238)
- 三、杨夫人主动陪囚，监中受尽非人折磨…………… (244)
- 四、狱中 12 年，把栏杆拍断，壮志难酬…………… (251)
- 五、一家五口被杀，蒋介石终报西安半月之仇…………… (262)

深情缅怀…………… (269)

- 我的父亲杨虎城…………… (269)
- 回忆我的父亲杨虎城…………… (275)
- 纪念母亲谢葆真…………… (278)

第一章 经略西北

15岁时，父亲被清政府处以绞刑，杨虎城将父亲的尸体埋葬后，不久便约集志同道合的弟兄们上了山，由一杆枪到一个营，到主政陕甘、威震西北。他明里附蒋，暗中却与共产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发起“中秋会”，劫贪官，除恶霸，声震四方

孙荷伯（曾任杨虎城部连长）等口述：

杨虎城将军出生于贫农家庭，在蒲城东乡甘北村。原来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没有牲口、车辆，父亲杨复兴，在孙镇做木工，维持全家生活。伯父杨全兴，虽出身农民，在清末即有革命思想，参加了反满的秘密会党——哥老会，人称“大爷”。因为杨全兴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反满革命活动，清政府派人搜捕多次未获，却把杨虎城的父亲杨复兴捕去顶案，被处绞刑，殉难于西安。杨虎城当时才十四五岁，在亲友的协助下，去西安将父亲的尸体搬回安葬，时间约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不久，杨全兴也被捉去打死。所以，杨虎城将军从小即对反动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孕育了坚决革命的思想。以后杨虎城将军能干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与此有很大关系。

杨虎城的父亲和伯父殉难后，家中只有老母和幼弟（茂三），生活十分困难，因他当时年龄还小，不得已便去孙镇孙家饭馆做童工，但他时刻念念不忘替父报仇。有一次，母亲给他一些烂铁，叫他去打一把镢头，他却打了铁瓦子，拴在腿上，锻炼跑路吃苦的本领，以便为将来从戎奔走。杨虎城的母亲孙太夫人，教子很严。杨虎城侍母也至孝，他一生的事业，与家庭的教养是分不开的。

杨虎城在孙镇饭馆当堂倌时，即和伙友孙荷伯及乡友孙福全、孙书友、孙友儿等结拜，并参加反满的哥老会。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中秋同志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历史上，汉民族驱逐元朝封建统治者，是在中秋节日起义的，所以这个组织的革命性质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韩寅生、左胜娃、姬汇百等，因为活动秘密，这个组织的参加人员又大半逝去，其活动详情已无从考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九月初四蒲城也发生动乱。杨虎城看见革命时机成熟，便联系同志百余人，前往乾州，参加向字营，以便进行最实际的革命运动。1912年（民国元年）向字营解散后，杨虎城又返回蒲城，仍在孙镇饭馆安身，但始终不忘革命，时刻想着为民除害。当时，东乡有个恶霸劣绅李桢，借给商人包收烂账机会，在石羊、黎起一带强拆民房，抢拉牲口，胡作非为，行同土匪。农民们恨之入骨，叫他“黑豆虫”。但因其投靠地方有势力的郭坚与岳西峰等，一般人都不敢惹他。杨虎城当时虽然只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却胆识过人，决心为民除害。因自己力量单薄，经段廷朝、冯进喜、胡遂太介绍，和哥老会有势力的李子高认识结拜，并到洛河东借了绰号“倒棺”的一枝马拐子枪，1914年秋天（约八九月），装着给李桢去送信，到孙镇李桢住的粮店，见了李桢先说：“有人给你捎一封信。”便敏捷机

智地从套裤里抽出枪来，一下子把李桢打死，为地方除了一个大霸。杨虎城这次侠义壮举，使得人心大快，他的名声也很快传遍四乡。

辛亥革命后，各乡纷纷发动民众，办理民团。杨虎城在打死李桢后，一方面有了名气，一方面也有了一把子人和部分枪支。孙镇区长孙梅臣便呈请县上，委派杨虎城为东乡民团总团长，管辖东乡 12 个分联，经常集中训练、检阅民团武力。当时东乡的高林股匪，有六七支枪，在永丰川一带抢劫，危害乡里，孙梅臣也无法消灭。杨虎城任团总后，便和李子高、李云城、孙荷伯等带民团百余人，把高林股匪消灭，打死匪徒七八个，又为地方除了一大害，农民生活也安定了。

1916 年（民国 5 年），高峻联合曹世英（俊夫）、郭坚（方刚）、耿直等，树立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陆建章）时，杨虎城也参加了这一革命运动。在王银喜（名飞虎、字子封）的护国军第三混成团下任第一营营长，营副潘疙瘩，下属四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子高，第二连连长任子扬，第三连连长李云城，第四连连长王米，另有白玉生等，均系杨之干员。部队当时驻防黄河西岸一带，并在朝邑将陆建章一连军队缴械。在郃阳驻防时，股匪徐老毛、李青兰、张青山几百人危害地方（在黄龙山、郃阳一带），杨将军派了一个连，由李鹏飞带队，把这股土匪全部剿灭。匪徒尸体纵横，便拿农民场里使用的“管槎”往山沟里运送掩埋。后驻防宜川，解决了不少小股土匪，为地方除害。

杨部驻沿河时，1917 年郭坚部去河东讨伐张勋，反被陈树藩和阎锡山夹攻，几乎全军覆没，残部退回河西时，陈树藩想借机彻底消灭郭部，知道杨虎城和郭坚不和，便命令杨部堵防河西各渡口，不许郭部渡河。杨虎城以国家为重，完全摒弃私见，违

反陈树藩的命令，放郭坚残部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地。郭本来在其谋士李桢被打死后，对杨虎城非常仇恨，这时不但前仇尽解、而且对杨虎城的大义行为非常感激。

二、组织靖国军，参加北伐，卷入派系纷争

孙蔚如口述：

1919年前后陕西靖国军的一般情况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惟一的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是由来自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组成



靖国军时期的杨虎城

的庞杂而松弛的军事集团。第一路郭坚，主要以关中“刀客”为基干。第二路樊钟秀（樊老二）原为黄龙山的一股“土匪”，归陈树藩收编，在惠有光说以护法革命大义后，樊遂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一说樊投入靖国军是由于张义安的招致，两说孰是，待证——编者）。第三路曹世英（俊夫）是由不甘心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掠夺的同盟会部

分党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第四路胡景翼（笠僧）乃由陈树藩部队中分化出来的正规军。第五路高峻（峰五）是地方民团转化的军队。第六路卢占魁原系绥远军队，被那时的都统蒋雁行压迫而投入靖国军。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自然地要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打算，互争雄长，攘夺权利，不可能组成一个坚强统一的指挥系统。于右任虽为靖国军总司令，实际上形同虚设，徒有其名而已。因之在兴起后的顺利时期中，各自霸占一块小地盘，派粮派款，滥无限度，招兵买枪，竞相扩大实力。再加上本来没训练或少训练的队伍，由于不断地作战，军纪更形松弛，确实给渭北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不少的损害，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一、六两路占据的岐山、凤翔、耀县等地，情况更为严重。到后来处境困难，敌方大军压境，在高官厚禄、威胁利诱之下，就出现一种离心离德、各自为谋的状态，那就不足奇怪的了。尽管陕西靖国军本身有这样多的缺陷，不能令人满意，但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来说，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北方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惟一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以渭北数县之地，饷械全无，抗拒北洋军阀发动五省军队的几次围攻，坚持5年之久，其艰苦搏斗的牺牲精神，也是足以称道的。我们绝不能因它本身具有缺陷而全盘否定，应该在政治意义上给以足够的估计。

进军武功

杨虎城是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的第一支队司令，是向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自动参加的一支武装部队。他和曹世英既有军事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又有较好的朋友情感，在当时曹世英内部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当1919年（民

国8年)北洋军阀政府,发动直、奉、晋、豫、甘五省军队支援陈树藩的时候,奉军许兰洲率领部队,协同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陈树藩的军队,直趋岐(山)凤(翔)一带,向靖国军第一第二路压迫,郭坚、樊钟秀以“联许倒陈”的说法,接受了奉军的改编。陕西靖国军整个内部从而悄悄地形成“接受改编”与“反受编”两派的斗争。卷入这个斗争中的,不仅仅是一些文职人员,也包括着一部分带兵的军官,直至负责领导的军官。这种已经形成的“受编”与“反受编”的两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遂由暗斗而逐渐明朗化。杨虎城是站在“反受编”这一面的,并且是反对最力的人物之一。这时郭坚、樊钟秀已改换成奉军的旗帜,樊并已开往河南。援陕滇军叶荃(湘石)也带同第六路(卢占魁)经四川开往南方。整个靖国军遂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杨虎城驻在临潼渭河北一个小镇——栎阳。他的部队只有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姬汇百,第二营营长任子扬,第三营营长冯钦哉,总共不过1000余人。栎阳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地形上无险可守;而且东南两方与直军对峙,西北两方与三四路紧密接连。如此外有敌军压境,内有接受改编势力的迫胁,如果欲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在形势上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杨多次规劝曹世英不要接受改编而得不到赞同后,径率所属部队向西发展。武功是西安通甘肃大道上的重要城市,东北距淳化、旬邑山区不远,西出可与第一路李夺部靠拢;这时郭坚个人到西安已被冯玉祥杀害,他的部队李夺、麻振武曾在凤翔,正无所依靠。而这个城市,杨虎城以前因援助友军曾经驻过一个时期,人情比较熟悉,地形亦多了解,遂选定武功县城为西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1920年杨虎城率全部一举攻占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跟着又占据扶风等县,至此,他的初步计划业已完成,积极扩大实力,加强训练,为下一步准备条件。我就在这个

时候，离开曹世英那里参加这个部队。杨遂把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五个营：第一营姬汇百，第二营任子扬，第三营冯钦哉，第四营鲍贵堂，第五营孙蔚如，另外有一个卫队连和一个骑兵连，全部共 3000 多人，高举着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的旗帜。

坚决反对“受编”，迎子右任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西路

1921 年（民国 10 年）直皖战争以皖系彻底失败而结束，直系阎相文督陕，分兵三路向陕境挺进。皖系陈树藩被赶下台，逃往汉中的时候，三原方面的靖国军主张“受编”的有力人物对“反受编”的所有部队，配合直军的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骗，也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双方相互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在武功坚持“反受编”的杨虎城就成为重要对象之一。曹锟、吴佩孚特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见杨，表示“吴大帅”器重之意，并允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支经费，都可从优。杨虎城的答复是：“我所争的只是靖国军这一面旗帜，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那么，任何官职我都不计。”胡景翼派人持亲笔信劝杨“受编”，并为自己剖白说：“余之受编，是依人也，非降人也。”还以刘备依曹操、刘表自况，随后又派童蒲生、李香亭来劝说，并表示愿以杨为他的旅长（这时胡已被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曹世英也派王子申劝杨“受编”，杨说：“俊夫（曹世英的别号）投贼，又来劝我投贼，真是太不够朋友了。”杨虎城严辞拒绝了这些利禄勾引、甘言诱惑，没有丝毫表示动摇，相反地更积极准备迎于右任西来，为陕西靖国军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时，三原、高陵等处接受改编的有力人物公开地表现出来，作为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制止既无实力，劝阻又无效果，而靖国军的旗帜和陕西陆军第一师的旗帜更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并存，于被迫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

所建的民治小学校园中，继移住城外之东里堡，他自况地说：“满目新人是旧人”，“茫茫何地欲为家”。1921年9月21日，戏剧性地开了一次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撤销了靖国军旗帜，接受直军改编，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缴械解散。这个“力穷西北泪纵横”的总司令不得不迁往淳化县之方里镇，依于鸣冈（于是反受编者之一）做寓公。于右任正在穷无所归的当儿，杨虎城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去武功，共谋恢复不绝如缕的靖国军事业，这对于右任说来，真是喜出望外，遂欣然接受，表现出“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的乐观态度（以上所引诗句，均见《右任诗存笺》）。1922年（民国11年）3月间，于右任在于鸣冈派队护送、杨虎城率队亲迎下到达了武功。经过一度商讨，在武功城里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行营，发表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李是郭坚的旧部，郭坚被冯玉祥杀害后，尚无所归属）。陕西靖国军的旗帜继续飘扬在武功原上。稍后感到武功距敌人太近，为策安全，把总司令部设在凤翔，于亦随同前往。

铁佛寺截械与马嵬浴血抗敌

8 甘肃督军陆洪涛买的一批枪弹，要经由西安、乾县运回甘肃。此事为杨部参谋张澍（号雨生，甘肃陇南人，因此事为陆所含恨，后在兰州遇害）所侦悉，当即报告杨虎城，杨令其继续侦察，并秘密作截械准备。雨生对给他的任务，很认真负责，在细心侦察周密研究后，预计这批运输枪弹和担任保护的约5个营的部队于3月26日将到达铁佛寺。但是直军和新受编的岳维峻旅均驻在不远的地方，陆洪涛派的迎接队伍，听说也快到达，因此这一战斗要求以极其敏捷勇敢的行动于短暂时间内结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经缜密部署，决定以刘香亭的骑兵连为前锋，第

一、二两营跟进，五营为预备队，均于先一日在乾县之临平镇集结完毕，26日上午开始行动。大约于八九点钟前后，我先锋已与对方的护送部队接触，对方退入铁佛寺镇内与我对抗，一、二两营遂向这个小集镇展开攻击战。可是那些护运队伍的抵抗并不算弱，直到下午，一、二营曾几次组织强攻，尚未得手，适预备队五营赶到，一举攻占了铁佛寺西的制高点突子山，以猛烈火力向镇内瞰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1000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军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

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缴获了甘肃陆洪涛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同时联合第一路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路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武部，共同进攻马嵬，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杨虎城4月21日率部东进，22日拂晓以装作同以往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二十师阎治堂（二十师师长原为阎相文，阎相文死后，阎治堂以旅长升任）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及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是役按当时情形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够于我军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人以喘气机会，攻占邻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敌我鏖战正酣的时候能够适

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储藏的军用物资，而晚间两路联系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地逃回岐山。这种贪图小利、贻误战机的错误行动，实在叫人痛心。是役我的手臂负伤，移居凤翔治疗，所以后来我未能随军退往三边，待第二年伤好才赶往那里。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认为驻在武功的靖国军第三路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以二十师为主力，加上郭金榜的第二旅，镇嵩军的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属强大的炮兵团（有山野炮40余门），向我武功东原既设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仅以步枪刺刀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敌人相拼，凭着官兵的杀敌热情，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不撤退。

史家圪塔位于我军阵地最右翼，系第二营周子健连防守。镇嵩军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围攻好几天，反复争夺、战事非常激烈。我以王镇华、杨明斋两连往援，击破敌人五营之众。不幸王、杨两连长先后负伤，致未能完成任务。后各部转进时，即留周子健连在该处掩护退却，战事更为惨烈。最后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坏了，甚至用镢头、铁锹和敌人拼杀，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大军得以从容撤退。像这样坚强勇敢的战士，实在是值得人深深怀念的。

第一路麻振武部虽加入战斗，却不能很好地协同行动，整个战线几乎由我方单独担负。敌人挟其优势火力，用40多门山野炮，不停轰击，以几倍于我的兵力迭次组织强攻。在半月多的昼夜苦战中，阵地屹然未动，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形成对峙状

态。然在这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直系甘肃陆洪涛的部队侵占麟游、陕南管金聚的第十五混成旅开到宝鸡，我军陷入四面包围，形势顿时严重。而在久战之余，兵员的补充，械弹的供给，都成当前的重要问题。杨虎城忍痛决定放弃武功阵地，于5月5日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

退 入 陕 北

1922年（民国11年）5月11日，杨虎城率领全部到达凤翔之田家庄，受到于右任与第一路全体官兵的欢迎，乃共同商讨今后大计。一致认为就当前全国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在给敌军重创后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杨当时对于右任表示说：“请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杨部离开田家庄，经由麟游、礼泉、乾县地区，迭次冲破敌军袁健吾和受编的原第四路田玉洁等部的拦阻，开到三原的大程镇。本来杨由麟游就可以径往陕北，其所以不避艰险，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来大程镇的目的是：以前曾和反受编的甄寿山、马青苑（驻交口、雨金一带）约定，杨部若到三原附近，留在关内的反受编部队就可联合起来，重建靖国军旗帜。不意杨到后，这些预先有约的人们，都不愿履行诺言。杨虎城乃决定北上袭取洛川做根据地，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洛川距延安一百七十八华里，当时驻的田维勤部李养青一个营。杨部袭取未遂，乃采用围城强攻方法，而洛川城小沟深，一时不易得手，刘镇华派的阚玉昆、侯保杰又跟着追击上来，遂不得不打消攻取洛川计划，经安塞、靖边到与内蒙毗邻的宁条梁、安边、定边一带暂驻，从事休整。这一带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防地，那时井还没投靠直系，过去又和

杨虎城私交很好，杨虎城乃自己离开部队，交由李子高带着由并编为地方性的部队——陕北歩兵团。陕西靖国军从此成为历史陈迹了。

仲兴裁口述：

1926年春，吴新田与刘镇华勾结，率第七师，由宝鸡出山，向驻宝鸡、虢镇、陈村一带之杨虎城部进攻。杨虎城属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番号第三师。吴新田之精锐部队二十七、二十八等团与杨军大战于岐山南原油单村、杨柳村一带，战争异常激烈。敌曾乘夜进攻，被击退后，集结渭河南岸，转向周、户推进，杨军在当日晚向岐山附近集中，盖以此时刘镇华乘国民二军在豫西溃败，正率部向潼关进迫。杨虎城率部移驻三原、泾阳以北地区，与国民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及国民二军后方留守司令朱子敏等，共同协商抗击刘镇华之策。

陕西督办李虎臣部与刘镇华镇嵩军屡战于渭南、临潼一带，而新败之师，士无斗志，遂致节节后退，势甚危急。李遂一方面向杨虎城求援；一方面派姜宏模旅长移辎重于咸阳，作向西撤退准备。李在电话上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他认为西安为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再次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地方和人民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驰赴西安，与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当时杨曾指出：敌人兵力虽大于我，而西安城高池深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且北洋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坚守半年，国内政治必有变化，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各将领一致拥护他的主张。遂留李子高旅于三原北城与田玉洁部共同防守三原、泾阳外，立即下令各部驰赴西安。时在1926年4月中旬。

杨军渡渭赴援

草滩镇为渭北各县通往西安之重要渡口。杨虎城首先派孙蔚如之第二支队驰赴草滩镇，准备船只，掩护本军渡河，仲兴哉时为孙部参谋，随军出发。这时刘镇华之先头部队，已到新筑镇、泾河沿岸水腰一带，企图占领草滩渡口，以截断三原至西安的交通，阻止援军南下。第二支队占领渡口后，我冯钦哉、姬汇百两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到达西安时，刘镇华先头部队已占领西安东郊的韩森寨，进至东关附近，正向西安城垣攻击前进。瞬息之间，即有占领西安之可能，情势异常危急。冯钦哉、姬汇百两部，未及休息，即投入战斗，奋勇击退敌军前锋，西安城转危为安。杨虎城遂率后卫各部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时为1926年4月18日。当刘镇华兵临城下时，督办李虎臣对守城信心不坚，而各大绅如宋伯鲁辈又酝酿欢迎刘军，因而城中人心惶恐不安，杨军人城后，人心乃趋安定。

守城兵力配备

城中部队，共分三个系统：一为李虎臣部国民二军系统，一为杨虎城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另一为卫定一部；卫原为国民二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守城时改编为陕军第四师师长。三部兵力共万余人。杨部兵力人数较多。对防守任务，采取划地分区办法。杨军防区为东城、北城（西北城角一段，归李部担任）和东关、北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李、卫两部，共同防守的区域为南城、西城和南关、西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东、北两方敌距城既近，地形很高，为敌进攻之重点。

当时城中部队既分为三个系统，而指挥也不统一。以兵力

论，杨军兵力较大，且未遭受战斗损失；以地位论，李为陕西督办，地位较高，李如受杨指挥，势所难能。杨虎城深察这种情形，遂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而自为副司令。从此统一指挥，消除猜忌。杨既志决坚守，李亦与之一心，全城人民在刘镇华军合围、死困的情况下，只有与守军通力合作，遂致最后保持住这一不屈的名城。

敌筑长塹以困西安

刘镇华所部陆续迫近西安城郊后，东、南、北三面的许多村落，均被其占领，形成三面包围，只留西面一路与咸阳可通。不久，西面亦被敌截断，驻咸阳之国民二军姜宏模部联合西路陕军，几次向敌军攻击，图打通西安咸阳通路，均未成功，从此西安陷入四面被敌包围之中。我军亦常采取以攻为守之策，抽出精锐部队，乘夜重点突袭敌军阵地，如突击西北城角附近之大白杨等村。但多是予敌以重创后，仍退守原防，确保兵力。

刘镇华镇嵩军纪律甚坏，素为全陕人民所深恶（刘镇华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八年），这次来犯时，西安附近人民，畏之如蛇蝎，故男女扶老携幼，逃入城中避难者甚众。至此，城已四面被围，有欲回家探亲者，出城后均被敌兵拦阻，并劫掠其所带衣物，然后逼其仍回城中，妇女则辄遭其侮辱。因此，城内人民对刘镇华恨之入骨，人各具同仇敌忾之心，无不愿与我军坚守此城。

刘镇华鉴于我军不时乘夜出击，乃强征各县人民，掘长塹以困城（解放初期，故垒犹断续可见）。塹宽、深均约一丈多，塹后筑堡垒设大炮。刘军此举意在困死城中军民，用心至为恶毒，其计亦至愚蠢。它并没有想到因此使我城内各军更加团结，军民一心，守城之志更加坚决，只是苦害了数县挖掘长塹的人民和糟

蹋了绕城数十里的农田和麦苗，引起广大人民同仇敌忾。

东北城角的反围攻战

刘镇华包围了西安以后，占据了城东北方龙首原上的含元殿（唐之大明宫）。该村距城只有数里，为敌炮兵阵地，可以俯瞰距城较近之村庄。同时，城东韩森寨最初即为敌所占领，而韩森寨前之韩森冢地势尤高，敌设炮兵阵地于其上，可以瞰制城东一带。敌尝掘地道潜攻东稍门，用棺材满装火药，轰炸城墙，城墙崩塌数丈，敌兵乘势蜂拥而上，但经我军顽强堵击，英勇搏斗后，终于将敌击溃，敌伤亡甚大，攻城之企图未逞。继而转向大城之东北角一带进攻。此处村庄如午门、钟架子、郭家圪台子等距大城较近者只数百米，但城高（约三丈六尺）池深（约丈余），攀登仰攻非易。敌又从巩县兵工厂调来工人和工具，从地下掘隧道，企图穿过护城河，直进城内，亦经我军侦知，即派官兵沿护城河侦察。侦察之法系置大铜锣于地面，撒豌豆于其上，侧耳倾听，即可辨识隧道挖掘的方向和距离，我即按其方向成直交，掘深沟以防之。敌挖掘既近，铜锣响声愈显，豌豆跳动也越高。我即备柴草和以辣椒粉，并用鼓风器具以待之，一见挖透，即向洞口引火扇风，浓烟一缕挟带强烈辛辣气味冲入隧道之中，再用短枪从洞口猛射，洞中之敌不死即逃。从此不复从地下进攻。

敌在隧道进攻失败以后，复从东北城角架云梯仰攻，以求侥幸得逞。敌离东北城角较近，而此处城壕水也最浅，遂被选为攻击点。敌乘夜在午门附近筑一高台，台高约与城齐，上置山炮、迫击炮。某日，又于暗夜向城下运云梯，企图拂晓以前登城。东北城角守军为孙蔚如之第二支队第一营，发现后，立即猛烈射击，并连续投以麻辫子炸弹（系土法制造，效力很好）。当时有一敌兵攀登已近垛口，为我一担水的炊事员发现，即将扁担水桶

向该敌劈头攒下，敌兵应声从云梯滚下去。接着敌炮兵即从东北的含元殿和东边的韩森寨以及北边的午门等处集中向东北城角打来。东北城角的亭子和许多墙垛都被打毁，瓦砖木石与炮弹之炸片齐飞，烟尘弥漫，笼罩城上。我官兵虽有不小的伤亡，但都能坚守防地，英勇杀敌。连长王金奎身受重伤，犹坚决不离防地，终至壮烈牺牲。此时天色破晓，敌兵暴露于城下，死伤亦很多。匪首王老五（师长）、柴云升（师长）不甘失败，亲来督战，继续增兵进攻。我各处部队亦纷来增援。首先是姬汇百旅长和孙蔚如司令各带勤务员兵赶到，即时上城，加入战斗。孙蔚如司令看见敌还没有退却模样，即令我向师部打电话，请再派队增援。师部即增兵上城，师参谋王俊生参加战斗手部带伤，仍不肯退。我军复抽派精锐兵力，出东门向北、出北门向东均沿城壕边缘和菜园子、午门等村庄向敌侧击。大战至傍晚，敌终被迫溃退。这次战斗是刘镇华围城以来攻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刘镇华在战前曾作了极大的准备，其肉搏部队纠合著名悍匪王老五部的官兵，并悬有重赏（云梯上钉有布条，第一梯赏 1000 元，二梯 500 元，三梯 300 元），妄图一举而下西安。不料遭到我军沉重之打击，从此不敢再作强攻的梦想。此役系在初秋的时候。

坚守西安，粮食为主要条件之一。我军入城后即注意到这个问题，曾进行详细调查。由于陕西先年（1925 年）麦子丰收，谷价很贱，各粮行、商家争相囤积，图获暴利，因而从各县购进麦子甚多。囤积数量最多者达数百石，百余石、数十石者，更为寻常。因此，估计坚守半年，粮食足够应用。但守城后期发生了严重的缺粮。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兵站对于粮食没有采取计划用粮、计口授粮、节约用粮的措施，糟蹋浪费非常严

重。再加上对粮食的保管不善，以致发生霉烂变质等情事，造成很大的损失。第二，由于西安附近居民，进城避难者数万人，吃掉一大部分粮食。第三，由于战争拖长，超过了估计的时间。在8月以前军民粮食尚能维持，到9月间已日渐缺乏，9月底以后已呈严重的缺粮现象，以致很多居民断炊，遂以油渣、谷糠、野草为食，到11月更为艰苦，发生军民争食的现象。各部队往往派员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秩序混乱。杨虎城乃在其师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明坚守西安的重大意义。他说：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又说，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我们许多人都异常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佐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太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从今天起，各部队必须营长以上官长才准许征粮。二军我派丁增华纠察，三军我派姬汇百纠察，倘有不遵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枪毙在哪里。从此以后，秩序复归稳定。

虽然如此，但缺粮问题仍存在着，且严重日甚一日。居民对凡是能吃的东西，都罗掘俱尽，各部队也杀战马以充饥饿。更加是年降雪特早，真是饥寒交迫，一斗麦子约值百元，而且有价无市。街上已看不见卖食物的人，只听见有“一大块一吊”的叫卖声（一大块系一块糖与油渣合的饼）。人们走在街头，上冒雨雪，下践泥泞，一经滑倒，便死于泥水之中。每日死者数十人以至数

百人，以后路毙者日有增加，但官兵登陴坚守，无动摇者。一日孙蔚如司令和我去李子逸先生家，坐定后，李即以投怨的口气说：“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孙即应声曰：“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没说话，现在轮到李先生头上了，就不情愿了。”盖李为主张坚守人之一，此时忽呈动摇。这时在绅士阶层里，又出现了一种投降派，散布悲观论调。他们互相串连，组织请愿等等，企图动摇人心，瓦解士气。杨虎城以其危害革命，乃枪毙其倡议最力者一人。投降派从此以后，便消声匿迹了。

西北城角之假投降

我军以粮食严重的缺乏，外援不至，乃将城关外的阵地逐渐缩小，以集结兵力。北关外除西北之秦女坟和东北龙首原上之小冢作有强固的防御工事据点外（也系出击的道路），其他村庄大都放弃。因此，敌遂进占了城西北角一带之村庄。纸坊村等距城甚近，敌我士兵之声音清晰可辨。夜静后，兵士隔垒攀谈，敌兵夸耀其生活饱暖，企图瓦解我士气，并诱我军投降。这个地区的城防部队为二军戴万镡连，即将此情况向总司令部报告。经李、杨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令戴连派兵下城向敌军假投降，以诱杀敌人。李、杨两司令即移驻西北城角之广仁寺以便就近指挥这一战斗。原来刘镇华深知我守军以杨虎城部为最坚决，今见二军部队投降，遂信以为真。戴连与敌约定次日晚引敌上城，我军即准备好活捉敌人的办法。次晚，敌果然按指定地点上城，来一个捉一个，上近百人左右，下面不闻枪响，知必上当，即向后撤退，我军猛烈投弹，毙敌很多，敌从此不再作诱降之打算。

坚守西安的最后胜利

9月下旬，南城门楼忽然失火延烧，数日不熄。城楼守兵为

李虎臣某部之机枪连。敌见城楼起火疑为城内有变，随即向我小雁塔及南门外之据点猛攻，均经我军坚强反击，终未得逞。当城楼失火，最初我亦疑该处守兵不稳，后经彻查，始知确系锅炉靠近大柱，熏烤日久，遂致燃烧起火。

11月初，城中忽闻西北乡一带，有枪炮声，并且逐渐激烈。被困居民知系援军已到，全城男女老幼都非常兴奋。估计援兵位置系在三桥与猴儿寨子一带，正与敌作战。但枪炮声忽近忽远，可以推知是刘镇华军顽强抵抗，援兵未能骤然接近城垣。这时城中粮食已到了断绝的时候，真所谓罗掘俱穷，官兵均缺乏气力。但是援军之来鼓舞了每个人的信心和勇气，忍受饥饿，防守更加坚定。李、杨两司令决定待援军与刘镇华军战斗至最激烈时，城中抽出较强兵力约两个团，乘夜从南门外之草阳村向敌进攻，以收内外夹击之效，战斗延续半夜未能奏效。李总司令主张增兵猛攻，杨以我军具体情况，不宜再攻，结果仍撤回原防。延至11月25、26日，忽闻城南黄五坡一带枪炮声甚烈，料系我援军迂回成功，直捣刘镇华军之心脏——东十里铺。入夜，城北红庙坡一带忽然喧哗嘈杂之声大起，城上清楚可辨，知系敌军溃乱，人们均彻夜不睡，等候胜利的消息。27日夜敌全线溃退，28日困守8个月之西安城围始解。是日天气非常晴朗，人们好象重睹天日。

19

王子义口述：

1927年秋末冬初，奉系军阀直鲁联军，乘宁汉分裂、冯玉祥在河南立足未稳之际，以褚玉璞、徐源泉、张敬尧、刘志陆、方永昌、袁家骥、王栋、潘鸿钧等8个军，由陇海路东段向西猛扑，企图进犯归德、开封，与盘踞京汉路北段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张学良、韩麟春所部会师郑州，摧毁冯系势力，重温其统治全中国的旧梦。时杨虎城将军所部第十军，在冯玉祥的东路军

总指挥鹿钟麟节制下，与庞炳勋、王鸿恩、吕秀文等三个军，常好仁、王金韬、李元藻、王毓芬等四个师（均是冯玉祥的非嫡系部队），在归德以东地区防守，甫经接触，各友军即纷纷溃退。第十军在坚守西安 8 个月后，疲敝已极，此次请缨出关参加北伐，又未得到人员、马匹、武器、装备的补充。然犹在马牧集一带，节节抵抗。郑大庄之役，第二师副师长孙蔚如仅带步兵一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敌人，孙副师长和师参谋长王一山几被敌炮轰塌的墙土埋没。战争的激烈可以想见。结果予敌人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大部兵力，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各友军安全撤退。卒因伤亡过众，粮弹不继，冯虽允派郑大章、马鸿逵两部骑兵增援，并由电话、电报上说：郑、马两部援兵已到归德。事实上迄无一兵一卒前来。又值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姜明玉师在柳河一带叛变附敌，第十军腹背受敌，但仍一面坚持战斗，一面请援，不料段象武由归德电话报告，鹿钟麟的总指挥部已经撤退。第十军此时完全陷于孤立，而冯竟仍电令第十军固守马牧集一带阵地。杨将军认为鹿既撤退，归路已断，孤军奋斗，牺牲无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向南撤退到皖北的太和县，暂行休整。

在豫东大战以直鲁联军失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胜利告一段落后，冯曾函电交驰，并先后派段象武、冉寅谷、刘定五来太和，促杨将军率部回豫。但杨感到冯在豫东战役中，以装备不良，械弹缺乏的杂牌军队，当敌人精锐之师，坐视不救，其用心可以想象，他认为不能再和冯共事。故对函电一概置之不复，对来人亦表示了决绝的态度。顾既拒绝与冯合作，而困处一隅，补给无着，亦非长久之计，因之向南京方面寻求出路，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了。

与此同时，杨将军认为将来无论谁属，必须增强部队的战斗

力，尤以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官兵革命思想觉悟，为当务之急。乃由每连挑选三名青年班长和兵，组成干部学校。通过第一师参谋长寇子严约来共产党人南汉宸，委为副校长。全校各级负责官兵，除教育长瓮巨青一人外，均系共产党员。此外，军部秘书长蒋听松、政治处长魏野畴，亦系共产党员，对于干部学校全力支持，准备作为将来改造部队的骨干力量。该校成立之初，蓬勃焕发，弥漫着革命空气，人们对之亦寄予无限希望。此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和武汉政府，继蒋介石之后，都进行了所谓“清党”，独第十军仍保持着国共合作局面。风声所播，不能不引起蒋之疑忌。乃派韩振声携款3万元，以劳军为名，来太和侦察实况。韩与南汉宸系山西同乡，且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随着以鹿钟麟为首的赴苏参观团，同去苏联参观，自然稔知南的政治面貌。蒋听松、魏野畴等人的身份，在前些时候也是公开的。韩睹此情况，已露不满之意。事有凑巧，寇子严一天写给南汉宸关于报告工作和询问有无党的指示的一封信，未及发出，随手置之案头，与几位密友同作方城之戏，适此时韩振声来访，无意中发现此信，竟乘人不备，仿效了蒋干盗书的故事，纳之怀中，匆匆辞出，径去见杨将军。相见后谈及南等为人，杨将军以南等来军工作，并未公开宣布其党派关系，佯装不知，并竭力为之辩解。阴险狡猾的韩振声，乃袖出该信以为佐证，杨遂语塞。韩此时亦宣称回京复命。并说，你说要归中央编制，如果留着他们，那岂不是缺乏诚意？暗示如不驱逐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第十军将无前途。

杨将军以韩振声这一阴谋对南汉宸很不利，遂密与孙蔚如商讨应付之策。认为太和位居皖北平原，在蒋冯大军监视包围之中，自己力量又极薄弱；况其时中共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各地革命力量蒙受了很大损失，绝不宜轻举妄动。应以保

存实力，静待时机为宜。于是决定与南汉宸等暂时分开，对蒋介石让步。当晚即指示秘书米暂沉分别致函南、蒋、魏，告以实情和苦衷，请其谅解，并着重申述了后会有期之忧。果然暂别重逢，在1929年第十军移防南阳后，蒋听松就来军中，主持当地南阳报工作，1930年杨将军回陕主持军政，即任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独魏野畴奉党命，负责河南、安徽党的地下工作，举行暴动失败，不幸被反动派杀害，深为惋惜。

第十军既不愿接受冯玉祥的节制，而蒋介石又迟迟不予收编，韩振声之来军侦察，更增加了危机。当地官绅，探悉此中情况，对于筹办饷糈，逐渐表现了冷淡和拒绝的态度。杨将军处此困境，如坐针毡。他认为必须亲到南京，求得一解决办法。乃同韩振声于1928年旧历一月初起程南行，车过蚌埠，与蒋介石专车失之交臂。此时蒋介石东山再起，正与冯、阎密切合作，积极准备第二次北伐，特去徐州亲自部署军事，并与冯玉祥会晤。杨将军到南京后，方知蒋已北去，乃借此难得消闲的机会，畅游了西子湖、普陀山诸名胜。归来暂寓南京李仲三家中，仍因形格势禁，无法与蒋介石晤谈。但忽一日接到蒋的命令，着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参加北伐战斗序列。方振武原亦隶属冯的第二集团军，此时改归蒋的第一集团军，编为第四军团，与贺耀组、陈调元等沿津浦路和其以东地区北进。杨将军至此意态更趋消极，遂将原令转寄太和军部，并以外事托给冯钦哉，内事托给孙蔚如，嘱其共同代理军长职务。他却通过陕军卫定一的军需处长强云程由卫处借到3000元旅费，偕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等于1928年旧历四月间由上海搭轮东渡日本，暂息仔肩。事后闻悉，蒋在徐州晤冯时，冯曾盛赞第十军的革命历史和战斗精神，并表示要畀以方面重任。以后怎样又拨归方振武指挥，此中奥秘，就无从揣测了。

三、远走日本,养精蓄锐

王惟之口述:

日本的樱花,是举世闻名的。光日本首都东京,就有好多处地方大片大片地种植着各种颜色不同的樱花树。

1928年春,东京的樱花依旧怒放,欣赏樱花的日本人虽然照例狂欢,但是,中国留学生并没有被这五颜六色、万紫千红的樱花和迷人的春色所吸引住。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北进的行径极为愤慨。

“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一个进步组织。其中成员,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在该会组织和推



1928年杨虎城在东京与友人合影。左起杨虎城、米哲沅、郝石生(留日学生)、章严(日本士官学校九期学生)、谢葆真、张清璧(郝夫人)

动下，1300多名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推出代表，分别到各省同乡会或同学会，开展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出兵山东的活动。

反日高潮掀起后，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及时地领导了这一运动，并组成5人主席团，以“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名义（在日本各主要县、市均有分会）发出通知，定时（时日失记）在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召开中国留学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派遣福田大将出兵山东阻止北伐的大会。

这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除留学生外，还有不少居留在东京的华侨，带着子女，参加了大会。真是人山人海，坐无隙地。盛况是空前的。

大会未开始前，神田区警察署就派出了许多武装警察，持枪站立在青年会的四周，穿便衣的刑警（亦称特高警察），夹杂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走来走去，注视着每一个到会人的动态。这次大会，就在这许多武装警察和穿着便衣的刑事警察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下，于当日上午10时，正式宣布开会了。大会始终在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中，热烈地进行着。

我忝列为主席团5人之一。当我正致开会词时，适杨虎城将军偕同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由上海到了东京，趋车至神田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他们不顾旅途疲劳，甫卸行装，即参加了大会。杨虎城将军听我讲话是陕西口音，着米暂沉去找我。我和米暂沉，是1921年在西安认识的。那次是为了响应各省学生反对美国哈定总统召开的阴谋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他是陕西省立一中代表，我是二中代表，我们经常出席陕西各校学生联合会，以故相识。现已有七八年没见面了，今忽在此相见，彼此都感到高兴。

我从他口中得知他们是刚到这里的，还没找到住处。同时，也知道杨虎城将军这次化名呼尘，为的是避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

他的注意。

经米暂沉介绍，我和杨虎城将军第一次见了面。他握住我的手说：“你们今天的会，开得好，开得及时而热烈。日本警察虽严密包围着会场，监视着你们，但没能够阻挡住大会的进行，你们这种斗争精神，是符合全国同胞对你们的期望的；同时，也打破了我多年来认为中国留日学生，多半都是‘亲日派’的糊涂想法。”说罢，哈哈大笑。

初次见面，他就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话，简直使我无法回答。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人热诚、直爽、坦率。

接着他说：“初到这里，人地生疏，住的问题，还没解决。”我即去找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他说，宿舍现无空余房间，让他们暂住在二楼会客室，然后再想办法。他们搬进会客室后，我就告辞开会去了。

我刚回到主席团休息室时，即被预伏在那里的两名刑事警察由侧门架走。站在侧门外的两名武装警察，监视着主席团的人员，不准出外窥视。

当我被架到神田区警察署门前时，青年会干事何庭流（陕西乾县人，东京帝大研究生）迎面走来，我向他瞟了一眼。他回到青年会即时告知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把这个消息向大会宣布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神田区警察署提出质问。杨虎城将军马上去找青年会干事和大会主席团人员，一再请其从速设法。

我被架进警察署后，被关在一间单人房间里。里面昏暗而潮湿。除铺有6尺长、3尺宽的榻榻米外，其他一无所有。

我被关进后，曾经过两次讯问，四次谈话，由于我坚持正义，据理争辩，他们对我也提不出任何罪证，终于在不到24小时的拘留限期内，由青年会和留学生总会具名，保释出来了。

我们回到青年会时，杨虎城将军一见我，就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一再安慰我和鼓励我，并对我说：“一个人要能经得起考验。能经得起考验的人，就能得到胜利。你这次算是胜利归来了。以后遇到这种事，要以更坚强的态度，来对付这些无理取闹的刑警。”

他接着说：“弱国无外交，爱国也被拘，日本军国主义者，欺压中国人太甚了！”言谈间流露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无限的愤慨。他问我被拘留后的情况时，我如实地告诉了他。

他对青年学生的那种热情和诚恳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是住在东京市郊目黑区奥泽村大井幸一家，距大岗山和池袋都很近。大岗山是一个小商业区；池袋紧靠大岗山，树木成林，湖水荡漾，又是一个风景区。这一带住的中国留学生，不下50人，光陕西学生，就有六七人。

连接市内的高架电车，由目黑到多摩川公园，来往都要经过大岗山和奥泽村车站，交通极为便利。要到市内去，在目黑下车，换乘环绕市区的高架电车，或乘平地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一元均一”的私营商车，要到哪里去，都很方便。因此，我就邀请他们搬到我那里暂住。但杨虎城将军谦虚地说：“一动不如一静，等你给我们把房子找好后，搬一次就行了。”

接着他说：“最好，能在你住的附近，给我们找一所租金低廉的日本式木板房子，只要有一楼一底，就可以了。西式洋房，绝对不要！”我听后也想：大名鼎鼎的杨虎城，不带万儿八千，绝不会来日本做寓公的。他为什么不住西式洋房，而要住租金低廉的日本式木板房子呢？

可是，我和他才是第二次见面，不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不好当面问他，只得照着他的意图去办事。

不久，即在距离我的住处不到1公里的大岗山，一个风景优

美的地区，给他找了一座新盖起来的一楼一底的单间日本式木板房子。每月租金，不到日币 20 元，而且是一个独院（按：当时中国硬币一元，计折合日金一元四角三分）。他看后，感到满意。随即搬出青年会，迁进了新居。

杨虎城将军定居大岗山后，初因语言不通，购买日用品，感到困难。经交涉，由出售食粮、蔬菜和柴炭的商店，按时将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送上门去，半个月结账一次，双方均称便利。以后，他们学会了一些日常应用的简单日语，能够上街自买东西，才取消了这种办法。

报纸是杨将军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他每天阅读报纸，要占去几个钟头的时间。由于日文中夹杂有汉字，即使不懂日文的人，只要看到其中的汉字，也可了解一部分大意。因此，他在定居后，就订了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每早报纸送来后，先由秘书米暂沉就报纸中汉字大意，给以概括的解释。晚上，同乡来访时，再请他们将原文摘要读给他听，并就要闻给他加以说明。有时，还和来访者展开讨论，直至将问题完全搞明白为止。

同时，他还订有国内报纸，如上海《新闻报》、《申报》，天津《大公报》等，邮到即读。对于国内和日本的情形，处处留心，从来没有放松和忽视过。

他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今虽身处海外，对于国内各方面的变化，不能漠不关心；至于日本呢，那更应该注意了，因为它是我国最大的敌人，时时想侵吞中国，把她攫为己有。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样欺侮我们，把兵开到山东，阻止北伐，中国留日学生都起而反对，我能对此无动于衷吗？”

“我既来到日本，必须要随时随地了解日本的情况。阅读日文报纸，只是借以了解日本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深入

到各方面，去作实际的考察。例如：你们常说的德田球一所领导的日本共产党；安部几雄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大山郁夫所领导的劳动农民党；以及日本总评议会等等，究竟他们在日本国内，能起多大的作用，这也是我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方面。”

“此外，中国留日学生，都有哪些进步的组织，其中成员，哪一省的人多？对于这些进步的青年学生，我想今后多和他们接触，听取他们对国事的主张；并和他们交换一些意见，以丰富我的知识。”

“总之，我这次来到日本，想利用一切机会，多知道日本的一些情形和中国留日学生的动态，作为我回国后的必要参考……”

他有一次这样发问：“听说你们留日学生中，思想分歧，派别不一，有什么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拥护‘五色国旗’；有‘第三党’，有‘西山会议派’和南京的蒋介石派，拥护青天白日旗。因政见分歧，主张不一，经常相互斗争，打架闹事，是真的吗？”还听说：“中国共产党员，在日本的也不少，他们有没有公开组织和活动？陕西留学生中都有哪些组织，参加的是谁？希望告诉我，给我以参考……”

他就是这样地关心留学生的动态，只要是进步的青年学生，他多方与之接近，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几位和他交谈过的学生，如章严和童长荣等，常常说：“杨先生对人诚恳、热情、又很客气，使人容易和他接近，畅所欲言……”对杨虎城先生流露出敬佩之意。

杨将军的求知欲很强。常说：“我是个军人，带兵多年，过的是纯粹部队生活。不是练兵，就是打仗，读书和习字的时间很少。我这次来到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文化。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加强自己的学习，多读书勤写字，在知识方面，给自己多增添一些本钱，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杨虎城将军每天清早起床后，即到附近的洗足池边散步和做柔软体操，长时间中，未尝间断。散步归来后，阅读报纸，打扫卫生，并帮助做饭。饭后，略事休息，即临帖习字，由于他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入夜，亦常在天朗气清或月明如昼时，约来访问人或陕籍留学生相友好者二三人，去池袋乘小划子遨游湖中，有时划至湖心深处，谈心论政。

他平均每天要写一封信，寄给国内友人于右任、蒙浚生等和他的原部队第十军中高级僚属孙蔚如、冯钦哉、马青苑等，报告他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他对国内外一些时事的看法。

对于来信，多系他亲笔作复，假手于秘书米暂沉者很少，从不让他的夫人谢葆真代笔。他所写之信，我曾看见过多封，字体虽大，但笔劲有力；而且言简意赅，无繁冗之句，其中还夹杂有不少的成语。我问他：“你在信中，所使用的这些词语和成语，都从哪里学来的？怎么运用得这样恰当？”他说：“关于这一点，是要归功于我在部队时的书记官和秘书们了。他们将公文函电送阅时，或者将拟稿念给我听时，陆陆续续记下来的。日子长了，无形中就记的多了。因而在写信时，不自觉地就把它应用上了。”我说：“至于词语，是人们日常应用的东西，不必说了；惟有成语，人们不大常用，如果能将其含义弄清，偶一用之，也有好处。例如在谈话、作文，或者在写信时，能够恰当地运用一些成语，它可以简洁明了而生动有力地说明问题，使人容易了解问题的实质，多记成语，好处不少。”他很以我的话为然。并说：“今后将要更多地记些成语。”

他常写信给他部队中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如：姬汇百、党澄清、张自强等，勉励他们多和新的事物接触，逐渐改变自己的旧意识，旧作风，旧习惯，以适应新的环境。

他还常写信给第十军官兵。多方鼓励他们要好好聆听政治处

人员的政治讲课和时事报告，并教导他们少下操场，多打野外，在艰苦中练好杀敌本领，随时随地准备打垮北洋军阀，扫清北伐障碍，驱逐日寇，挽救祖国危亡。

曾记得他写给于右任的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日本人欺侮我们太甚了，出兵山东，阻止北伐，还杀害了我国外交官蔡公时，造成新的‘五卅惨案’，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那时就抱着坚强的抗日决心和誓雪国耻的雄心壮志。

他的每一封信，寄到前方部队后，对第十军的全体官兵，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增加了无穷的战斗力量。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的前身，是原国民第三军孙岳部的第三师。第三师的前身，原是陕西靖国军于右任部的第三路第一支队。这一部队，在十多年来的历程中，虽经过几次改变番号，但是，领导这一支部队的，始终是杨虎城将军。因而全体官兵对杨虎城将军抱有深厚的情感和崇高的信仰。如今，他突然离开部队，东渡日本，大家都感到有些惶惑不安，殷切地盼望他早日归来，统率全军，参加北伐。在这种情况下，第十军军部先后派曹润华、王宝珊、姚丹峰等来到东京劝杨回国，终以时机尚不成熟，不能归国，直至1928年冬，经部队不断呼吁及冯玉祥函电敦劝，始回国到达山东军次。

四、离冯附蒋，经略西北

李志刚口述：

我在杨虎城将军领导下任职8年，经管过民政、财政并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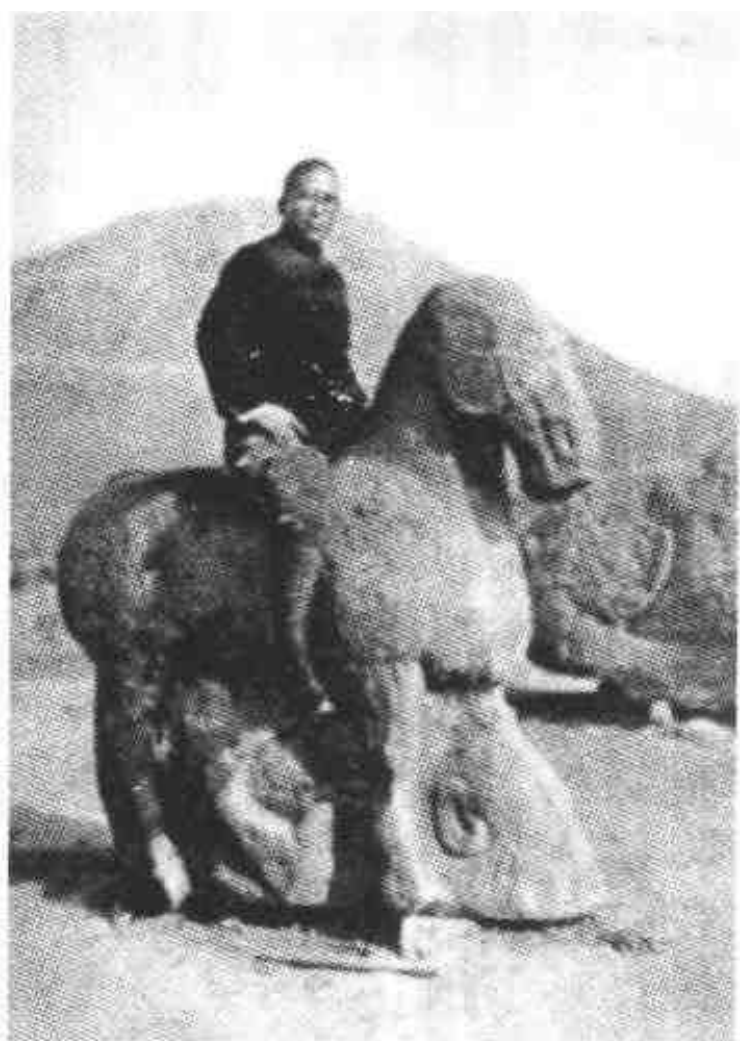
他的驻南京代表。从亲身经历中，对他的事迹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知道一些。

鲁东剿匪

1928年冬季我由耿寿伯介绍加入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杨部番号是暂编第二十一师，归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节制。时奉冯的命令，由鲁西单县开往鲁东临沂一带剿匪。

杨于1928年11月间由日本回国，他到南京后只见了冯玉祥（冯当时任军政部长），没见蒋介石。冯催他速回部队往鲁东剿匪。杨于12月下旬到泰安与孙良诚见面后没多停留，就去临沂回到部队。

我是在临沂与杨见面的，他让我住在师部。不久，熟悉了部队情况，让我到泰安担任与孙良诚的联络工作及领运经费和军用品。那时，暂编第二十一师的



杨虎城在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像上

经费数目没有确定，冯玉祥每月仅给两三万元的维持费。孙良诚对杨部费用一点也不肯多发，其他军用品更是一点不发。我再三交涉，均无效果。孙良诚的机要秘书刘跨灶告诉我，孙良诚在冯的控制下，不敢多发，要想多领，非去开封见冯不可（此时冯、

蒋关系正恶化，冯回到开封)。我去开封见冯。冯装作同情杨部的困难，告诉我说：“虎城部队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但中央没有他的部队的经费预算，这点维持费还是我在第二集团军内部挖肉补疮来拨付的，希望你把我的苦衷转告虎城。你既然来了，我就打电报给孙良诚对费用和子弹酌量多发些。”他是把过推与蒋介石，把功归到自己。我又跑回泰安，向孙良诚多领了1万元，又领了一些子弹，解回临沂。我把冯的话说与杨听，杨冷笑着说：“冯先生的这一套，我算领教够了！”

杨离开部队半年多，回来时，全师官兵在物质生活上虽极困苦，在精神上却大为振奋，相信他回来一定有办法，因为这个部队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主要是抓训练和教育。严寒腊月，他一早就到操场亲自督练，操练后经常集合官兵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多属革命、反帝、救国、爱民的道理，有时还引述他在日本时的一些观感来教育官兵。我留住临沂期间，听过他几次讲话，迄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讲过：“日本确是一个工业强国，但它是帝国主义，国内贫富悬殊，对外则进行侵略，现在还强占着我国的胶济铁路和沿线城市，并且掩护土匪，苦害我人民。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消灭这些土匪，再进一步就是收回胶济铁路。”他还讲过：日本当局对我国派去学军事的留学生并不认真教军事本领，秘密技术和军事演习还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他对剿匪，强调：“一定要和当地民众合作，才能迅速肃清。因之，军队要讲纪律，不扰民，并尽可能帮助老百姓。”

杨在临沂把部队亲自训练了两个月，于3月下旬开始剿匪，他以突然的行动首先打垮了盘踞莒县、日照的刘桂堂匪部，紧接着又完全消灭了盘踞诸城、安邱一带的顾震匪部。把这两大股匪军打垮后，他又分派部队剿灭了沂水瓦屋崖和蒙阴一带的薛传凤、黄起凤、尹士贵、张黑脸、毛大将等股匪。仅两个月的时

间，就把鲁东铁道以南十几县的匪患彻底肃清，鲁东人民对之都热烈赞扬和拥护。

离冯附蒋

在鲁东打垮的刘桂堂和顾震两部匪军，都有蒋介石委任的番号，是经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收编的。杨打垮了他们，是替冯打击了蒋向山东所伸出的手。但在这样短时间内能肃清铁路以南的匪军，引起冯、蒋双方对杨军的重视，冯一再来电嘉奖，蒋的总司令部也派一个高级参谋（忘记姓名）到临沂视察，向杨表示好感和拉拢。

这时，正值冯玉祥下令撤退其山东、河南部队向洛阳以西集中，作欲伸先屈之势，准备对蒋介石作战。孙良诚奉冯令退出山东，冯、孙俱有电令杨部迅速集中，随孙部西撤。杨复电说：“剿匪以后，部队分散各县，正在集中，一俟集中完毕，即向鲁西撤退，再转河南。”就在这时，蒋介石给杨直接来电，要他仍驻原防，维持治安，一切经费和补给由南京拨付。杨就秘密由海路经上海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和何应钦，发表了新编第十四师番号，由蒋直接节制。他很快地回到部队，并要我到南京成立新十四师驻京办事处，嘱咐我去见于右任（监察院院长）、邵力子（蒋的秘书长）和何应钦，了解情况，从速回电详报，以便联络关系。

我到南京后，知道于右任向邵力子介绍了杨在陕西靖国军时代不与北洋军阀妥协的革命精神，坚守西安8个月的胜利事迹和肃清鲁东匪患等获得人民爱戴的情况，邵转向蒋介石说明。于、邵两人那时对杨是帮忙的。邵又带我见蒋，面报了杨军的纪律和剿匪经过，蒋对杨表示重视和嘉许，关于经费和补充等问题，要我向何应钦请示解决。我又和胡逸民往见何应钦，何批定预算，

每月约 10 万元。据何说，这是新编师中最高的经费额。

我在邓府巷租胡逸民的房子正式成立了办事处。杨派我为处长，胡逸民为驻京代表。胡是浙江永康县人，是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王镇南的下属。据说，王是蒋的表兄弟，因此，胡能在蒋的下边活动。当杨在日本时，曾派马青苑到南京活动，胡与马、邵全熟识，帮马活动，批了一点临时补助费。因此，杨便派他兼任驻京代表。

1929 年夏季，蒋日达成协议，日军由胶济铁路沿线城市撤退。蒋介石令杨接该路从张店到博山一段防务，杨派孙蔚如旅前往接防。这一段有不少日侨，工商企业甚多，蒋使杨接防，说明他对杨部的军纪和战斗力达到可以信任的程度。

守 备 南 阳

1929 年夏初，冯玉祥把他的部队由山东、河南向洛阳以西撤退，韩复榘、石友三两部，叛冯投蒋，冯、蒋决裂已趋表面化。蒋介石对冯作战的部署是以主力使用于郑州以西的陇海路西段，以一部使用于襄樊、老河口一带，防备冯军由荆紫关东出截断平汉路，威胁武汉。他把守备老河口的重要任务选择了杨军担任。事前胡逸民和我知道后就把这个消息密报与杨，8 月间蒋的命令才正式下达：令新十四师在半个月內全部集中于胶济铁路附近，再乘火车直达平汉铁路花园车站下车，再徒步至老河口，所遗防务由陈调元派队接防，并邀杨到南京一见。

新十四师移防的消息传出后，鲁东南十余县的机关、学校、团体联合电蒋恳切挽留，各县代表和地方父老还到师部请愿挽留。蒋介石备战情急，不顾驻地人民的一再恳求，连电促杨，迅速开拔。

杨在 9 月初旬由山东用火车把队伍输送到湖北花园车站。他

经徐州去南京见蒋。蒋对他备加慰勉，说他在山东时的军纪好，当面密示调动他的部队是为了防备冯玉祥部由荆紫关东进，并问他的部队是否能与冯军作战？杨表示他才脱离冯的节制，马上就去打冯，不甚合适，但如果使他守一个地方，冯军来攻激发了部下敌对情绪，就一定能坚守到底。蒋认为他的话很对，决定使他守备襄樊的前哨老河口。经蒋的幕僚研究，认为老河口太靠后，不是挡住冯军出荆紫关东进的要路，乃使杨改守南阳。改守南阳决定后，蒋当面问杨能守多久？杨说：“只要有米面吃，有子弹打，命令守多久就能守多久。”蒋大喜，说：“你曾经坚守西安 8 个月，我相信你可以守住南阳，至于粮食子弹，自然充分供应。”于是，把杨的部队改调南阳。杨部已由花园站下车，徒走向老河口行军。杨遵照蒋的命令，发电报给部队：到老河口后，继续转向南阳进发。蒋为固定杨部任务，又给杨加委了“南阳守备司令”的名义。杨在山东打垮蒋所收编的匪军，本为蒋所不喜，但却表现了他的部队的战斗力和良好纪律，后来又离冯附蒋，蒋对杨打垮顾、刘等部的芥蒂便消失了。

杨在南京见蒋后，即经汉口去南阳部署一切。不久，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新十四师由山东开拔时，第一旅旅长冯钦哉带了几火车食盐被山东盐务局查知，报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孔大怒，使用蒋中正名义发电对杨斥责，电报头上连杨师长的称呼都没有，电文大致为：“南阳杨虎城：据报该部由鲁开出时，私运大批盐斤，偷漏国税，扰乱财政，仰即彻查具报，以凭究办”等语。杨当然不愿把部下查报上去，但他附蒋伊始，又看辞句严重，就把详情电告我，嘱我就近设法了结。我去见邵力子，邵看蒋中正电尾字码不是由总司令部拟发的，而是财政部用蒋名义发的，答应向蒋关说，并嘱转告杨不要顾虑，以后不再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新十四师到达南阳后，蒋介石从汉口发来大米 1 万包，面粉 1 万袋，步、机枪子弹 100 多万发及手榴弹、野炮弹和一些做工事的工具。新十四师以 1.2 万人计算，可足够半年之用了。

杨师到达南阳后，一面补充兵员，重加整训，一面构筑工事，准备长期固守。这时，所有经费和粮弹物品俱由汉口发领，我把驻京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移驻汉口办公。

1929 年冬，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被阎锡山诱禁于山西五台建安村，冯的总司令职务由宋哲元代理。双方主力在洛阳以西作战，宋派刘汝明部由商、洛出荆紫关东进。当时蒋令唐生智的第五路军集结洛阳一带对付冯军主力，令杨坚守南阳，阻刘部东进之路。杨用兵非常机动，他派部下商、洛籍贯的一些官兵化装回籍，侦察荆紫关以西冯军兵力番号及动静。他侦知刘汝明部并无后续部队，乃改变坐守南阳的战法为“以攻为守”，以主力控制南阳守备，另派孙蔚如旅向西迎击，刘汝明由商、洛出发时原侦知南阳以西除内乡有别廷芳的民团外，没有蒋方的部队。不意孙蔚如旅行动迅速，突然出现于西峡口对刘汝明军袭击，刘军无备，被打得大败，向西溃退。这次打退了刘汝明，获得蒋的嘉奖。

唐生智在洛阳以西打退冯军主力后，12 月间与石友三约同反蒋。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唐随后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率其主力刘兴、龚浩等军由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总司令部驻在驻马店。唐的讨蒋通电未征得杨的同意而列入杨的名字，杨也未通电否认，只电我向蒋方表示否认。唐派人到南阳与杨联系，杨虚与委蛇，表示合作。

蒋介石对唐生智的突然叛变，十分惊慌，认为如果唐军进入武胜关，湖南何键必然起而响应，会攻武汉。如果武汉不守，就会失去他的半壁江山。因此亲到武汉主持讨唐的军事，并派刘峙

为总指挥，在信阳一带布防堵。因唐的通电中冒列杨名，刘峙的参谋长刘耀扬数次问我，杨究竟靠得住否？蒋只令杨归刘峙指挥，相机侧击唐军右翼。

杨接蒋电令后，正电调孙蔚如旅由西峡口东撤，接防南阳。他亲率直属部队和第二旅一部到赊旗店（今改为社旗县，时冯旅驻此），调第一旅冯钦哉部随他去打唐。冯钦哉认为打唐没把握，推病不肯去。杨说：“你不能去，我把你的队伍带去打！”最后，冯还是同部队出发了。当时下大雪，雪深没膝，杨率部两日两夜行200华里赶到驻马店附近，利用夜暗对唐军奇袭。唐生智主力正对南面的刘峙军作战，对西面未多加防备，被杨部突然攻击，顿时混乱。当夜杨军即将驻马店大部分地区攻占。次日，唐军曾一再反攻，终被杨军击败，唐生智及重要人员化装逃走，其总部官兵被俘甚多，检查战果，约俘唐部官兵四五千，缴获两个炮兵团的野炮六七十门，步、机枪两三千支及其他军用品极多。唐的总部及直属部队大部被俘，残部向东逃去。

冯钦哉为了邀功，他攻入驻马店后就用俘获的电台用明码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他率部已攻占了驻马店。蒋在汉口收到冯电后半信半疑，稍缓收到了杨的电报，才确信杨军攻占了驻马店，打垮了唐军。

蒋介石原来只希望杨侧击唐军右翼，协助刘峙主力军作战。今杨竟用奇袭战法一举而解决了战争全局，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蒋除复电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奖叙外，并立即批发了奖赏10万元；接着明令把新编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升杨兼任第七军军长；还召见了冯钦哉，当面夸奖，闻还赏给他两万元。这时，我在汉口具领经费物品，军需人员对我也另眼相看，批发手续极快，一改过去留难折扣等情。刘耀扬对我说：“虎城这次是奇兵致胜”，把从前的怀疑也作了解释。

蒋对杨部所俘获的全部野炮及步、机枪一再来电索要，杨只得把野炮上交，步、机枪都未交去。经过这次战役，蒋认识了冯钦哉，从此逐步挑拨，成为限制杨部发展的环节之一。

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

1930年4月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演成民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内战。蒋介石发表杨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令他担任平汉铁路以西广大地区攻守任务，就是西向对荆紫关方面的防守，北向对平汉路正面协同蒋军进攻，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平汉路方面蒋方部队，除杨部外，还有徐源泉、上官云相、萧之楚等军。阎、冯方面，有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做主力，配合王振、宋天才、万殿尊等河南土著部队。在蒋和阎、冯看来，双方的这些杂牌部队，都是不十分可靠的，但也是可以争取的。因此，双方对这些杂牌部队进行了秘密活动，互相争夺。

蒋介石知道这些杂牌军不易指挥，他对症下药地派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平汉路方面作战。

何成浚是日本士官学校早期毕业的，但他早已成了腐化透顶的政客。1928年，他就以蒋的北平行营主任身份，既拉阎又拉张，起用唐生智赶走白崇禧也是他主演的拿手好戏。他来做平汉线方面的总指挥官，怎样指挥呢？我记得在1930年5月间，他由汉口进驻漯河，先把吃、喝、嫖、赌、吹搞个全套，杨不会打牌，请人代打，也得奉陪。何的参谋长朱传经对我说过：“何老总这一套是高明的，起码把他们牵住不去打别的主意，平汉路根本不是决战的方面，只要内部不发生变化，能在对峙中顶得住，就是胜利。”事实上，平汉路双方杂牌军队谁也没有卖力气，就这样对峙了几个月。

7月间阎、冯联合汪精卫等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政府与南京政府抗衡，这时双方更是造谣离间，秘密勾结，已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北平扩大会议开幕时，北平的报纸就登出杨有代表参加。一次我由汉口到南京，于右任、邵力子都问我杨的真实态度如何。何成浚的几个重要幕僚陈光祖、杨揆一等也常用开玩笑的口气向我探听杨的态度。所以办事处不但需要宣传作战胜利，还要随时辟谣。在四五月间，冯玉祥先后派徐维烈、赵燕卿密来拉杨反蒋。杨用优待方式把他们软禁在南阳。但杨还是十分注意探听蒋及阎、冯双方的军事、政治变化。当陇海主战场胜负未分的时候，杨要我切实注意该方面的战况，随时密报。他还要我与徐源泉部驻在汉口办事处的副军长马海峤密切接触，了解该军动向和他们得到的情报。

八九月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在山东和陇海路战场先后失败。蒋介石部署平汉路方面的杂牌军，分五路向陇海路西段挺进，切断冯军联络和后路，杨军为最西面的一路，目标是攻占洛阳。

杨观察大局，认为阎、冯必败，奉命后即率全部兵力由叶县附近出发，以急行军速度经鲁山、宝丰、商酒务、临汝镇、白沙镇（当时叫自由县），突然出现于洛阳以南的龙门山前。侦知龙门山一带有冯军葛云龙师防守，乃以冯钦哉部佯攻正面，亲率主力由延秋镇（龙门西）向敌后迂回。敌陷于半包围状态，被迫退守洛阳城，杨挥军跟踪追击，把葛云龙师围困在洛阳城中，并切断了陇海铁路的东西交通。杨的司令部驻于西工。杨把战况电报蒋介石，蒋顾虑围攻洛阳会耽延时日，令杨把围攻洛阳任务交与徐源泉部接替，速率所部沿陇海路向西急进，扫荡冯军残部，攻占潼关，直捣冯军陕西根据地。

这个任务虽是艰巨，但符合杨和他的官兵回陕愿望，因之官

兵踊跃，兼程西进。攻下潼关后，杨率主力经二华、渭南直趋西安，令孙蔚如部北渡渭河，经朝邑、大荔西进。

当时刘郁芬负冯军后方总责，并兼任陕西省主席，得悉杨军攻入潼关，认为大势已去，乃率其军政部属仓皇出西安，经渭河，企图由大庆关渡黄河逃往山西，被孙蔚如部堵截。刘派人向孙求情，孙徇情把刘部武装收缴后，人员和财物等一概放过河。

1930年11月，杨占领了陕西，摧毁了冯玉祥盘踞5年的根据地。12月我在南京从邵力子口中得悉，蒋对杨军迅速入陕，极表满意，但对放刘郁芬过河不满。蒋曾电杨查问，杨复电说自己兵力不够，不得不如此，把放刘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放刘一事并未影响蒋对杨的好感和信任。至杨入陕为止，蒋、杨互相利用的关系达到最高峰。

组织陕西省政府的一些情况

中原战争末期，杨军以破竹之势，攻入潼关，控制全陕已成事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距离尚远，因而蒋不得不把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给杨，至于陕西省府人选，要杨提出名单由他核定。杨提出的省府委员名单是李协、李百龄、李志刚、王一山、胡逸民等，杨自兼民政厅长，李志刚为财政厅长，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李协为建设厅长，南汝箕（即南汉宸）为秘书长。蒋除添二陈派的李范一为委员兼教育厅长、李百龄仅为委员外，其余未动，杨自兼民政厅长是想亲自把各县整顿一个时期，再物色适当人担任。李协是水利专家，特邀来兴办陕省水利的。李百龄原系于右任的亲信，但已与于貌合神离，实际上与杨接近，杨荐李入省政府，标榜着是用于的人。因此，为于内心所不喜而又有难言之隐。

陕西省政府人选发表时，我在汉口，后去南京结束应领而未领的经费和物品。到京后，我去见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当面要来

任命状一张，委我兼任财政部驻陕西特派员，告诉我特派员公署的编制和应征特种消费税的种类与税率等文件即直发西安；征税时不要随意附加和扩大，以至成变相的厘金税。他又说，为了接济陕西省财政，征收的税款直接拨陕西省库并报部核销。

我又见邵力子。邵说：这一年多来，杨的表现和战绩全好，陕西省政府的人选，尊重他的意见，这是蒋对他信任的表示。邵荐马本诗充财政厅秘书，说马能协助办理财政。

我又见陈立夫。陈介绍李范一的能力和经历，说他能协助杨主席办好教育，希望拨足教育经费，让李放手去做。陈立夫向来与我认北洋大学同学，曾带我见过蒋介石，那时他是蒋的机要秘书。杨每次到京，他总是与杨拉拢，杨部由山东开往南阳时，杨到了南京，陈果夫邀杨在家中便饭，陈立夫作陪，亲切地谈了整半天。二陈拉杨是要伸手抓陕西省的党政组织，是控制杨的主要活动，这自荐李范一任陕西教育厅长和组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开始。

我还见了于右任。于说：“陕西省政府的人选，虎城没有和我商量，人家就是和我商量也不听我的话。”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自从杨部入陕之后，于、杨间的感情逐步下降了。

获得西北地区军权的经过

41

当蒋军把阎、冯的部队基本解决以后，就伸手到西北。1931年春，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派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指挥陕、甘、青、宁各省的军务，十七路军也在潼关行营指挥之列。还派陈继承的第三师和蒋鼎文的第九师入潼关，驻扎于二华、渭南一带，咄咄逼人，有取杨而代之之势。

杨对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等表面上极表欢迎，陪他们游华山，去临潼温泉洗澡，又请到西安开欢迎大会，大宴小宴不

断。但在暗中杨却把十七路军布置在临潼、高陵、大荔、朝邑一带，形成对中央军的半包围形势。

另外，杨还要我到庐山见蒋，表示甘、宁、青、新等省全由杂牌军割据，请将陕西军政大权交与中央，自带部曲西进，做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经过再三研究，杨以为这样对蒋表示是有益处的：（1）可以探出蒋是否要直接完全控制陕西；（2）可能继续取信于蒋；（3）如果邀准，要他到更西北的地方，也有广阔发展的天地。他告诉我，要向蒋表示诚恳而坚决的态度，不然，探不出蒋的真意，难以决定我们的动向。于是，我由西安去庐山，两次见蒋，报告陕西的政治军事和杨与顾等融洽相处的情形。蒋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蒋表现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回来后，向杨做了详细的汇报。杨后来说，他把对蒋的表示告诉顾祝同，顾冷笑说：“你何必多此一举？”又过些日子，蒋把顾祝同和陈、蒋的两个师调走，将潼关行营主任遗缺派杨接替，从而杨获得广大西北地区的军权。

经略西北中蒋、杨矛盾

42

1931年秋季，杨接任潼关行营主任之后，对西北各省杂牌军积极进行联系与收编，先后委任青海回军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陇东的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陇西的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在甘肃走廊的回军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天水的回军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陇北的石英秀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当时西北甘、青、宁（马鸿逵）各省的军队首脑都派有代表常驻西安，表示听命。惟有冯玉祥的残部雷中田、王家曾两部盘踞兰州一带，抗不听命，雷中田

自称甘肃保安总司令。杨曾电蒋拟派军入甘解决雷中田部，蒋主张对甘不要用兵，以政治方法解决，他由南京直接派出以马文车为首的甘肃政治视察团赴甘。

1931年冬，吴佩孚率其所谓八大处及几百人的卫队由川北入甘，打着兴国军总司令的旗号，沿途对各地军政人员乱发委任状，收编队伍。沿途各军政小头领慑于吴“大帅”的威名，多招待应酬，间亦有送款报效，企图投万一之机。吴到兰州后，雷中田对吴表示拥护，连马文车也表示对吴拥戴。吴见雷中田拥有武力，乃思以兰州为根据地，向外发展。

陕西省民政厅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耿寿伯（吴佩孚任直鲁豫副巡阅使驻节洛阳时，耿为胡景翼的代表，常川驻洛，耿与吴的第三师副师长张儒清又是甥舅，所以与吴很熟。）忽接到吴佩孚亲笔信一封，要耿从中运用和杨合作。耿立即把吴信交杨看。杨看后笑对耿说：“这是个很好的题目。”他连同所获吴佩孚到兰州后的活动情报一齐电报蒋介石，提出派兵入甘，已再不宜迟。这样，蒋才令他速派部队入甘平乱。

杨得到蒋的同意后，即派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指挥十七师及驻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陈圭璋部分路向兰州前进。在定西一战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迅即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仓皇逃走，从而平定了甘肃。

当时甘肃省行政无人主持，杨电令孙蔚如暂代甘肃省政府主席并电报蒋备案，杨所以不保荐孙蔚如为甘省主席，意在试探蒋介石的意图。蒋复电仅明令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这说明蒋不同意孙正式主甘，而在甘省纷乱的情况下，又怕派自己的人不为杨所支持，因而就以孙为甘肃宣慰使暂代主席。

杨对甘省主席人选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当时，杨愿意提出的人还是孙蔚如和邓宝珊（时住西安，为杨的上宾），孙已为

蒋所拒，而邓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为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副司令，是反蒋的，又不能提出，因而久久不决。后来杨想出从蒋方人物中提人选，但必须是接近十七路军的，因而选了邵力子。提邵在杨是以此取信于蒋，并认为邵是蒋的重要幕僚，不见得就能分身来甘，或者省主席还能落实到孙蔚如的身上，或者发表邵而由孙代理下去。电报去后，蒋很快明令发表邵力子主甘，并即行到任，这是杨没有意料到的。1932年2月，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计划把邓宝珊派到甘肃，利用他是甘肃人的关系，加强西安绥署与西北各省军队的联系。时邵力子赴甘就任，途经西安，杨对邵提出邓的问题，邵允在蒋介石方面疏通，于是杨就先斩后奏任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以后蒋也同意了。

邵力子主甘后，蒋介石的势力逐步深入西北。后来以“追剿”红军为由，派第一师胡宗南部由豫西入汉中，再入甘肃，军事上蒋在西北也扎下了根。

不久，杨的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水叛变，虽被杨迅速解决，但从此杨、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马逃到南京，蒋安置他人陆军大学深造，以后又派充平汉铁路局警务署署长。在南京，胡逸民曾得意地对我说：“青苑想独立是失败了，但却升了官，你看虎城还有什么办法？”马青苑的叛杨是葛武梁（宁夏教育厅厅长，实是西北复兴社的负责人）还是胡逸民搞的，我说不清，但可以肯定是蒋派人搞的。

1932年，红军由鄂豫皖边区进入川北。蒋介石马上借了这个题目，令杨把孙蔚如部调回陕西防共，只留孙部的杨渠统旅驻防陇东平凉一带。以后蒋又拉拢杨渠统，扩编为新五师，调到河南归刘峙节制。接着，蒋介石又派朱绍良为驻甘绥靖主任，邓宝珊调榆林，从此，杨的势力退出甘肃。

新编三十六师马仲英部是杨派人新疆的部队，还派了几个人随马工作，马进入新疆后，与杨的军事力量接连不上，最后被盛世才消灭。

青海的马步芳被蒋直接拉了过去，宁夏的马鸿逵依其父马福祥的关系也归了蒋。

1932年夏，我由民政厅长调充西安绥靖公署驻南京代表兼陕西省政府委员，取消了胡逸民的驻京代表职务，原因是杨见蒋时，蒋说胡逸民说话时靠不住，重要的事不可使他传达。从此胡怀恨在心，到处拆杨的台。

当杨把孙蔚如军撤出甘肃时，曾邀南汉宸秘书长、王一山参谋长和我谈话，他深感自己的力量不够，但雄心壮志没有减消，把退出甘肃看成是伸缩发展中的曲折。他说：“当前的形势，蒋好比太阳，我们好比地球，我们不能不围着他转，但我们必须有拒力，不要被他吸进去。”

1932年秋，蒋电召高级将领在南昌开会，我同周梵伯随杨前往，住在南昌百花洲饭店。应召者除刘镇华、张钫、梁冠英、徐源泉、上官云相等杂牌军将领外，还有蒋的嫡系将领刘峙、朱绍良等。蒋一连几天讲曾国藩、胡林翼治兵方法、军队精神教育等，其中特别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大家不知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几天过后，蒋的药葫芦才揭盖，要各杂牌部队交出10万名徒手兵，集中洛阳，由刘峙编训，为“剿共”的预备力量。蒋当面分配数额，有2万名的，有1.5万名的，1万名的不等，杨的十七路军被指拨2万名。蒋要他们好好地考虑能否照拨，然后对他作答复。这一下把杂牌军将领难住了，稍有不当，就会犯拥兵自大之咎。

当时，刘镇华对这些杂牌将领殷勤联络，自带厨师，熬特好的小米粥，做河南猴头、果子狸等名菜，和大家又吃又玩，在乱

谈乱扯中，许多人表露了真实态度。张钫说：“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有人说：“这是办不到的。”杨却对我说：“刘雪亚混在里边，说话要特别谨慎，说的不当，恐被扣在南昌。”杨同我们每天往城南的青云谱（八大山人出家处）游览，兴之所至，杨引吭高歌，大唱秦腔。刘对杨的招待殷勤，出乎别人之上。

杨为探听何时能回去，曾偕我去看杨永泰。杨永泰是蒋的秘书长，已成为蒋一人之下极有权力的人物，远远压倒了二陈的势力。杨永泰见杨时，讲了些蒋的“剿共”要诀：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论”。告诉杨准备着蒋召见，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又等了几天，蒋分别召见留下的将领，对每人都说：“你有特殊情形，徒手兵不必拨啦。”自动解决了这一做不到的难题。据说，刘镇华给蒋做了这次特务工作，得到了信任，不久发表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杨在回陕时说：“这次到南昌有收获，看了一次官场现形记。”

主持陕政及与蒋介石的矛盾

我在陕西省任过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及西安绥署的驻京代表。从我的回忆中，杨主持陕政期间的表现是进步的、民主的和爱国的，也是和蒋介石反动势力不断斗争着的。

在用人方面，他采取并包兼蓄的方针，大量引用青年进步的人士，包括地下共产党员和失掉与共产党组织关系的青年人。例如省府秘书长南汝箕（汉宸），杨是知道他的情况的，但是信任他，要他负责筹划一切政务，还由南介绍不少青年到省政府工作。又如绥署办的《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辑宋绮云和省府办的《西京日报》社社长蒋听松，杨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但完全信任他们，让他们负责办理文化宣传工作。再如用申伯纯为民政厅书主任，张默夫为省立印刷局长，张汉民为省政府警卫团团团长，

王泰吉为骑兵团长，连瑞琦为机器局局长等，这都是引用进步青年的例子。在教育界中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更多。他邀请李协为建设厅长，来兴办陕西水利事业。李是全国知名的水利专家，杨对李非常尊重。李也常说：“我不在中央，来地方，就是知道虎城有决心要实干，能做出成绩。”杨用李百龄为省府委员，后又兼任教育厅长，李在陕西教育界站在进步方面。他也用黄埔学生，如用唐嗣桐为省会公安局局长。杨用人是只要有能力并为他所用，却不论他们政治背景。还有杨用人不限地域，打破一般人所常有的封建乡土观念。

在民政方面，杨强调民主和重视民意。他认为过去当过县、局长的老手，即是所谓“好”的也不过是会敷衍公事，四平八稳而已；至于坏的，那就贪污腐化，无所不为。当时省府顾问耿寿伯经常讲“新精神”、“合理化”问题，杨特用耿主办行政人员训练所，招训大学毕业和有相当文化的青年，毕业后出任县、局长。我任民政厅长期间，他屡次嘱咐我调用青年人，有朝气才能积极替人民办事。按他的计划，是分期分批用训练和调训的方法，把各县旧官吏完全扫清。

在经济建设方面，杨是最重视的。在陕省连年大旱灾以后，财政困难，不能百废并举，他认为兴办水利是最急需的事，常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说：“陕西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就千方百计地筹措经费，举办水利。

为开发陕省和西北的资源，他函电交驰地请求南京建设委员会派员勘查和拨款办理，还派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子坚到上海，把当时国民党负责主持建设事业的宋子文邀到西北视察考察，希望他投资开发。宋子文在西安设立了建设委员会的办事处，派刘竹君为主任，作要投资的姿态，但后来却什么事也没做。

在教育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增加了教育经费，并规定专征专用的方法保证教育专款不被挪用。他还开始筹设武功农学院，培育农业技术和水利人材。

他提倡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课外阅读研究的自由。因此，在九一八后，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刊。教育厅长李范一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教育政策，想更换思想进步的校长和教员来扭转教育方向，因而引起了驱李风潮。杨暗中支持学生和教职员，并派李百龄出面劝说。李百龄佯为劝说，实际助长教职员和学生的声势。因此，李范一才不得不离开了陕西，李百龄接任教育厅厅长。

驱逐李范一后，1933年4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陕西视察。戴季陶在游历了古迹名胜之后，对杨表示，陕西的学风不好，他要对学生训一次话。杨预料戴对学生讲他那套“理论”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而对戴婉拒，说西安多是初中学生，对他的“高深道理”不一定能听懂。但戴坚持要对学生训话，杨只好着教育厅长李百龄集合学生在民乐园听训。李陪戴上台介绍后，戴大讲中庸之道，四维八德、从文、武、周公、孔、孟直扯到孙中山、蒋介石，说蒋介石现在继承了这个道统。他要学生读死书，不要谈主义，乱搞运动。听的学生不耐烦，群起提出质问，如：“政府为什么不抗日？”、“学生爱国救国不对吗？”、“爱国的人们全要准备往东北去抗日，你为什么反倒来西北逍遥自在地游古迹看风景？”等等要戴答复。戴瞠目结舌，答不上来，学生便一哄而起，朝讲台上扔石子和铜元。戴见势不佳，便由后门溜跑，学生又把他坐的汽车烧毁了。从此，戴不但恨透了陕西学生，连所有陕西人也都被看成“化外之民”，说陕西出过张献忠、李自成“犯上作乱”之人，现在学生都是这一类型。他主张把陕西的陕字要加上“犴”旁，列为没有“王道教化”的“夷狄之邦”。其

实，陕西社会上舆论是同情学生的。西安有一小报——《民意报》说：“苏州结子扬州丝，杭州剪子并州刀，真打得好呵！”打戴季陶是反映陕西进步力量与南京亲日派间的斗争。

南京教育部认为陕西教育非大加整顿不可，未征得杨的同意派来了 CC 分子周学昌来接替李百龄任教育厅长。周学昌是个流氓，以做官为第一，欺软怕硬，对杨表示：“立夫先生着我来一切服从主席，主席叫咋办就咋办。”杨对周很少假以辞色。周以李范一为前车之鉴，鬼头鬼脑地做两面光的教育官，不敢执行南京“整顿陕西教育”之命。

蒋介石认为杨的举动是他下面有共产党人活动的结果，不断来电要杨防止共产党的活动，最后竟指明南汉宸是共产党，要调到南京察看，并要杨另用秘书长。杨不得已，让南去职，以耿寿伯为秘书长。

九一八事变后，杨的抗日情绪是高昂的，除派四十二师北上参加抗战外，对部队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对陕西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也极力支持。

1932 年春，日本间谍在西北活动，并勾结美、瑞间谍由甘来陕，被杨侦知并截获，有小泉浩太（日）、艾克佛（美）、多福寿（瑞典）三人，查到测绘的新、甘、宁等省草图、密电码和勾结少数民族的函件等物证。杨怕解到南京会被害怕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白白放走，在抗日爱国激情下把这伙间谍处决了。这就引起了日、美、瑞三国对南京政府严重交涉，蒋介石严令杨就地了结此案，否则要撤去他省主席职务，并派员督促办理。蒋既怕帝国主义，同时也借此对杨施加压力。日、美也派外交官员来西安坐催。过了几个月，杨巧妙地了结了此案，使蒋失去撤杨的借口。

1933 年 3 月，蒋介石到石家庄约张学良晤面时，我陪杨往石家庄见蒋。杨见蒋请缨率部北上抗日，说比在陕西对国家的贡

献大。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出来后，杨分析蒋是不以杂牌军队对待他，同时知道杨对陕西省并不恋栈，所以表示满意。在会见中，蒋又以关怀的语气对杨说：“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把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杨分析，这是对他用人的控制，也就是为 C. C. 派和复兴社开路。

我回南京不久，从于右任和甘籍监委等处听说，蒋有另派大员主陕西军政之说。果然不久，蒋就发表邵力子由甘肃调陕西接替杨任省主席。这是蒋利用杨、邵关系进一步削弱杨在陕西的政治势力，杨当时情绪是忿怒的。

在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下对红军的防御战

杨与蒋介石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依附蒋介石发展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同情共产党，引用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当红军进入陕境，杨在蒋的压力下，也曾作过防御战。例如，1933 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他派十七师五十一旅赵寿山部据守南郑和褒城，阻止红军北进，同时他又暗派武志平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商定互不侵犯协定。又如徐海东部红军进入商、洛一带，他又奉蒋令派张汉民、唐嗣桐旅在商洛和镇安、柞水阻截。曾记得他说过：“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还有一件事，也是使他难于应付的。他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共产党员，带着队伍投向刘志丹。杨得报后，迟迟地才派团长严佩霖带兵去追，当然追不上了。以后王泰吉秘密到耀县活动，被民团指挥雷乾一提住，公开解交陕西省政府（主席是

邵力子)，报纸上也登了消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都睁着眼看杨如何处置？杨不得已把王泰吉枪毙。事后，他屡次谈到此事，犹深表痛惜。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入川。蒋介石电杨预作防堵准备。杨估计红军如能通过四川，可能到甘、宁和陕北一带。蒋既电令防堵，杨利用这个机会派我到四川见蒋，携带参谋处的“武器弹药补充计划书”要求补充，因为平时蒋对杨部武器弹药补充控制极严。他要驻四川的代表傅剑目和我一同与川军各派将领会见，进行联络，并探听他们如何对付蒋，如何对付红军。我于5月下旬到成都见蒋，报告了防务准备情形并请求批准武器弹药补充计划。蒋说：“共产党很有向北窜入甘、陕的可能，那就是虎城的存亡关头，告诉虎城一点不能大意，更不要迟疑观望，失之交臂，要早作准备。至于武器弹药，用时可由陕库充分供应。”我当即将见蒋情形电告杨。

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和竞选中委

1935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陕西省选出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缙克敬、田毅安、张志俊等人为代表，杨不得不往南京参加会议了。当时，“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先后签订，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杨到京后，见国民党的大员们很少谈论如何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喧嚷着竞选中中央委员。杨对竞选十分消极，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当中委，不竞选也会选上，如是不让他当，竞选亦属无用。南京的朋友劝他说：各省的军政大员，因地位关系，应该竞选中委；党的组织虽由二陈掌握，但在争夺剧烈的时候，陈家也不能完全控制住；再说，如果不参加竞选，会惹起蒋的怀疑。杨听了才有活动之意，同时，陕西省的几位代表拥护他，要给杨做基本票。这样，他才决

定竞选。

那时竞选，第一必须得到蒋的允许和陈立夫统一安排，第二自己要有基本票，才能与别人交换；第三会场内须有人监视画票，不然，选举人尽管信誓旦旦，而临时变卦，就完了。

当时，各地的代表互访交谈，酒楼饭馆相征逐。有的干脆讲价卖票。各系各派的要人，伸手向蒋要中委名额，互相排挤，彼此攻击，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杨决定竞选后，派我和正在陆大上学的陈子坚与驻京办事处处长缙克敬三人分工负责活动。

杨竞选的第一关是蒋介石批定他竞选中央监察委员。因此，陈立夫也是给他安排监委，而我们要求的是执委，再三与陈交涉，他说中央的意思，他不能变动。杨自己分访各代表，风头很高，我们觉着票数也确有把握，就不管陈立夫的安排，继续竞选执委。其实杨对执委或监委不在乎，只要有个中委名义就算完了。

11月中旬，代表大会开幕。杨最关心的问题是应付日本。但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的对日政策仍然是：“在和平未到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杨听了表示非常失望。

投票选举之日，会场内乱成一团，进行了很长时间，夜间开票结果，杨的执委和监委全选成了，执委的票数比监委还多，陈立夫仍照蒋的意思，把杨虎城的名字列在监委中。

杨参加了国民党第五届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他在离京回陕的时候，曾对我们表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另走一条道路等等。

庐山受训

1933年夏，杨交代了陕西省府主席职务后，到庐山训练团受训，我随他前去。受训期中，蒋所讲的无非是“安内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略”以及“剿匪”战术等内容。总括起来，只是一个“剿共”。一次蒋集合一些高级将领作秘密训话，杨对我说：今天委员长讲的与平时稍有不同。”我问有何不同，杨说：“今天他把安内和攘外分开来讲。他说所以集中力量先安内，其目的是为了攘外，因为内不安便无从攘外。希望大家能了解他绝不是不抗战的。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先把共产党消灭，他决定领导大家一致对外。目前谁欺负压迫我们最厉害，你们是全都知道的。”杨又感慨地说：“他说了半天，还是百说不离其宗，必须先安内。他这次所以把攘外提了一下，是因为日本进逼而不抵抗，实在说不过去了。但他只是露出攘外的苗头，连个‘抗日’都不敢明说出来，这还是骗人的！”受完训，杨对我说：“这样只剿共而不抗日的办法，再剿几年，恐怕要亡国了！”

杭州见蒋

1936年10月14日，杨应召到杭州见蒋，我随同前往。韩复榘、徐永昌等也应召到杭。在会见蒋后，杨问我：“你感觉这次蒋是不是对我们冷淡呢？”我就反问他：“你怎样感觉冷淡呢？”他说：“今天会见时，蒋对韩所谈的整军和剿共问题，特感兴趣和重视，对我谈的建议全面抗日问题，只哼哼哈哈，不作答复。在宴会上，对韩和我的态度也不同。他把咱们的军政权削减到现在的程度，认为我们作用不大，还要谈什么呢！”

次日蒋安排到杭的大员游天目山。杨说：“咱们不陪韩向方了。”当晚向蒋请假赴沪入虹桥疗养院检查身体，于10月22日

返陕。

杨虎城自述：

我的家史

我小时家庭贫寒，靠父亲干木工维持生活。我在乡村私塾上学，到13岁时，蒲城连年旱灾，生活困苦，为糊口计，弃学到孙镇一家饭店当徒工。15岁时，父亲被清朝政府杀害。

组织“中秋会”，反对清廷和贪官豪绅

父亲死后，我家无力埋葬，靠邻友资助办了丧事。家庭欠债压在心头，生活更加困难，加之父亲被杀害，使我产生对清政府的仇恨。这年（1908年）冬，井勿幕^①在蒲城发动学生反清运动，一名学生被官府打伤致死，引起在北京的陕籍学生和各界人士声援。终以蒲城知县被撤职，死者家属得到抚恤，反清斗争得到一些胜利，而暂时作罢。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蒲城农民，在大旱灾之后，生活异常困苦。清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豪绅催逼“大加一”的阎王账。官府衙役和豪绅狗腿子横行乡村，逼粮逼债，到处抓人。贫苦农民，无法度日。这都是我亲受过的事实。于是，我同助资葬父的知友们商议，今后如何活下去。大家议定，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抗粮抗债，打击豪绅。凡在组织中有欠债的人，大家帮他对债主采取劫持手段，令债主交出契约，当面焚毁，不得要债。消除组织

^① 井勿幕（1888～1918），字文渊，陕西蒲城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同盟会员。曾任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国民党陕西副支部长。1918年被推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同年12月，被部属杀害。

中人的顾虑，增强对豪绅斗争的勇气。从此以后，要求参加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第二年八月（农历），就有百人之多。大家要求集合一次，约定地点在山上。

当我到山上时，他们早已到齐，还在山上摆了一张木桌。大家推我为领袖，要我讲话。我说，要我当头头，咱们得立个规约。经商议，订出规章：第一，今天是八月十五，我们这个会就名为“中秋会”。第二，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扶弱打强。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革命到底。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

中秋会成立后，对催粮催款的衙役乘机袭击，夺取枪支。又搜缴豪绅枪支，武器不断增加。中秋会的声势壮大起来，引起清政府的注意。我们在地方上已不好隐蔽，便商议把会员正式编组起来，上黄龙山集合。这时人数已达 200 余人，长短枪和刀矛百余件。编为 3 个连，由我任营长，孙仑浪任营附，名称定为“人民革命军”，仍沿用中秋会的规章。我们所到之处，纪律严明，除吃人民供给的粮食外，一律不得扰乱市面，保护工商业，因而得到人民支持，力量不断扩大。

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起义，陕西也爆发反清运动。我部参加了革命军，编为秦陇复汉军一个营。清政府被推翻后，我曾一度解甲归田。到家后，原来逃往县城的豪绅，因辛亥革命胜利了，又纷纷回来。他们听说我们大部分回乡，便又图谋勾结官吏，下乡搜捕我们。我感到安居乐业仍然是不可能的，遂有重整旗鼓再下之念。

反对北洋军阀，建立靖国军

还乡的中秋会员商议，整理一批人员枪支，乘机袭击了下乡

催粮款的警察，夺取了一部枪支弹药。接着又打死了当地豪绅李桢，遂离开家乡、流浪到山区。大家一致认为如此下去，有何意义，便召集原中秋会员做骨干力量，树立起为民除害的旗帜。

民国4年（1915年）冬，为反对袁世凯的陕西将军陆建章，陕西义军四起。老同盟会员井勿幕和杜斌丞策动我部到华县、华阴一带截击陆建章的袁军。在战役中，迭获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把部队武装起来，我们遂成为一支较强的战斗队伍。讨袁军事结束后，我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驻防大荔待机。

民国6年（1917年）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井勿幕在陕西响应，翌年建立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我营被编为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驻防临潼栎阳镇。在整编训练中，总结当年参加秦陇复汉军，打败清军取得胜利后，部队腐化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军队没有正确的领导，无政治中心，缺乏革命观念。官兵受封建思想影响，只图个人切身利益，终为分裂失败。现在又成为一支军队，不能再走老路。要使它成为一支革命的军队，必须从加强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官兵革命觉悟着手。

民国7年（1918年），直系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为巩固在陕西的统治地位，勾结外省军阀部队入陕，企图消灭靖国军。敌军经渭南渭河北岸、高陵县一带西进，进攻靖国军司令部三原驻地。我奉于右任命令，在关山地区阻敌西进，激战六昼夜，虽然伤亡很大，但我这仅千人的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奠定了靖国军在陕西的存在。

在陕西的抗直战争虽然得到胜利，但由于靖国军受优势人陕敌军的威胁，又因广州革命政府受挫，靖国军内部分裂，各部被压被诱，纷纷接受直系军阀改编。我独保持了靖国军的革命人格

而拒绝受编，同于右任总司令转移至武功，重建靖国军。以后将未受直军改编的部队，整编为4个团，名为新建靖国军第三路，任我为司令。

民国10年（1921年），镇嵩军大批兵力进犯靖国军，迭经激战，在敌众我寡情况下，虽取得局部胜利，但总的军事形势对我不利。于右任先生对陕西形势的变化，作了分析，为谋再图，决定离陕，取道四川，前往广州，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善后事宜。我为了保持这支靖国军力量不受摧残，转至凤翔靠山一带休整。到凤翔后，感到孤军无援，决定转向陕北榆林，与井岳秀靠拢，以图生存。

在榆林期间，我和杜斌丞先生接触，又认识了在榆林中学教书的魏野畴。我在和他们接触中，得悉了孙中山革命失败的原因，听到一些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由此增长了自己的革命知识。

在和井岳秀接谈时，我提到部队的训练、建设和改革部队的想法，得到井的赞许。于是提出在安边筹办教导队事，他无异言。现在十七路军的孔从洲、张汉民、刘威诚等人，都是当时安边教导队的学生，他们在部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守西安，声援北伐战争

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垮台，陕西形势随即变化。井岳秀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我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回师关中，在渭北打溃镇嵩军豢养的麻振武部，渭北与西安遂形成对峙局面。1925年“五卅”惨案后，陕西人民掀起反帝反军阀浪潮，我部援助国民三军孙岳入陕，驱逐皖系督军吴新田在陕西的统治，取得胜利。孙岳任陕西军务督办，任我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孙岳旋即东调，留我部在陕西整训。为改善军队素质，在耀县成立

了三民军官学校。现在的步兵训练班，就是仿照那时的三民军官学校创办的。

民国 15 年（1926 年），直、奉联军攻打在河南的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二军遭到失败。吴佩孚乘机派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入陕。当时驻陕国民军守潼关的部队一战即溃，刘镇华直抵西安城下。当时在西安城内仅有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李云龙，原属国民二军系统）一个不完整的师，及陕西陆军四师卫定一的两个团。镇嵩军兵临城下，西安处在危急中。

这时，原在靖国军的许多进步将领和进步人士，聚集三原，和我商议，认为我们是一支有训练有纪律的军队，要求我们与李虎臣联合起来，保卫西安。我召集孙蔚如等高级军官会议，对当时国内军事政治形势作一研究，一致认为保卫西安，抗击镇嵩军，对声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有重要战略意义，决定顺应全国革命趋势，拯救陕西，进军西安。

进城后，召集友军将领李虎臣、卫定一等开紧急军事会议，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决定作持久防御，连夜加修工事，划区分守。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取消了我军的红帽圈，取消原来的杂乱番号，一律称为陕军，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我居副职，统一指挥。在防务分配上，我军担任敌攻重点之东、北两城。

在 8 个月的守城战斗中，我军千百次击退敌人爬城进攻。我不分昼夜地上城观察，也遇到不少次的激烈战斗。有一次听说敌人用棉花包在东门外垒起瞭望台，当我上城观察时，正碰上敌人登云梯爬城，即便和士兵一起射击抵抗，眼看几个士兵倒下去，但为击退敌兵，我仍坚持指挥士兵作战。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也太大胆冒失，假如我个人发生危险，守城的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西安守城能坚持 8 个月之久，主要是我军官兵有声援北伐军

的革命意志，有人民大众的支援，有进步力量的支持。在守城 8 个月的后期，供给非常困难，粮食吃完了，军民的骡马吃完了，还吃过油渣糖（疑为糠）菜，炸弹短缺，用瓦罐装火药打退敌人，但官兵的斗志未衰。

民国 15 年（1926 年）秋，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绥远组成国民联军，五原誓师后派孙良诚率军经宁夏、甘肃东下援陕。于右任随军回陕西三原后，将原靖国军田玉洁等部编成陕西国民联军，于右任任总司令，协同孙良诚进攻刘镇华，取得胜利。西安守城终于胜利了，对声援北伐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东出潼关，参加北伐

西安解围善后处理完毕后，第二年（1927 年），任我为国民联军第十路司令，率部出关，先后战斗在归德（今商丘）、徐州。后在安徽太和休整。为提高军队政治军事水平，在太和创办了一个军事干部学校，培训了一批年轻骨干，充实了军队力量。

在太和期间，我曾因病去日本疗养。在养病期间，我在留日学生中打听国内政治情况，了解到国内派系斗争仍很复杂。对派系斗争，我是很反感的。在日本住了半年多。1928 年秋，部队来人谈，我部出关的部队和原来留在陕西的部队，合编为二十一师，归山东主席孙良诚指挥，并促我回国。此时南京亦电召我回部。

我回国时，部队属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我到南京见冯玉祥，知道部队已开山东，准备进剿刘黑七股匪。当我快离南京时，何应钦招待我吃饭后说，以后有事多联系，并送密电码一本。当时我感到军队派别斗争的严重。我到山东，官兵见到我回部，士气旺盛，很快打垮了刘黑七股匪。

民国 18 年（1929 年），冯玉祥准备发动中原混战，为缩短战

线，令我部撤离山东到河南集中。我对参加派系斗争甚为厌烦，便召集参谋长等高级军官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主张不离山东，不做他人的牺牲品。不久，南京来电，让我部仍驻山东，维持地方治安，部队番号、军费由中央解决。随后我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

“中原战争”发生后，南京电令我部进军河南，转向南阳，并要我兼南阳警备司令，任务是阻击陕西的冯玉祥部队出陕。唐生智反对中央的战役中，我部打垮了驻马店的唐生智军，回师途中受命编为陆军第十七师，后又编为第七军和第十七路军，我任军长兼十七路军总指挥。

民国19年（1930年），我部奉命向陕西挺进时，中央电令我筹组陕西省政府并任主席。我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不久辞去省主席职务。

（据于景祺追忆）

五、筹建反蒋基地，与中共蛛丝暗结

连瑞琦（杨虎城部第七军交际处长）口述：

60

“箱根计划”

1929年1月间，杨宇霆被杀后，我因代表邓演达去联络杨宇霆反蒋的缘故，逃到日本东京，住在久世山好屋。过了几天，忽然杨虎城来找我，他首先问我跑到哪里去了？说他自去冬就来找过我。我把在东北的经过告诉了他，他接着说：“我也是被逼逃出来的，想请你陪我去苏联找斯大林，和他谈谈中国革命的问题。”我就向他建议：“（1）不能去苏联，要回国去抓队伍，尽一切力量在西北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2）不能脱离共产党。（3）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武汉革命政府的纲领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现阶段还是通用的，请你考虑。”杨说：“这要从长好好地研究。”以后我同杨虎城，请胡珮芬（我的爱人）给我们做翻译，去日光、箱根等处，以观风景为名，实则是研究杨回国的课题。我对杨说：“革命军人一定要抓枪杆。你中文不通，俄文不懂，到苏联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是不适宜的。你去苏联一趟，戴上一顶红帽子，回来后，军队里不能再进去，这是我不同意你去苏联的理由。”我向杨建议：“你回国把军队抓到手里，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练10万革命军，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万一失败，可以退到苏联。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杨听到我这一段话，很对他的胃口。但他提出些具体问题：“回部队后，新旧两派矛盾如何解决？杀新派还是杀旧派？”我说：“都不要杀，旧派为了升官发财，筹些钱送他们去京、津、沪、杭等大城市玩，腾出空位置来吸收新派补充（吸收对象，为武汉政府撤退下来的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这样，新派是乐于接受的，旧派亦不见得反对。”杨同意我的建议。但是提出万一共产党还要暴动，如何办？我说：“说服。说不过，给路费送到安全地，绝对不能杀害。”杨又提出要脱离冯玉祥（这时杨是第二集团军第十军长）。我问脱离冯以后，那部队归谁呢？杨主张归蒋，直属南京中央。我说：“这不是投降蒋介石反革命派吗？我不同意。”杨说：“凡是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反，冯也反，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是一样的。归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又说，“我们打入反革命阵营，就是打进敌人的心脏，使其不疑而又得到敌人的信任；回到西北建立根据地。不是更容易吗？”我最后同意暂归蒋介石。这时杨劝我与他一同回去干。我开始不同意，因为我在武汉政府干过，不能公开活动。杨

劝我到南京做一次官，过个渡，然后再到他的部队干。他给我写了三封信，分别给于右任、张继与邹鲁，因为他们都是国民党元老，可以庇护我。我同意杨的建议，与他回国干革命，其目的是想利用杨进入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杨又说：“目前要在国民党旗帜掩护下做工作，要以国民党的面貌做共产党的工作，这就叫做地下工作。”杨称这办法为曲线革命，万一暴露了，设法避到安全地。我问杨：“要到什么时候共产党才能公开活动？”杨说：“部队到了西北，根据地巩固了，并且能够独立，这时就能公开。我们是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我同意杨的意见，根据以上谈话的结果，决定以下计划，我们称它为“箱根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杨和我在箱根车站候车室商定的。

箱根计划具体是：（1）杨虎城决定回到部队，并约我一同回国去活动。（2）部队脱离冯玉祥，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以图扩充发展。（3）尽一切力量，使部队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4）部队干部，尽量吸收武汉政府退下来的青年干部，主要是未公开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5）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扩展革命势力；同时联络友军，互相帮助。（6）部队中的共产党活动，一律采取秘密方式，万一暴露，设法送往安全地带。以上六项意见，作为我们回国后的计划和行动目标。这时杨虎城部队派代表姚丹峰（杨部旅长）等来东京，请杨回国，杨就乘此机会回到部队。我也由东京回到杭州。

重返西北

1929年夏，我在杭州接到杨虎城来信，约我去山东莒县一谈。这时杨的部队已缩编为新编十四师，杨任师长。

他派我为新编十四师上校参议，亲自把委任状送给我，并拿500元现洋给我作去南京的路费。他再三关照我说：“要设法使

部队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第一集团军。”

我从山东到南京，首先去见我的岳父胡大猷。他是蒋介石的老师，蒋在日本留学时，他代理留日学生监督，以后担任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第七团团长。这时陈仪任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代部长，胡任军政部总务厅长。我把杨虎城决定脱离冯玉祥、归附蒋介石的经过告诉他，并和他商量。他说：“冯玉祥突然把河南、山东一带的部队撤退，蒋介石知道冯玉祥是在想法对付他，但又摸不着底细。今得杨虎城离冯来归，必定喜出望外，一定同意。”第二天胡就同陈仪、林蔚、方策（胡的团附）等浙江系军人研究，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他们把杨的要求向蒋介石报告，蒋表示很欢迎。因为蒋介石准备打冯玉祥，所以对杨的要求只好答应。以后杨奉蒋的命令率部由胶东移驻河南南阳。

1930年4月到11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展开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各方面军事集团代表，都来南阳府同杨虎城联络。如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阎锡山的代表弓富魁，冯玉祥的代表南汉宸。当时我担任交际处长，各方面来的代表，都由交际处负责招待。那时杨交给我的任务是，凡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先同我接谈。杨说：“你划格格，我填空。”意思是由我把问题谈妥，他最后请客送行，在吃饭时只说照连处长所谈的办。其中最感难以应付的，就是冯玉祥的代表南汉宸，他是杨的老朋友，又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代表冯玉祥要求杨反蒋。冯允反蒋后杨做陕西省主席，阎允杨做河南省主席，蒋介石也允杨做陕西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把西北军政大权都交给杨。蒋的条件，与杨的回西北计划是符合的，因此杨拒绝了冯、阎的要求。

这时蒋介石提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在河南驻扎的萧子楚、刘茂恩等都归杨节制。杨已下令由南阳府出发进攻冯玉祥。但杨对于这次大战仍很慎重。他同我商量，派我

去南京、上海等地再了解一下各方军事情况，把蒋介石和反蒋军事力量，作一番详细的调查，待“底子”摸清楚后，再作最后的决定。我首先到南京，以十七路军军医处长名义，向军政部军医司要求拨给后方伤兵医院一所（以后改为军政部驻陕十八陆军医院，我担任院长）。军政部很快批准，并拨发医院开办费1万元。这证明蒋介石对杨的重视。

阎锡山一方面联冯倒蒋，一方面又秘密与蒋介石联络。阎把冯骗到山西，扣留在建安村，目的是为了讨好蒋介石。冯玉祥觉察阎的两面手法，密令他的高级将领先打阎锡山。因之阎由北平赶回山西，与冯言和，共同反蒋，并送冯玉祥金钱和武器，百般讨好冯玉祥，但是心口仍不一致。同时蒋介石还引诱韩复榘、石友三等倒冯。

冯玉祥当时是孤军作战，反蒋的力量是分散的。

我到上海碰见柏文蔚、常恒芳和冯、阎方面的代表，他们都要求杨虎城反蒋。他们知道我一贯反蒋，因而把冯、阎的内幕情况告诉了我，还希望杨虎城做冯、阎的调解人。因为冯和阎是貌合神离，阎实际上是按兵不动，对冯有戒心。而冯的内心，也是先打蒋，后打阎。冯、阎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情况，一定要失败。

当时唐生智反蒋虽然失败了，但他还是反对冯玉祥。至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等，都不愿与冯玉祥合作。

我由南京到河南漯河，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已进到临汝镇，这时漯河到临汝镇的交通已断绝，我赶到临汝镇，向杨汇报各方面军事情况。杨说：“你回来乘飞机，就知道消息很好，这一次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是个单干户，而且树敌过多，他一定是失败。我们一定能够回到西北，革命军事基地的建立，是没有问题的。”

杨虎城摸清楚各方面军事情况后，决定帮助蒋介石打冯玉祥，即下令由临汝镇出发进攻龙门、洛阳、潼关直达西安。这时杨的兵力共有三个旅和两个特务团，别动队配合作战。杨在9月17日攻克天险龙门，冯军全部向洛阳溃退。10月9日，杨部又占领洛阳西宫。龙门是河南天险，洛阳又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重镇。这两处的战事，双方伤亡均重，杨部伤亡在千名以上，而对方伤亡有2000多人。洛阳是冯玉祥在后方的军事基地，设有两个伤兵医院，当时收容着2000多名伤兵，未及撤退，都被杨部俘虏，同时缴获冯部的武器辎重亦甚多。杨高兴地对我说：“这比在驻马店缴获唐生智的武器还要多。”

杨部打下洛阳后，蒋介石几次来电嘉奖，并发给杨部士兵“双十节”赏洋每人5元。我向杨建议：“要优待俘虏的伤兵，对于医务人员，一律编入十七路军，医院改为十七路军后方医院。所有伤病员兵，一律按照十七路军员兵待遇，就是双十节每人节赏费5元，亦同样发给。”杨皆同意。但参谋长王一山和军需处长等不赞成，他们说：“敌人的伤兵，为什么还要发节赏费？”杨叫王参谋长同我商量。我对王说：“冯玉祥就是在政治方面太糊涂，但他训练的士兵，是能作战的，而且纪律也很好。我们要设法利用，就是要以冯的下级干部和士兵补充十七路军，这比自己训练起来要快得多。优待俘虏，就是为了吸收敌人方面的力量补充自己。就以这两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来说，把他们收编到十七路军，待遇同十七路军医务人员一样，使他们可以安心为咱们工作。至于俘虏的伤兵，待伤愈归队，亦成了咱们的兵，并且对其他投降过来的官兵，起着良好的作用，尤其对接收冯在西北的全部机关人员，亦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杨虎城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优待俘虏这个原则，是瓦解敌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杨到洛阳，即下令继续西进。10月10日攻克天险函谷关，26日占领潼关。杨到灵宝同我商议接收西安计划，我建议先以原机关负责人接收原机关。杨同意，并派我跟第二旅攻克西安时，主持接收并筹备欢迎杨进西安等事宜。

杨虎城于11月15日在西安就任陕西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及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败退到山西，杨虎城回西北的目的达到了。

暗中筹建反蒋基地

杨虎城到西北后，就开始实行在日本时所订的反蒋计划，积极建立革命军事基地，组织力量，准备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杨到西北没有几天，就对我说：“咱们在南阳府时，只有二三个县的地盘，现在扩大到一省。将来整理西北，干部实在太少了，你赶快把武汉政府时期的干部叫回来。”我问要多少？他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问：“干部的标准如何？”他说：“照咱们在东京所订的计划办。第一，不反共。第二，要反蒋。第三，要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因为公开的蒋介石不同意，咱们的秘密被揭露，这一台戏就不能唱了。至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只要没有受过处分的都要，但是托派分子和出卖共产党的叛徒而投降蒋介石的不要。第四，要国民党左派，不要蒋介石的嫡系。第五，技术人员也要有相当的政治水平、反蒋不反共的。至于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的政治纲领，目前还是正确的。”当时陕西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如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地下共产党员）、财政厅长李子刚（原来是任应岐的代表，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离）和建设厅长李宜之（陕西人，德国留学生，水利专家）、教育厅长李范一（湖北人，留美学生，蒋介石硬塞进来的）。杨要我负责联络李宜之和李范一。杨说：“你们

都是留学生，都是技术人员，你要尽一切力量去拉拢他们。”陕西省机器局（冯玉祥留下的兵工厂）局长由我以十七路军军医处长兼任，杨说：“建设厅同机器局有密切关系，机器局要在物质方面满足建设厅的要求。”

蒋介石因为杨替他打败了冯玉祥有功，特派何应钦为代表到西安慰问杨虎城。当时杨指定我负责招待。何对杨说：蒋总司令希望杨在西北整理5年，就是在这5年之内，不至有什么变动。过去冯玉祥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设施，一律由杨负责接收整理，中央不另派人；所有冯玉祥留在西安的物资，也由杨接管处理，中央决不插手干涉。杨虎城听了这番鼓励他的话很高兴。他对我说：“这与咱们的计划相吻合。但是蒋介石一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好话说完，坏事做尽，对于这种人，要随时提高警惕。”当时何应钦要参观陕西省机器局，有人不赞成何去参观。杨说：“5000多人的一个机器厂，就是不让何去看，他也会知道的。”杨叫我陪何去参观。何看了以后说：“每月十几万元开支的军需工业，应当由中央接管办理。”我说：“生产军火，是过渡性质的。陕西省政府已将它改为机器局，预备制造农具，因为陕西省的农具万分缺乏。将来作为营业性企业，非但不要公家开支，还可补助省政府的经费。”何说：“这样做是很好的。”这时何在西安召见陕西民军总司令甄士仁（寿山），拟为他编几个师，直属中央，目的是想与杨对抗。这就是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的言行不一致，当然也就是蒋介石的言行不一致了。

杨虎城是悉何应钦与甄士仁见面时的情况后，甚为愤怒，当晚就将甄士仁枪毙，第二天天未亮，就约我去临潼华清池洗澡。杨对我说：“善后之事，要请你出马料理，就是去西路收编甄的部下。甄部有1万多枝枪，可以编一个师，师长由李云翼担任；下编三个旅，旅长由甄部原来的人担任；团长多少，由旅长自行

决定。”于是我代表杨虎城去岐山、凤翔一带收编甄部。很顺利的按照杨的意见，改编成为一个师、三个旅。旅长是碧梅宣等，团长、营长由旅长提名，师长决定。并派包围桥等为全权代表，随我来西安，欢迎李云奚做他们的师长。这样杨虎城的武装力量，又增加了1万多。

原属十七路军第七军的三个旅，都升为师。除了四个师之外，还有警备旅、补充旅、特务团、宪兵营等，共计约有5万多枝枪。这时杨对我说：“咱们的军事计划，已完成一半了。”

蒋介石对杨虎城很不放心，又派于右任以查灾名义回陕，想了解杨到西北的动向。杨已料知于的来意，故拒绝于进西安城，把他接到距西安50里的华清池，指定我负责招待。杨要我陪于到各处看看，最主要的是不让于接近群众和干部。最后杨送了于右任10万元，使于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杨在西北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的。

陕西机器局是由冯玉祥遗留下来的六个兵工厂改组而成的。因为杨虎城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可以使兵工厂归陕西省自办，不受南京中央的节制，故改名为陕西省机器局。这六个厂共有5000多工人，制造武器的品种是捷克式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和炮弹等。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扩充，生产军火的数量与品种，都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如步枪、水机关枪和子弹等都增加了。这时机器局生产军火，已成公开，杨虎城对外也不隐瞒。当时有人还想偷偷摸摸地干，杨说：“有四五千工人的厂，生产枪炮弹子弹，要叫人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对生产数量、开支和工人实际数目要保守秘密；尤其是对这些军火的用途，更要保守机密，绝对不能让蒋介石知道底细。他若只知道我们生产些军火，是为了保卫西北治安，使他可以专心在江西与共产党打仗，那他何乐而不为呢？倘若被他知道我们所造的军火，就是为了帮

助共产党打他，那他绝对不会允许的。”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对杂牌队伍，向来不相信，不久，他指示军政部来电：“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杨接电后，十分愤怒地说：“蒋介石欺骗我。”杨认为机器局对在西北建立革命军事基地和反蒋计划，是个关键所在，决不能随便放弃，就派我去南京交涉。

1930年12月间，杨派我代表他去南京参加南京军政部召集的军医处长会议，要求十七路军几个师的军队卫生材料，按照中央待遇。同时向中央交涉，机器局归陕西省办。第一个任务在军医处长会议上通过，凡是中央师的卫生材料，一律按照中央待遇。第二个任务，我去找军政部常务次长代部长陈仪，要求机器局归陕西省办。陈仪说：“中央把这样大的兵工厂让杨接办，是不放心的。”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把华阴庙药厂、机器厂及潼关的机器厂，划归中央接办，改为华阴庙兵工厂，派刘楚才（陕西人，美国留学生）担任厂长。我和杨皆同意这个办法。但我们预先把制造军火的机器和生产弹药的设备，全部搬运到西安。给刘厂长行贿1.75万元，由他呈报中央，就说顺利接办了事。

广泛联络反蒋势力

杨虎城在1930年12月，约我到三原东里堡他家里去谈了两天。这次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件是要我兼任民政厅长，我坚决不肯，因为工作太多。以后派申伯纯（共产党地下党员）担任民政厅主任秘书。第二件是决定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络，去四川与刘湘等联络的代表人选。我介绍傅剑日为驻四川成都的代表，他是四川人，曾参加共产党，其妹是黄英（军长）的弟妇，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杨说：“像这样的人很好，要多介绍几个。”我又介绍黄维时（浙江人，在五四运动时与我同事）为去联络新疆盛

世才的代表。杨问我靠得住吗？我说他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三件是要吸收大量干部。杨对我说：“需要你这样的人，还有技术人员，如修建公路的和工业建设的都要。”杨又说：“靠蒋介石来建设西北交通，是不可能的，这要靠自己；尤其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交通，他不会帮助我们。”

不久，我去南京开会时，按杨虎城指示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

我向邓汇报了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暂时利用南京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情况。邓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了共产党而未受过处分的人。

我在这时，经邓演达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所谓“第三党”）。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的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就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拢蒋的主力军，如十八路军、十九路军等等，都有可能。邓演达不但在黄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仰，我们以后要同邓合作。”因此，邓要求在西安建立组织，杨也同意。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邓演达死后，就停止了活动。

从此以后，杨特别加强了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招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僊（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军事代表往来的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站长，由王若僊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协助杨虎城的军事行动。

邓演达被帝国主义特务在上海英租界逮捕引渡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对杨虎城十七路军驻在西北重镇特别不放心，但又无力进攻西北，故施以种种破坏与限制。如派他的心腹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特务组织CC，以及蓝衣社来西北破坏十七路军。他还以卑鄙无耻的美人计，派女特务向影心，在十七路军做破坏工作。

向影心是某女中学生，生得相当漂亮。被特务头子戴笠诱奸后，送给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胡逸民（南京陆军监狱长）做第三个姨太太。胡带至西安，介绍给杨虎城、马青苑（陕西警备师师长）等。他们去南京时，胡就派向为女招待。“英雄难过美人关”，马青苑以后在天水叛变杨虎城，投降蒋介石，就是胡逸民与向影心所分化的。当时马青苑部下旅长严云生（第三党党员），在去天水时，特来新城手枪营看我。他问我杨与马如果冲突，应当跟谁？我答：“跟杨，绝对不能跟马投蒋。”严在马叛变时，听从杨指挥，打败了马青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邓演达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上海同志来电说：“家长在医院，决定用手术开刀，请急速来沪签字。”我当时同邓宝珊商量，认为这是要我去营救邓演达，他同意我速去。这时杨在临潼华清池养病（杨有重要事，就借名养

病)，我在西安向参谋长王一山辞行后，即赴临潼向杨汇报。但王一山已将我的情形，用电话向杨报告，杨即派卫士一排，在距离西安 20 里的灞桥，将我挡回，软禁在绥靖公署手枪营。第二天南汉宸来看我，他说：“杨没有叛变，请你放心，就是不让你去南京，因为蒋介石来电要你，杨不肯，你去南京，不是正中蒋介石之计？”邓宝珊亲自去问杨：“为什么把连仲玉押起来？”杨说：“这是爱护朋友。”邓说：“爱朋友也不能这样。”杨笑而不答。在我被软禁前，杨约我去逛公园。对我说：“请你休息一个时期，机器局长由我暂时兼任，免得蒋介石找我们的麻烦。”但我兼任的十七路军军医处长及陆军医院院长等职，仍然未动。

我被软禁一年四个月后，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已进入陕西，到达距西安 30 里地的荫家卫，杨才恢复了我的自由，并请我到 he 家里去。杨问我：“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问：“那你为什么知道他们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问：“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杨说：“现在到荫家卫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红军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 3 万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会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蒋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还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向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结果是红军路过西安附近，并未进西安城。

1933年春，杨约我到 he 家里吃饭。杨对我说：“这次红军进入陕西，我们没有抵抗，并且让路，蒋介石一定更怀疑我们同红军有关系。这一年来，我们被蒋介石压得透不出气来，让出甘肃、陕西两省主席，将来恐怕还要派大军来西北，压迫我们去打共产党，到那时候，更难应付了。现在主要的困难是，蒋介石要对我们下毒手，请你去南京一带活动：1. 使蒋介石不怀疑我们同共产党有关系。2. 阻止马青苑破坏十七路军。3. 与反蒋势力联络。现在我们的反蒋运动，正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候，要主动的去联络一切反蒋势力。”从此我就离开西安，到南京、上海等处活动。

童陆生口述：

杨虎城早就同情中国共产党，对红军更没有敌视之意，而且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的活动。1932年春天，南京蒋介石政府有电报给杨虎城，查问共产党员唐哲明潜伏在他那里的情况，并要这个人。他收到电报后，一面叫秘书王菊人送300元给唐哲明（当时任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处长），让他当晚离开西安；一面给蒋介石复电，说此人早已离职，不在西安。后来，我在延安参加“七大”的一次晚会时，看到唐哲明同志，他谈起在西安脱险的经过，盛赞扬虎城的掩护、帮助，使他安全离开西安。解放后，王菊人来全国政协开会时，常到我家来谈心。他说杨虎城对共产党人是同情、爱护的，所谈放走唐哲明同志的经过，与唐哲明所说大致相同。

1933年，南京政府又一次电令杨虎城不能再留用南汉宸、王菊人。杨知道南汉宸等同志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向蒋介石硬顶是不成的，所以，为此事很烦恼。最后，送给王菊人数千元，让他去日本留学。对于南汉宸，不仅赠款让他走，还考虑到他离

职后有被西安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的危险，便令随从南多年的亲信警卫姚云青负责护送他出潼关。当时，姚云青在宪兵营任副官，对西安守城的军、警、宪人员都熟悉，他连夜开汽车送南汉宸到潼关，换乘火车到郑州转车北上。因之，南汉宸同志能一路平安到达天津，再搭轮船东渡日本。姚云青就是现在铁道部工作的姚光同志。

1935年，徐海东同志率部去陕北经蓝田时，谣传红军将攻打西安，西安形势一度紧张，蒋介石也电杨虎城堵截。当时，王菊人秘书电话约我去新城，说杨请我吃饭。我到新城后，杨虎城等候接待。饭后，杨问我：徐海东会来攻西安吗？我答：徐海东不像是来西安的。他接着问：怎么应付蒋介石的来电呢？我答：徐部北上后，即电南京“报捷”。杨虎城采用了我这个意见，向南京政府应付过去。

西安事变中，党中央为了增强张学良、杨虎城的自卫力量，派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援助，杨虎城听说徐海东率部援助，特派宋绮云和米暂沉代表他去慰劳，《西北文化日报》记者杨滨清同行，宋绮云等还和徐海东同志合影留念。

常黎夫(杨虎城部工作人员)口述：

1933年3月，孙殿英因热河阻击日军，一时博得抗日美名，同时吞并了汤玉麟和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保持有相当的实力。5月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争取孙殿英合作抗日。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日，指使何应钦尽力拉孙反冯。孙见风使舵，利用冯、蒋矛盾，向蒋捞得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头衔，企图插手西北，借“屯垦”之名，开辟新的地盘。而蒋早有阴谋，已密令宁夏军阀马鸿逵中途截击孙。孙为便于军队行进和尔后在西北的立足和发展，遂经李锡九邀请南汉宸到包头任该部高级顾

问。孙通过南汉宸与杨虎城取得联系，提出杨、孙联合共同“经营西北”的协议。南汉宸以杨虎城代表随孙军西进。我是在孙部围攻宁夏受阻，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接受杨的派遣去和南汉宸取得联络的。现将我在宁夏李岗堡和南汉宸会晤的经过记略如下。

1933年，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支持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同情“福建事变”，对孙部开赴西北也很注目。同年12月，杨虎城电催高级参议杜斌丞由汉中赶回西安，共商大计。

我按照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随杜斌丞到了西安，隐蔽在杜家，帮助工作。杜斌丞回西安之初，杨虎城和杜斌丞的活动频繁，如派李龙门（李述膺，同盟会员，1919年曾为南北和议陕西代表）去山西、广西分别与阎锡山、李宗仁取得联系；派崔孟博（原任陕西省政府秘书科长）去孙殿英部做南汉宸助手，派杜立亭（1932年任甘肃酒泉专员时为马仲英部的参议）、刘天鸣去孙部，准备分赴甘肃马仲英部和陕北等地进行活动。

时隔不久，形势突变，“福建事变”失败，孙殿英进军宁夏阻滞不前，西安先后派给南汉宸的人杳无音讯，杨虎城和南汉宸之间的联络中断。杨恐南在孙部活动的消息泄露于己不利，心里焦急，乃与杜斌丞商量决定，尽快派一可靠的人去宁夏，务必见到南汉宸以建立联系。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向杜斌丞建议派我前去，杜未答应。王又向杨虎城建议，由杨直接向杜提出说派我去，杜不好拒绝，才征求我的意见。

杜斌丞对我说：“从当前形势来看，此去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给孙殿英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别有用心；而孙反复无常，打个人的小算盘，他能否进入西北，能否站得住脚，毫无把握。杨虎城实力单薄，不起主导作用。所谓‘孙杨联合’没有现实条件和可靠基础。不过，你去了能和南汉宸、葛霁云会面结识，以后

参加社会活动的路子会宽广一点。同时，藉此机会和杨建立关系，以后找机会出国留学也方便一些。去不去，你自己慎重考虑决定。”我认为有机会同南、葛会见值得，当即表示愿意去。

次日，王菊人就约我见面，说他将立即报告请示杨虎城，并约定第二天晚上见面详谈，当天下午，王菊人就将杨写给南的信送至杜斌丞手中。杜将这密写在一块白绫子上的信交给他的夫人米佩英亲手缝在一条棉褥子里边，由杜的公务员取回交我。晚间，我去王菊人家。他殷勤接待，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说杨、杜上午见过面，一切都谈好了，杨主任就不再约我面谈了，争取时间立即起程，归来再见。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希望应黎（我的原名）兄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完成任务！”

第三天，我扮做大学生，由西安动身，于1934年除夕晚抵达北平。初一铁路停车，初二搭上火车去包头。在包头住了两天以后，乘汽车到临河，住入范家客店。范掌柜接待十分热情，他用18元钱代我买了一头小毛驴，雇了一个带路人。二三天后，我由临河动身前往宁夏，借口是去孙殿英部找我患重病的叔父。途中，被孙部哨兵阻拦，引至副官处长王胜处。我说明来意要找南汉宸，王处长亲自陪同我至李岗堡“顾问处”见南汉宸。“顾问处”在李岗堡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总顾问李锡九、高级顾问南汉宸，还有葛霁云和“道道”秘书（“道道”是绰号）四人。我在“顾问处”呆了约20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汉宸的冷静沉着、深谋远虑。他的诚挚态度和许多远见卓识，使我深受教益。从他同我多次的谈话中，他对杨虎城和孙殿英之间联合行事的分析及见解是这样的：

首先，关于杨、孙合作，共同“经营西北”以及在一定时候发表“通电”之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杨与孙谈判此事，经过了李锡九的反复考虑，接受了孙的意见，采取杀牲敌

血、盟誓示信的方式进行。宰鸡、焚香、宣讲誓言没有字据，没有什么“通电”，文稿留在孙的手里，外人不会拿到什么把柄，孙也不可能利用它搞什么别的名堂。这方面杨主任和十七路军可以放心，不会惹出麻烦。

其次，南对孙殿英部作了全面介绍和分析。他说孙部号称五万之众，不一定准确，但他手里掌握3万支好枪是实在的。孙本人出身不正，名誉不好，但他确实是个“怪才”。此刻他急于寻找出路，求得立足生存之地。孙为了去西北站得住脚，和杨虎城力求合作的心意可以理解。现在国内形势变化，“联合反蒋”没有条件，而蒋却授意马鸿逵阻击孙。孙对宁马估计不足，采取大兵密集，攻打宁夏城，倘攻城不利，旷日持久，粮食、弹药不继；加之蒋介石、阎锡山在孙的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前途很难设想。

再次，孙殿英为争夺宁夏城，不顾后果，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杨虎城实力单薄（他对杨部团长以上军官逐个点名作了分析），不能起主导作用。孙部中，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阎红彦掌握的两个连，宣侠文还可以影响带动三四个连，到了不得已时，可拉出去同陕北红军会合。他还说他和宣侠文、葛霁云几个人在孙部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孙与李锡九的关系深，孙以师礼相待；南汉宸他们几个人又是经李介绍聚集在一起的。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南坦诚地对我说，我们是同志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政治目标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杨的代表和联络员的关系。我们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建立在与十七路军的共事和与杨个人友谊方面的单纯关系。至于我们和杜斌丞之间的政治主张，则是完全一致的。

孙殿英攻城失利，军心涣散，内部分裂日趋明显，而孙仍执迷不悟，孤注一掷，组织总攻。南认为败局已定，我必须立即赶

回西安报信。

南给杨虎城写的密信，仍然缝在我的棉裤子里。不久我雇了一个熟悉黄河绕过“水桥”和内蒙古沙漠地段道路情况的人，牵着我在临河买的小驴，驮上行李，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一清晨从黄河冰上过了河。当天进入“三段地”，我被伊盟巡逻队扣押，幸于次晨脱身，晚宿独家店（张天驿）。第三天，我走出蒙古地段，晚抵大水坑，持南汉宸的信住到郑思诚（陕西定边人，曾任国民党骑兵旅旅长）处。当时，郑回陕北与杨猴小及三边、盐池地方一带的团匪串联，与孙殿英相互策应，招兵买马，伺机而动，试图东山再起。深夜，安边地方团匪头子张廷芝来郑处发现了我，向郑提出要扣留我。多亏郑解劝，并于次日下午派赵思忠率骑兵5名，护送我经环县等地进入西峰镇境内。在西峰我住了两日，后乘汽车回到西安。

杨虎城看过南汉宸的复信，表示很满意，说汉宸办事老成持重。

历史证明，当初南汉宸的分析和论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孙殿英久围宁夏两月未下，直到粮尽兵疲，进退难舍，被阎锡山全部缴械。阎红彦拉出来的几个连，因黄河解冻不能去陕北，开进沙漠地区也告失败。

1934年5月，南汉宸在天津和吉鸿昌一起搞地下活动，曾经多次来信邀我去他那里帮助工作，因我决心要从“当兵”做起，皆婉言谢绝。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即他所说的“同志式的关系”。后来，在延安时期，我在南汉宸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工作了5年。

王菊人口述：

西安事变前后，本人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杨虎城将军的机

要秘书。下列记载或属经历，或属见闻，惟所知者只是点滴。事远易忘，记忆难免讹漏。

一、从1933年至1936年间，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曾有过联系，这种联系开始是通过南汉宸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后，榆关弃守，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华北政权“特殊化”……这几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从各方面进行了侵略。在蒋介石“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下，西北人民深切感到，自己即将处于抗日前线，救国保家已成为日益迫切的要求，抗日情绪逐渐高涨。

在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越来越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即便在国民党内的各地实力派中，凡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也都注意到这个正确的爱国主张。

随着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与陕北红军力量的日益增长，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西北地区日益扩大。相形之下蒋介石的所谓“抗日准备”的宣传，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西北人民中，日益受到抵制和反对。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时，蒋介石以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尾随红军，胡宗南到了天水，便按兵不动，这是蒋系兵力深入占领西北的开始。当时据十七路军所了解的情况，胡宗南驻在天水，一是防堵红四方面军向新疆前进，一是对十七路军进行监视。此后，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便逐渐尖锐了。这时，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方面的企图，是让十七路军在陕南给他当炮灰，使同红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十七路军的生存。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孙蔚如部从甘肃集结于陕南汉中地区。杨曾派杜斌丞到汉中见孙蔚如，暗中商妥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

互不侵犯的办法，取得一定的效果。1935年1月间，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地区，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阻击红二十五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很反动，在奉命出发时，对杨说：“我是委员长的学生，我要为三民主义牺牲。”说罢还哭了一阵。结果唐兵败被杀。警二旅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由于太逼近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不知道张汉民的党员身份，也兵败被杀。安康绥靖区司令张鸿远本是个反动军人，兵败仅以身免。因杨屡遭失败，蒋介石电令中带了许多讥讽和训斥的言词，杨当时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1935年12月间，汪锋奉毛泽东的命令到西安见杨，并带来了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杨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杨同汪锋面谈关于抗日救国问题，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得较多。

杨与汪谈过后，曾和某几个人商量过。

他对汪的来历不敢相信，毛泽东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南汉宸商请王世英、梁明德去红区，去红区前，由崔孟博陪他们先到西安，这是1936年2月间的事。王世英等到陕后，杨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回来后再次见面。汪锋和王世英一起被护送着从阎揆要团驻地淳化进了红区。

王世英自红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等等。王世英证明了汪锋的身份。

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红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二、在 1935 年张学良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之下，受到了全国人民抗日高涨的推动，从本身利害关系考虑，已下定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并且开始觅取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

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推翻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以停止内战。杨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办法。

东北军调到陕、甘以后，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新问题。

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没有往来，杨和张也没打过交道。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来的真正意图，杨一时摸不清楚。从张回国和他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时期的言论看，张是拥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还得在蒋的威胁下为他拼命。从这一方面分析，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对蒋是不满的，只是抗日情绪暂时受到了压抑；东北军入关，处处受蒋歧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张对蒋也会不满的；张受蒋骗，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帽子巧妙地让张一个人独戴，张不会服气；张、蒋之间必然蕴藏着很深的矛盾。爱国抗日的思想，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分官兵中是普遍的。深受蒋的压迫，力量不断被削弱，这种处境，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是相同的。就这些情况估计，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是基本一致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两支部队团结合作，觅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是可能的。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对十七路军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的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

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上有很多潜在力量，陕西的部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他严嘱所属，对这些事要绝对保守秘密。

张到西安后，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权。杨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两人来往频繁，在礼貌上杨很尊重张，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是官样酬对，内心话都不肯说。

有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试谈了国内政治形势。杨回来说：“很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杨政治态度的试探呢？推测不出来。

一次，杨约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吃便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到自东北军入关、失去东北三省后的苦处，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况时，他潸然下泪。杨说：“照这样下去（指继续打内战），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事后，杨估计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尚有这样的感觉，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痛苦会更大。上层军官的联络很重要，他们对张会发生影响。”杨即派定专人同王以哲来往。王就派他的秘书孙大胜同十七路军联系。孙在沟通王同十七路军的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政治上对王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张和杨后来有一天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日、意），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未答，

从此以后，张对杨不再谈法西斯这些话了。

蒋的特务，这时极力散布张、杨不和的谣言，在双方之间制造矛盾，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便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并指使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从内部来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之关系恶化甚至火并。实际上当时也存在着可以使蒋系特务利用的机会。情况是：东北军随军眷属不少，经常为了争住房而打架争吵；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了看戏占座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变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双方的一些人，为此确实发生了恶感。双方少数部队之间，因驻地靠得近，有时也互相警戒。日子久了，还引起了双方一些中上层军官的疑忌。十七路军中有些军官，就怀疑东北军对十七路军将有不利的行动，并常向杨报告。这时，杨和张都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好。怎样改变这些情况呢？张把他的朋友高崇民叫到西安，介绍同杨认识。以后，杨和张有些不便明谈的事，高崇民就从中做了沟通工作。这样，上层的关系有些打通了，但下层打架争吵的事，还是劝不止，禁不住。一次，杨对张说：咱们握手言欢，底下（指下层官兵）动手打架，长此下去，不是好事。张随即叫总司令部下了个严整军纪的通令，吵嘴打架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比前稍好了一些。

杨和张的关系逐渐密切了，但有可能招来蒋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二人商量了一个“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掩护杨和张的密切关系，麻痹蒋方特务，避免蒋的怀疑。“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我们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西安军警联合稽查处抄获到的特务情报中发现，大部分是关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即将冲突的报告。一天，杨同张谈话回来说：张同他说：“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

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杨对张说：“往事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实现了抗日，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意即受了蒋的暗算），还会一致拥护你哩。”

在这时候，杨、张之间，对于抗日问题可以深谈了，对于反蒋、联共的事，彼此还在互相试探，都不敢吐露真情。其实，杨和张都分别和红军建立了联系，但都不愿明说。

东北军被红军击败的劳山战斗以前，杨看了“西北剿总”的命令，便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张不表赞同。杨回来说：“他（指张）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吧，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以后，张在见杨时候很少再谈“剿共”了。在1936年的下半年，两人一次见面时，从抗日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这是一次很突然的事。一天杨从张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先生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张又说：那我们对红军怎么办呢？我说：反蒋抗日，红军和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张点了点头。”这时，双方对于停止内战，推翻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下了决心了，但对蒋怎么硬干，怎么软干？在什么情况下软干，在什么情况下硬干，当时还没有定出个办法来。可是杨和张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联共的事还很少谈到外，其他都可以深谈了。

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地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怎么硬干呢？有人主张：等外省军人反蒋，我们便起而响应，出兵占领河南，解决在甘肃的中央军（指胡宗南和

关麟征的部队)，造成割据局面，叫蒋奈何我们不得，那时，我们可以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又有人主张：等着旁人发动，是不可靠的，我们应该先去联络华北和两广，我们干，叫他们响应援助。不然蒋的重兵开进陕西，我们想动也动不了，那样会失算。有人不赞成以上两个办法，他们说：蒋的军力在全国占优势，单纯的军事反蒋会被蒋各个击破，只有在政治主张上得到全国支持时，再辅以军事行动才比较妥当。至于软干，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对蒋用劝说的办法，绝对无效、反而会露马脚，打草惊蛇，那更不好。大家都主张硬干。有人还说：软干是要活的，硬干是要死的（意思是把蒋打死）。最终也没定出个办法。实则在这时候，对于如何捉蒋，也没有设想到。

三、1936年6月初，“两广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华北步步紧逼，所谓“华北特殊化”已渐成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蓬勃展开，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大部分官兵爱国抗日的思想有所提高，厌恶内战的情绪已很普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感到很大不满。杨派秘书蒲子政去太原见阎锡山，到北平和济南见宋哲元、韩复榘，征询如果日本用武力进攻华北，他们将采取什么办法。他们都说：自己的兵力单薄，抵抗是要抵抗的，但要看“中央”（蒋介石政府）如何处理。当时，杨和张曾分析过华北的形势，认为如果日本进攻华北，阎可能投降日本，韩、宋将虚晃一枪，向后退却，日本将不战而占领华北和山西，那时，进攻西北便迫在眉睫了。蒋介石对日本是不抵抗的，借内战以消灭异己的军队，又是必然的。因此，内战不止，自身难保，抗日无望。所以这时候，张、杨正在寻求机会，准备先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的阴谋，推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求停止内战（包括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全国团结，共同抗日。

“两广事变”发生前数十日，从广西常驻西安的代表刘仲容的谈话中知道，两广要联合反蒋，但具体行动，弄不清楚。杨派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叫他打听两广的情况，并从侧面探询阎、韩、宋等，如果两广发生反蒋行动，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崔孟博从天津带回的情况是：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将要见诸事实；韩、宋反蒋是真实的，抗日是不可靠的；阎滑头滑脑，极不可靠；西安方面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听了以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

“两广事变”发生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致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同时，他们驻西安的代表（广东代表的姓名记不清了，广西代表为刘仲容）也积极地探询西安方面的态度。

杨拿着两广的密电和两广代表带来的陈和李、白给他的信去见张，张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愿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张把两广给他的密电和信交杨看（内容与致杨的电、信大体相同），杨也把他的了解到的华北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日未作任何决定，约定次日再商量。

次日晚，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张、杨商定了下列办法。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抗敌，尚感力弱，若内战不止，更是手足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

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 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 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的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办法定了，杨便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

同年7月上旬，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接到蒋叫他参加会议的电报，来找杨商量，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并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不料两广军事，开始便不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因张留沪未回，恐怕一有军事行动张即被扣，迟迟未动。两广军事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受蒋购买，叛陈投蒋，接着，余汉谋亦于7月14日叛陈，两广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张回西安时，两广事变已近尾声，因此，想利用这个形势，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好暂时放置了。

四、1936年四五月前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对所部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副团长杨虎城，训练对象为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任军官。课程分军事、政治两门，以宣传抗日为主。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在西安东城门楼内，秘密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学兵，大部都是北平的进步学生，因遭蒋迫害逃来西安的。东北军还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十七路军很早就成立了步兵训练班，轮训班长以上连长以下的军官和上兵。

但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被蒋介石驱使到陕北前线，担任包围红军的任务（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四十二师、大部分直属旅、团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五十七军、骑兵军等部，都推进到宜川、洛川、延安、淳化、旬邑之线），对这些驻在前方的官兵进行抗日教育，更为重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在1936年9月间，由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用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在前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中散发，以鼓舞抗日情绪。

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们都婉词谢绝了。

如果在外边商号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有时还做点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内，有数

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惟之决定自己监督印订，叫该处负责印刷的科长高自振挑选了一些技术好、并且可靠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春日报》后，加班突击印刷，天明停止，第二天晚上续印。在排版、印刷、装订的时候，王、高二人轮流监视，按实印册数所需发给纸张。印坏的立即烧毁。散工出门时，对印工搜身，以防偷带。印了几夜，印成了8000本，先用王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王惟之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的时候，又用申伯纯（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的小汽车秘密运到甜水井高崇民家，交高转发给东北军前线部队。杨派崔孟博带了两千本送到宜川交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官兵手中，蒋系特务就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印刷是极为秘密的，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护过去。

没过几天，岔子出来了。蒋介石派来监视张、杨的高级幕僚、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约杨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估计，晏对他的话不是无因的，可能是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的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

《活路》事件有关。杨便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

军需处在进行侦查时，首先侦知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一个叫连栋臣、另一个的姓名已忘记，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

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60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双十二事变”结束，十七路军总部撤销，这两个人也被释放。

第二章 西安事变

1935年，张学良率东北军到西安，张、杨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与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张、杨联手，发动“兵谏”。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改变，张、杨的命运也因此改写……

一、蒋介石完成“剿共”策划，内战危机空前

赵寿山口述：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企图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步步退让；一方面积极地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人心激愤，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5月5日发出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团结，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些伟大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中下级军官士兵的拥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当时正处在“剿共”军事的最前线，大多数官兵很快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确主张。

张、杨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介石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张、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表示忧心，对于自己及其部队的前途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影响下，于1936年上半年分别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秘密签订了抗日友好协定。他们相互之间经过在两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沟通，也建立了合作关



在榆林视察时留影，自右至左为杨虎城、张学良、井岳秀、高桂滋

系。他们曾经对蒋介石作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告，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1936年11月，蒋介石乘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1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游行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

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一星期，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事变前我和杨虎城将军的谈话

1935年10月，我在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任旅长，部队由陕南调到陕北前线，当时国家形势岌岌可危，内战不止，我又新遭母丧，心情非常苦闷。因之就借看病为名（我患肠胃病）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进步的及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在各地旅行访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接触过一些进步人士，看到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误国政策日益把中国导向亡国之途。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寇灭亡中国的企图迫在眉睫，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威胁，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1936年10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很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此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

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寇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日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韩的话是这样讲，但是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旦日寇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杨问我：“听说蒋最近严办了几个人，你是否听说过？”我说：“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气，不是惩办几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蛀空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同时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在上海的一些陕西同乡，如杨明轩、杨晓初、赵宝华等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

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是穷佃户家庭出身，一家人靠父亲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给地主家做杂活，不料地主中途把地收回，父亲被活活气死。因此，我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这次读了三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强信念。”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红军是一定能够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着，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抗日救亡的思想问题。”杨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立即回答，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则经过东北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中央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无隐地说：“红军虽然今天只有几万人，但它是会发展的，将来整个江山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过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对我说：“我同

意你的看法，但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旋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桢的精神拿出来（李桢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加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可以用你以前在汉中的办法，但切莫令人看出破绽。把你的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整个十七路军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

他处事慎重，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中间，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谢晋生口述：

我于1935年去西安，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当中校副营长。1936年，营长金闽生调走，由我代理营长。西安事变前夕，宪兵营改为特务营，由宋文梅接任营长，我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副团长。

事变前国特绑架“西北剿总”职员

1936年8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西北剿总”的职员宋黎与马绍周，由某地回到西安，住在西北饭店里。陕西省党部派出便衣特务，到西北饭店进行“围捕”（实际是“绑架”）。马绍周适外出洗澡，特务们便将宋黎绑架而去。行经东大街时，适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的巡查队，便将他们一起押解到宪兵营营部。我正在营部，便对他们进行讯问，才知道这些便衣特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室（即“中统”）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逮捕的以及另一在逃的青年，都是共产党。我又问那被绑架的青年，知道他叫宋黎，是“西北剿总”的职员。

我当时便以省党部调查室这次捕人，既无公文证件，事先又未按照手续会同我部共同办理为辞，要那几个便衣特务回去补办手续，将宋黎留在营部。我急用电话向杨虎城将军报告，这时他已经休息，侍从副官不敢惊动他。我以情况严重，立即又用电话向绥靖公署交际处申伯纯处长请示。申处长接到电话后，即驱车来营部，了解情况后，就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将军。张将军随即派

他的随从参谋孙铭九来将宋黎接走了。

马绍周洗澡完毕回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逮去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立即派随员关沛苍去调查。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一并捉去。张学良将军获悉这一情况，更为气愤，立电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邵力子，请他到“西北剿总”，要他立即释放马、关二人。邵对张说，逮捕宋黎一案，是奉“委座”的命令办理的，坚持不能释放。张将军对邵说：“我是中央委员，你不能释放，我有的是办法。”张随即命令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一批士兵，开赴省党部营救马、关二人。警卫营的战士们到达省党部时已是深夜，看到特务们正在残酷拷打“犯人”，无不愤怒已极，当即对这些特务饱以老拳，救出了马、关二人。

事后，张学良将军怕这事闹大了，便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检查，既批评了特务随意捕人的非法，也批评了卫队营捣毁省党部的不当，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事变前蒋介石对西安形势的错误判断

1938年10月间，我随李奇中由西安去重庆。李任第三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我任该处参谋长。一天，我见了蒋介石的侍卫长张镇。张镇与我早就认识，比较熟悉。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张镇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并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正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

因而大胆飞往西安。当飞机将达西安时，委座还要我们与地面人员用无线电联系，知道张、杨已在机场迎候，飞机这才降落。”张镇说到这里稍停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这也是委座一时判断错误，以致演出了西安这场大乱子。可见对于情报的分析判断，真不容易呀！”

杨虎城与新桂系的联系

事变前，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一天对我说：“主任（指杨虎城）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你有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我告诉他，我在改组同志会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尹曜南，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在广州时与李、白等桂系人物很熟悉。尹还是老改组派，反蒋是有历史性的。

经杨同意后，王菊人要我用我的名义汇了旅费给尹曜南。不久，尹曜南由南京来西安，住在我的家里。过了几天，杨要王菊人转告我：“可以请尹先生即日动身到广西去吧。”杨虎城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怕与尹见面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不见，即令出了事，他也可推说是部下私自搞的。我将这一情况告诉尹曜南，他很不以为然，说：“杨主任要我代表他到广西与李、白联系，却连面也不见，人家问起来，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人也说不上，岂不是笑话吗！”我又去找王菊人，并建议说：“主任至少要接见一次，哪怕不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因此，杨虎城第二天就发了请帖，邀尹到绥署吃饭，我也奉命作陪。在席上，只是寒暄，未谈问题。次日，尹曜南就出发了。

后来，王菊人告诉我，尹到广西，曾有电报托他转给杨虎城。西安事变之前，杨曾与各方暗中联系，在事变当中惟独李、白通电响应，并派了代表刘仲容随同尹曜南来到西安，住了较长

的时间。

冯钦哉叛杨投蒋经过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奉命以急行军由白水赶到渭南（两地相距约140里），以防蒋军董钊部向西安进犯，并掩护驻在陕、甘的我军向渭南集中。特务团到达渭南，正在侦察地形构筑工事并破坏赤水铁桥时，驻在渭河北岸的冯钦哉部（杨部第七军第四十二师）于12月13日晚向我鸣枪示威。我以电话向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报告这一情况。李说：“恐怕是枪支走火吧？”14日拂晓，当面之敌蒋军董钊所部对我还没有什么行动，而对河的“友军”冯钦哉部却对我正式开火。我又用电话报告李兴中，他这时才说：“冯钦哉部是靠不住了，靠不住了。”并命令我团对渭河北岸严密警戒。后来听说，冯钦哉这时已正式发出倒杨投蒋的通电了。

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原以三十八军及第七军两个军为基干。两个军长，一是孙蔚如，一是冯钦哉。孙与杨不但是同乡，而且久共患难，关系非常密切。杨不在军中时，孙总是代为留守。一般人都称孙部是杨的嫡系部队，而将冯钦哉部视为杂牌。蒋介石便利用杨部孙、冯的矛盾，进行分化，收买冯钦哉。以后张镇对我说过其中内幕。

张说：“好在西安事变之前，我们侍从室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不然的话，那真是不堪设想。”接着又说：“十七路军里，孙蔚如和冯钦哉之间的矛盾大得很。孙蔚如这个军，在装备与补给方面，都比冯钦哉这个军好得多。这样，冯钦哉对杨虎城，还能满意吗？委座了解这个情况后，于民国24年9月间，就召见了冯钦哉。委座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有困难，尽可提出，可予解决。冯钦哉竟流起眼泪来了。他把杨虎城如何歧视他的情况诉说

一番。委座安慰他，并立即拨给他 10 万元，作为补充他部队的开支。第二年春天，委座又接见冯钦哉。冯表示对杨极为不满，很想立即脱离这个土匪头子（指杨），随便调到哪里归谁指挥他都愿意。委座又好好地安慰了他一番，并对他说，暂时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再说。这次，委座又给了冯钦哉 5 万元，作为特支费。此外，委座还给他几十枝 20 发的自来得手枪。你想，冯钦哉怎能不五体投地感戴委座呢！”张还说：“委座要我转告冯钦哉，只要他忠于党国，绝对服从，将来可以推选他做中央委员。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冯钦哉，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要我转陈委座：今后只要他冯钦哉能做到的事，一声令下，即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张镇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到三天，冯钦哉就通电脱离杨虎城，拥护中央，等于把杨虎城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这可不简单呀！”

二、先“哭谏”，后“兵谏”，发动西安事变

王菊人口述：

1936 年 12 月 7 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和人们商量，杨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哪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深说，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绝不会听的。我虽同意了张去面蒋劝说，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

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

8日上午，张去临潼华清池见蒋，10时过，回到西安，张告诉杨：“我劝说的结果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走一趟。”据杨说，蒋对张很发了脾气，争辩很久，弄得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无结果而回。

杨去见蒋以前，很斟酌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词，总以不引起蒋的不满或怀疑为原则，因为他已预料到，劝蒋停止内战是无望的。

杨于这一天上午11时左右去华清池，他对蒋说：看国内形



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

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表面上蒋当时的态度很平和，但措词是骄傲而严厉的。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

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少云（鸿逵，当时的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蒋还对杨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怕造成僵局，就回西安了。

当时西安谣传甚多，蒋军万耀煌十三师要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蒋有命令，叫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迅速进驻临潼；蒋命张驻洛川，杨驻韩城督战。这些谣传，都意味着威逼张、杨离开西安去和红军作战。

另一主要情况是：西安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七路军前线官兵，和杨关系一般的，寄信到杨的家中（寄到十七路军总部，要经过收发、拆看、摘由等手续，易于泄露，所以直寄杨的家中，请杨直接拆看），和杨交情久的或寄信，或找杨密谈，纷纷向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意见。有的信上说：“我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战场上。”有的写道：“打死一个日本人，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面目见先人。”他们要求杨率领他们上抗日战场。这时，共产党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也采用不同方式，分别进行争取各界人士的工作，加紧进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因而，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普遍地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这时，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通过朋友间接地向杨探

询：日本在华北将有新的策动，他们的势力甚孤，处境甚危，如果蒋倾全力“剿共”的时候，日本在华北向他们进攻，杨将采取什么态度。

杨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从华清池见蒋回来后，立即去见张，商量怎样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变”的失机），不能失去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捉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

12月9日那几天的形势是很紧张的。蒋介石准备在陕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系的高级将领，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外，其余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均到了西安。蒋准备调其嫡系主力部队约30万人，陆续开入陕西，向红军大举进攻。蒋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此项部署，见于12月12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蒋致邵力子函中）。西北军民各阶层绝大部分人，对蒋介石压迫抗日力量，残酷进行内战，极度反对。尤以西安学生，反对最为激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通过救国会，准备在9日发动西安的大、中、小学生和热心救国的人士，纪念一二·九救亡运动一周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西安军政当局和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会的一位同志和十七路军联络，他估计，这天的示威游行，会受到西安警察局（军统系统）和蒋嫡系宪兵第二团的阻止，要求十七路军予以支援（因为当时担任西安城防和警备的部队，是十七路军）。张、杨于8日得到这个要求支援的报告后，曾商量了一次。他们当时的考虑是：我

们捉蒋是决定了，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他搬到他的嫡系部队中去住，那便弄成打草惊蛇，捕蒋计划会落空；其次，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我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当时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十七路军特务营沿途在两边紧贴游行队伍前进，将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层，使他们无法进行破坏活动。8日下午，通过与救国会有联系的人向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谢华提出了停止游行活动的要求，因为捉蒋的问题不能说，谢华不明内情，曾愤慨地予以指责，并说：“这个运动，已无法停止。”因此，张、杨便采取了暗中保护的办法。

蒋介石得到特务的报告，在恐慌之下，凶相毕露，电话令知西北总部和西安绥靖公署和他的特务机关——宪兵第二团、省会公安局、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学生来请愿时，格杀勿论。”（西安事变中，发现蒋当时给他的特务机关的密令中说：这次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操纵指使”，着“查明拿办”）。看来，蒋在下一步要大肆逮捕，进一步镇压爱国运动。但消息传出后，群众并不畏缩，而是更加愤激。这次游行胜利结束后，9日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忽来绥署报告：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支，说：“我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捉蒋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得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可这时候，张、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并都在那里作陪。便请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这情况后，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逮捕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系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

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当夜的兵力部署是：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上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逮捕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8时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候蒋捕到后即开始行动。等到10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从易俗社回总部问了情况，决定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蒋系将领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过了11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去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了，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这时，杨还没有回来，大家相对愕然。好在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便不等向杨作请示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1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事人员太鲁莽，把大事当儿戏。10日拂晓，张已得到报告，要求负责这件事的人去面谈，张要求急切，连着来了两次电话，后来杨说：“我去谈吧。”杨对张谈了9日晚间发生的事，并告诉张，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捕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张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商量后决定：12月10日准备好，11日晚行动。

对于捕蒋的计划、行动的时间、任务分配等事，于12月11日在玄风桥金家巷张的官邸，商量了两次。在下午2时左右，确定了三件事：（一）决定于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逮捕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逮捕的命令。（三）如情况无变化，12日凌晨在临潼捕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当时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捉蒋的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捉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即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一）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动。派定大卡车四辆，随时准备载兵往临潼捕蒋。到了傍晚，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地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二）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着所部（包括郑培元、沈玺亭、唐得楹三个团及归孔指挥的一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准备内务检查（因为在行动以前，未明白告诉军官捕蒋的行动）。（三）又研究了一次原定的在西安的军事部署：①特务营宋文梅率兵一连，担任临潼捕蒋的任务，归许权中指挥。②特务营（缺一个连）由该营营副张希钦指挥，担任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蒋系高级军政人员，并担任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当时在西安的除担任陕省府警卫、临潼华清池蒋的警卫的以外，下余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武装的任

务；③警备第二旅孔从洲担任占领公安局、飞机场、中正门外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并解除各该处蒋系武装的任务；④教导营担任新城守护和解除别动队及蒋系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官兵武装的任务；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占领省政府，解除驻在省政府宪兵团一连的任务。⑤卫士队白志钧部有两个队，以一个队准备担任住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的中层警戒（当时计划，蒋被捕后，押在新城大楼东房杨的办公室内，警备部队分三层，室内、房屋上边和台级下边的四周），以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即新城内西边杨的住宅）的守护。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在陕西特务头目如陕西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陕西保安处处长张坤生、宪兵第二团团团长杨镇亚以及专员张笃伦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逮捕。其任务，临时分配。⑦准备以电话下达命令，着冯钦哉派精锐兵力，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击潼关，确实占领该地；⑧准备以电报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十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及十七路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不分昼夜，轻装前进，分别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对潼关方面之防御作战；令警备第三旅以隐秘行动，迅速占领咸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之武装，巩固后方；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和城内东南区的保卫工作以及肃清该区内特务的任务，由张的卫队第二营担任；⑩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营长，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十七路军派往捕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担任逮捕蒋的侍从室人员，解除其武装的任务；住在临潼县城内第一〇五师担任占领临潼火车站，监视蒋的专车和解除车站方面蒋介石卫队之任务；⑪西安和临潼的统一行动时间为1936年12月12日上午6时。这时，军事行动，任务分配全确定下来了。

12月11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捕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以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这种事先告诉王的做法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捉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这个慎重做法。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捉蒋的命令，并叮咛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逮捕。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捉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捉蒋的事情安排定了，张约定12月11日晚12时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军事。张来后，十七路军各部队才能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11日晚10时左右，杨和孔从洲、宋文梅对过了表，杨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等候张来。当时，对于事情的发展，把蒋捉来后，一些事情的估计和安排，都详细商量过。例如：（一）改组南京政府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

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二）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三）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四）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五）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六）民众训练，由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东北救国会办理，候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后商定。（七）估计蒋介石被捉后，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首先是军费停发。准备由中、中、交、农四行之陕西省分行提取现金，作为准备金，由陕西省银行发行纸币（自法币停止兑现后，陕四行存有一批硬币），以济军用。（八）东路交通断绝后，民生日用品的来源将断绝，准备与阎锡山商量，由华北采购，经山西运陕，阎利税收，不会拒绝。（九）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他来西安（当晚11时由西安派车，12日中午一定能来西安），由于想到数小时后即下令给冯袭占潼关，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非冯亲自指挥不行，遂又作罢。

将到夜12时了，张学良还没有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怀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捉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张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九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

蒋事先逃脱？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杨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部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杨又说：张汉卿突然举起抗日大旗，是很难见信于国人的。蒋被捉到后，要立即作援绥行动，带上蒋介石一道援绥何尝不好？我们离帝国主义远，谁也给我们戴不上勾结帝国主义的帽子（这是有感于“两广事变”而言），顶多只能造谣说我们勾结苏联，真能勾结上苏联也是好事。杨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他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同时，他看着地图，问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分析了他们对蒋的真实态度，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那时我们的士气是高涨的，对方的士气是低落的。又说，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三个方

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问了东北军高射炮队的情形，叫早把位置安排妥当。又叫把十七路军的自造高射机枪（把重机枪架在三角架上，可以转动仰射）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咱的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在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十夜晚 12 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张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捉蒋部队立即出发，杨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隐秘布置，准备行动。到了 12 日上午 6 时，孔从洲

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来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

因为这次事件，决定时间紧迫，布置不够周密，行动又很仓促，所以发生了漏洞。东北军捉蒋的部队，对华清池周围的地形不清楚。张在事先带白凤翔、刘桂五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只是认清了蒋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蒋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开关。跳出窗子，向西是华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东沿房后山边是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东跑。因为事先无法观察地形，包围圈不周密，漏掉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估计：蒋可能向东跑上山，或者再向东跑向公路寻他的专车上的武装，也可能由东南逃向山区。那时还担心蒋介石急急忙忙绊倒在石崖下被摔死。当时我们判断，蒋没有事先跑了，而是临时逃走，按体力说他跑不动，按时间计算（距开枪时间不到一小时）他跑不远，按地形说他只能在骊山附近。张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约8时左右，刘多荃来电话说，蒋介石已捉到了。这时，大家拍手称快，张命令孙铭九等立即把蒋押送西安新城。

蒋介石被押送到新城时，从前门十七路军总部交际处门口下车，步行走向大楼。看来，蒋介石这时又冷又怕，脸色灰白，头上还沾了一些黄土，走路也不稳。白凤翔去搀他，他还故作姿态不叫扶他；白一放手，他又左右摇摆走不动；后来还是两个人把

他扶到新城大楼去的。

张、杨相继见蒋以后，蒋写了个条子，叫邵力子去谈。这时邵力子已被拘在新城。蒋见邵时，因为宋文梅奉令在旁监视，蒋以目向邵示意后，即向邵大讲总理（孙中山）蒙难时，他是如何“忠贞”地“拥护”总理，“使免于难”等，以自欺欺人。邵力子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委员长一样了。”蒋默然，邵即退出。

蒋介石被捕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这时，设计委员会（事变后成立的政治咨询机构）尚未成立，一些人便立即商量这件事。

（一）对这个事件应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双十二抗日革命运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无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有人主张用“兵谏”二字，大家觉得合适。所以在号外第一号中这样说：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2）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3）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4）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二）关于八项救国主张的商讨。这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商量提出了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一切政治犯；（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6）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准备在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并赞同两广的抗日主张的通电中列入的，当时因为张学良滞留上海，通电未及发出，“两广事变”已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这天

早晨，十七路军方面，便将这六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六条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的八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一定要给我们戴个“赤化”帽子，以此在国内各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在另外第二号中就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在通电中也列入了它。

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曾约十七路军的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

杨先让大家说。这时有人主张立刻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步，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

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项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蒋介石被押在新城大楼，开始他用“写遗嘱”（即写给宋美龄的信，是12月12日那天写的）和拒绝吃饭的姿态，试探张、杨对他的态度。张去见他，他仍旧摆出一副“老子的架子”，拍着案子叫。张严厉地对蒋说：“我们不要吵，等到民众大会上去讲理。”蒋听了，以为要在民众大会上去公审他，立即收起了流氓吓人的架子，突然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了。蒋还时时用乞求、拉拢的手段，对看守他的军官、勤务兵买好、许愿。但这些看守人员都奉到严格命令，不许泄露外边任何情况。蒋由于摸不着头脑，对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房门的——开一关，时时表现出疑惧的心情，日夜不能入睡。

张、杨对这事，曾经商量过。认为将来还得放他，不能使他身体吃亏，这一点要考虑到。为了给蒋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13日决定，将高桂滋在西安新建的住宅收拾好，让蒋介石住进去。当晚12时左右，派刘多荃、宋文梅等人办这事，不料把蒋吓得要死。

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在夜深人静时，蒋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一见刘多荃、宋文梅等进来，宋又在武装带上挂着一枝左轮手枪，便立刻吓得面无人色。当时怕蒋自杀，把房内的电灯摘了，点了一支蜡烛，在烛光摇曳下，蒋的面色惨白得更难看。他睡在西北角的床上，面朝西，浑身打战。蒋手支着腰，连

声唤呀，表示疼得受不了。其实这些人未进去以前，在门口听了一会，他虽然未睡着，但并未呻吟。大家看了蒋这个样子，知道他是怕枪毙，又恼、又好笑。

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哎呀之中带出了哭泣声。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唠叨着要死，话也说不成句，也听不清，看来他实在是害怕到了极点。宋文梅使了个眼色，大家便到大厅中去商谈办法。刘多荃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明晃晃的左轮枪，说：怪不得吓死他，把枪带在衣服底下吧。正商议着，孙铭九奉张学良的命令来问搬家的事，腰带上也明带着一枝左轮手枪，刘多荃便说，你又来吓蒋介石哩。孙铭九不知为什么，大家告诉了他蒋介石丑态百出的样子，孙和宋都把手枪藏到了衣下，几个人二次进到蒋的房间，刘、宋、孙再次向蒋说明，请他移居是为了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决无他意。蒋显得更害怕了，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呻吟呜咽。等了一会，四个人仍然没有办法，才分途回去向张、杨报告。这时已是深夜两点了。

第二天，张、杨才陪着蒋介石搬了家。

12月10日晚，张、杨对于捕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12日拂晓立即行动。这时候，对于捕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不能不作一次估计和安排。当晚，张亲自驾车，未带一人来到杨的新城官邸，谈至深夜一时，张才离去。

这时的估计和安排是：

(一) 广西李、白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远水不救近火；韩、宋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力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和豫西是可信的。

(二) 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蒋军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 10 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无立即集中对我方作战的可能。

(三) 当时主要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确保潼关，才有时间从陕北及陕甘宁边界调集我们的兵力。当时估计：前线部队，日夜行军，要集中到西潼路上，平均约 5 天左右。

(四) 使用于迅速袭占潼关的部队，只有驻在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能够担任，此外无其他部队。

(五) 商请中国共产党派红军一部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 10 日左右，可以到达商洛一线。这时蒋军在商洛无军队，红军到商洛的行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比蒋军速，红军对商洛的地形熟，且有群众基础，当时希望红军担任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

(六) 希望红军以一部兵力进出于西兰路甘肃境内，以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征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向陕境进逼。

(七) 对驻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之一部，由十七路军警三旅采取迅速行动包围缴械。对于蒋军在汉中之王耀武旅等，我军只在宝鸡一带布防，防止其北进，因其兵力不大，对我们威胁较小。

(八) 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获得人民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确保潼关及迤南商洛一线。同时，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要巩固西兰路的布防。北面是红军，是可靠的友军；汉中蒋系王耀武部，一时尚无力进犯关中地区。

(九) 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

(十) 预计蒋一被捕，南京政府必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做抵押品，南京政府方面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韩、宋如果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南京政府也必然不敢孤军深入。这些，对我们集结兵力进行防御是有利的。

(十一) 这时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造成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武装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召开有各个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当时曾设想在西安召开），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错误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

这是 1936 年 12 月 10 日晚，张、杨交换意见的结果。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洛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

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此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亲日派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地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1936年12月20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赵寿山口述：

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早已有所谅解，到了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12月9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张的特务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在此以前都曾接到准备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领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即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菊人。此时杨正在易俗社剧

场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看戏，张因事尚未到剧场，王即从剧场将杨接回，告杨以宋的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又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立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随即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即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立即布置，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的路上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剧场后，发现张竟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他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他命王菊人赶紧查问，并说如果行动时要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与张离开剧场。为了不使南京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立即又回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查路。宋急忙跑回告知我们真实情况。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明晨5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向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3000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上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旋即带着11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5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

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全部胜利完成任务。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消。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团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16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且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代表蒋介石）。同时，对防御南京政府亲日派发动的“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

西安市公安局长。到任7天，一切安排就绪。因为要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将开至关中，因此杨又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准备防御战，一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12月19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十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说明了扣蒋的必要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说明红军将要开到三原，我们十七路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结成友军，准备抗日。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高兴。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部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做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

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白志钧(西安事变时为杨虎城警卫)口述：

1936年12月大约16、17日傍晚，我正在新城杨主任住宅警卫，电话兵李某说有潼关的长途电话，我立即去接，对方说于宣慰使已到潼关，请杨主任接话。我问于宣慰使是谁，对方说就是于院长。我立即往报杨主任，这时杨主任正一人在房中桌上看文件，听说于到潼关有电话，即立起说：“老糊涂啦，回来做啥来了？”拿起耳机而电话已中断，杨主任说：“你要潼关电话。”我要总机接通后杨主任接过说：“你是于先生！”对方说了一阵话，杨主任接着说：“你是以宣慰使名义回陕西，就请你不要进潼关，你要是回陕西探视，我派人来接你，我欢迎你。”对方又在电话中说了一阵话，杨说：“如果你一定要以宣慰使的名义来，请你把你的宣慰使旗帜打回去。”此时杨主任的态度已表现出来很生气，说话声也高了，对方仍在电话中喋喋不休，杨主任生气地接着说：“我是要求抗日，并不是叛变蒋介石，你把局势都看不来，你回西北宣慰谁来了！”对方又说了一大阵，杨主任更生气了，最后说：“你连现在局面都看不清楚，真是老糊涂了。”说着就把话机尽力往电话上一摔，骂了一句“老松”，口中还嘟囔了几句，我没听清，此时电话铃仍响个不停，杨主任大声说：“搁在那里不要接，老混蛋连时局都看不清，真是……”以后对方再无声息，我看主任很生气，便悄悄地退出来了。

事隔多年，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杨主任的原话，也是努力追记出来的。可能还有小的出入，但大体上是符合当日事实的。

(吴莲伊记录)

三、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

王菊人口述：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作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12月25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杨没有料到张会亲自送蒋走，但此时已无法阻止。蒋在机场对杨说了几句不打内战，数日之内叫张回来，西北的事情归张、杨负责等骗人的鬼话。张上飞机送蒋走了。

杨回新城后，立即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不过蒋、张已走了，只好商量下一步的办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这时大家思想很乱，只是对张回陕，还未丧失信心。

不久，张又来信，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让他们无形中成为人质，飞机也

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张随蒋走后，形势迅速恶化起来。

(一) 蒋放走了，我们手中的抵押品没有了；张随蒋走了，反即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抵押品。我们曾经主张，暂时不放陈诚等，候张回来再放他们，后来也放走了。这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制造分裂等手段一齐来了。

(二) 在十七路军方面，杨渠统（子恒）运动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投蒋，还有人运动宋文梅脱离十七路军，并运动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芳团等。对十七路军杨以下的高级将领，蒋以脱离杨为条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离间拉拢。在地方民团中，蒋方委任马青苑、毕梅轩为陕西民团总指挥，利用这些反杨分子，煽动民团叛变。这时白水的刘子威宣布“中立”，富平的周公甫、蓝田的张子厚、长武的马继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团，均有不稳之势。

(三) 在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不能指挥全军，其他某些军、师长，在张被扣后，据报在南京分别派代表向蒋输诚。内部新旧之间，也在营救张回陕与其他个人利害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矛盾。

在这样的形势下，渭南前线，陈诚指挥蒋系数十万部队向西进逼；商洛方面，蒋系卫立煌指挥大量蒋军，威逼我军右侧；黄杰通过冯钦哉指挥部队向三原、蒲城前进，准备对我军夹击。而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内部发生了越来越不稳的情况。

杨处在这样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认为营救张回来，才能团结东北军，蒋介石放张不放张，也是蒋是否有诚意改变错误国策的

标志。杨派代表在南京、奉化和蒋谈判以后，认为：不战，便无法撑持局面，不战更无法营救张。当时希望，渭南前线不撤兵，不为戎首，作防御战，表示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当时希望打几仗，一方面使华北宋、韩、桂李、川刘有武力调停的理由，一方面使蒋方认为，不放张回来，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十七路军内部，作战还可巩固一时，若和平解决便会各寻出路（因为有些军官认为，和平了，十七路军便完蛋）。这时杨的决心是主战的。他去渭南前线视察，对部队讲了话，接见了一些军官。他回来告诉我们，士气相当激昂，打一仗再谈和的办法好。蒋介石吃软不吃硬，你越软他越欺负你，你硬了他会软的。这时，十七路军军需处印了许多自己发行的军用票（票名已忘记了），以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用。

这时，也作了作战失败的准备。赵寿山部队，使用于渭北警备方面，为的是对洛水之敌施行戒备，并确保三原、耀县一线。万一失败，便退到三原、耀县一带，逐步抵抗，以待局势变化。

当然，战败，十七路军可能被消灭，杨本人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考虑到这一前途时，杨也有动摇的一面。因此，一时间，对主战的人们，杨表示主战的意图，对主和的人们，又曾表示主和的愿望。

后来从奉化的谈判中，他看出张回来是无希望了。接着，东北军的檀自新师叛变了，陕警三旅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这时，仗是打不成了，只有和的一条路了。但是，要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少壮派军官是反对的。东北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张永无回来之望。十七路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十七路军便完了。这时，打不下去，和不下去，杨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

四、国民党耍手腕分化瓦解,西安城四面楚歌

孔从洲(西安事变时任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口述: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完成了“剿共”军事部署。随即,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麇集西安,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如矢在弦。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去,问到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他特别强调了夜间训练的重要性。又问到西安市郊国民党军、警、宪、特分驻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警戒兵力。我就我所知作了回答,他不满意,要我更详细地了解后再向他报告。我回来后,意识到要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遂立即作好准备再去向杨报告。当晚10时左右,杨来电话令我11时开始夜间演习。我急忙赶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他注视着我,很严肃坚决地说:“按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个指示,部队采取不同形式连续数晚进行演习。至12月11日晚9时,杨先生又叫我去,一见面就问:“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说着,我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份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国民党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仔细看后,说:“很好。”我们坐下后,他接着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扣蒋,逼他抗日。两军的

分工办法：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军政大员，扣留飞机，统由你负责解决。你的意见怎么办？”我听说要扣蒋，心情极其紧张兴奋，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当时杨任绥靖公署主任）。我问：“赵寿山、孙蔚如先生刚从三原回到西安，他们是否知道此事？”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先到副官室候着。”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我翻了下手掌，示意要对蒋介石造反了。赵没有说什么即进入杨的住室。不久，孙蔚如也到了。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又大致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扣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要干就干到底。”当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决定次日成立戒严司令部，孙任戒严司令，赵兼市公安局局长。指示我要把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并决定部队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8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的兵力，有以下几部分：一、宪兵第二团杨镇亚部约1000余人；二、市公安局马志超领导下的公安总队，约2000余人；三、省保安处长张坤生部保安团，约1000余人；四、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1000余人，该部装备较强，多作潜伏活动。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散武装，合计7000余人。我所指挥的部队，除警备第二旅三个团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8000人。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我和部队刚回到营房，准备稍事休息的时候，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找到蒋介石，你立即

率部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防蒋介石潜逃。”听说未扣成蒋，我很惊讶，立即率一个营赶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杨总部打来电话说东北军已把蒋扣押了，我才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下来，赶回西安。

西安事变扣蒋之后，张、杨于当日即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这天晚上，我因事到杨先生处，他对我说：“周恩来先生今天下午到西安了，这下我们就好办了。几天来，无论我也好，张先生也好，都对蒋谈过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但我们和蒋仍然有长官部属关系，说话不能没有一定的分寸。蒋敌视我们，更听不进我们的讲话。周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和蒋介石有十年血海深仇，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和蒋处于平等的地位，对蒋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做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他接着问我：“西安那么多特务，事变后跑掉了多少？”我说：“跑了一些，但绝大多数潜特没有暴露。”又问：“还有活动没有？”我答：“还没有发现。”他说：“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就会出乱子。”他强调指出：“周恩来先生住在张先生那里，自然有东北军卫队营担任保卫工作，但那只限于城东南角一块地方，整个西安的治安是由我们负责的。寿山虽兼任公安局长，但警察是马志超一手训练的，今天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为我们防范的对象，况且寿山还有旁的事情。你是城防司令，指挥我们驻西安的部队，必须负起全部治安责任来，特别是对周恩来先生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要注意。他们都没有自卫力量，而且要到处活动，安全问题完全靠我们了。我已将十七师从渭北调西安附近，加强对西安的防卫。关于西安市的城防问题，你和暂沉研究一下。”根据杨先生的指示，

我和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交换了意见，将军法处统辖下的执法队和各稽查所，统一于城防司令部领导之下，加强了保卫工作。

约在12月20日，左权同志来到西安。杨虎城先生叫我到他的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同志。左权同志中等身材，身穿灰布军装，十分精干。杨先生在谈话中强调说：“‘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作好防守西安的准备，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你身兼西安城防司令，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军团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左权同志和我互相问好之后，便一同乘车巡视西安城防情况。左权同志登城观看地形以及在郊外一些地段进行现地勘察时，十分专注、认真，并曾问及1926年杨部坚守西安与刘镇华作战的经过，提示要作为参考。回来后，又详细地询问了我所指挥的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他的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令我深为敬佩。我们向杨先生汇报时，杨深感满意，一再向左权同志表示感谢。关于我对中共代表团的保卫计划，在左权同志帮助下，作了更周密的部署。从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一直到我奉命率部调离西安移驻泾阳，前后50天之久，我日夜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所幸尚未发生什么事故，这和左权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42年，我部驻河南巩县时获悉左权同志牺牲，我深为悲痛。

西安事变是要和平解决，推动救国抗战，而不是诉诸内战。这在事变发动后的通电中使用“兵谏”一词，已作了明确表示。事变以后的战争叫嚣，首先来自南京政府中以亲日分子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他们除用陆军进逼外，还派空军轰炸。放蒋以后，蒋介石背弃诺言，乱命频发，扣留了张学良，并派其嫡系高级将领指挥近40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计渭河南北各为一

立煌指挥；甘肃、宁夏各为一路，分别由蒋鼎文、朱绍良指挥。其气焰之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一举吞没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势。

这样的军事威胁，怎么能使西安军民不感到万分激愤呢？军民无比的激愤情绪，酿成了一致准备应战的呼声。最后，中共代表团也作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应战的决定。所谓准备应战，绝非不要和平解决，而是为着防范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突然袭击。因此，西安方面在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先生决定之下，在准备应战的同时，接连发出1月5日的歌电，2月4日的《和平宣言》，2月14日杨虎城领衔的致蒋介石的寒申电，揭露南京的战争叫嚣，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生了有利的作用。蒋介石就是害怕这种揭露，他曾对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说：“告诉虎城，不要再发那些无聊的电报。”他企图要大家以不声不响的和平气氛掩饰他对西安军事进攻的真相，杨虎城先生坚决不同意。

杨虎城先生出身贫苦，投军从政后，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他的思想转变，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压迫日益严重，他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也由于多年来不断受到中共的影响和启发。大革命初期他和中共即有接触，以后在皖北太和且有过合作。特别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的感召，并派汪锋同志持亲笔信到西安见他，为他指明出路，就使杨欣然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不避艰险，亲率代表团到西安和蒋介石谈判，对张、杨部队进行工作，这对杨虎城的影响极大。杨先生极为赞佩周副主席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

蒋介石被释放时，张学良先生未得到杨的同意即陪蒋回南京，以后被蒋扣留，这对杨虎城刺激很大。他既担忧张学良的命

运，又深虑张走后留下的摊子无人领导。记得在放蒋的当晚，我震惊之余，即去见杨。杨当时精神极其沮丧，他对我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 he 事前也毫无所闻。周是他自己发觉之后，才赶到飞机场的。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说完长叹了一声，要我回去严密控制部队，他要去找周副主席研究商量。

南京政府演了一套扣张的滑稽剧之后，又布置了一套政治的军事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十七路军固然有王劲哉旅和沈玺亭、唐得楹两个团等部队的叛变，但毕竟还有杨、孙（蔚如）、赵（寿山）几位领导人在，尚不影响大局。严重的是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立即出现尖锐的矛盾。特别是王以哲将军被杀害后，形势更为险恶。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周副主席和叶剑英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加之张、杨两军绝大多数干部的团结谅解，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使蒋介石企图借刀杀人、坐观自相杀戮的祸心未能得逞。

杨先生在这一时期，对我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红军和东北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恩来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决定。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孝侯（学忠）名义上是头头，那也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

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哪里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也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他们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地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从杨虎城先生的谈话中，我深感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杨向来行动果敢，勇于负责，这时，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代表团最后提出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作战的决定，乃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体现，与和平解决绝无矛盾。相反，由于预先有准备，使蒋不敢轻举妄动，终于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蒋介石迫害下，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1937年6月下旬，我赴上海送行。有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长谈了3个多小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赵寿山也在座，谈话中间赵有事出去了。杨先生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他首先从陕西辛亥以来的军队历史谈起，他说：“张翔初（凤翔）早完结了；陈伯生（树藩）也没有搞几天就被消灭了；胡笠僧（景翼）、岳西峰（维峻）、李虎臣（云龙）都曾率领过号称十万之众，轰动一时，到1930年前都烟消云散了。十七路军是由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合而成的，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从民国初年成军到靖国军时期一

真是这样。靖国军失败后，我们退到陕北，有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安边教导队的举办，对我们参与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到1929年，留在关中地区的部队开到山东集合后，经过几番整编训练，才成为一支像样的军队。1930年回到陕西，取得了地方政权才扩充到约6万人，成为陕军中硕果仅存的部队。这倒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或者像刘镇华之类凭钻营做官把部队保存下来的。在我今天被迫出国暂时离开你们的时候，回顾过去20余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

第二，杨谈到十七路军历史上分化的经过，他说：“靖国军后期，段懋功由我们团体中拉出去了，并和我们打了多年；到我们撤退陕北的时候，任子扬不跟着走了；西安解围后，冯华堂自动跟方振武，也去了；不久他们都完了。马青苑叛变，只落得只身逃走，成为军统特务的一个小喽罗。杨渠统虽不算叛变，但出去以后，我看情况也不妙，终有被蒋介石吃掉的一天。最近这一次分化，我也不感到意外或惋惜。冯钦哉也好，王劲哉也好，沈玺亭、唐得楹更无论矣，我看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他们走后，使我们的部队更困难，但也更纯洁了。”

第三，他出国后部队的前途问题。他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蔚如、寿山同你相处有年，你们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精诚团结，舍此，就会被蒋介石肢解消灭。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只

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最重要的一点，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靖国军失败以后来到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我们由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直至部队回陕，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杨）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跟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愈来愈严酷。我几经试探，并去石家庄亲自见蒋，要求参加抗战，均遭到拒绝，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因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以及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但我深信中国不会亡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长久。过去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三个因素，即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便可以使这个王朝覆没。蒋介石已兼而有之，再加外有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我很同意那位朋友的想法。1935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想过，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是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考虑的，也会相信我们这个部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因此，又建

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蒋介石是集古今中外反动派统治之大成的人物，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他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们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魏）野畴、（南）汉宸都很熟，也和（张）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部队内也还有（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连），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言下唏嘘。谁知这一次长谈，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赠言。我和他的生离死别，至今思之，仍不免于默然神伤！

五、投机者利欲熏心，杨母被扣作人质

杨大实（时任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口述：

张将军送蒋回南京，久无归期，遂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特别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对如何营救张学良回西安，曾多次研究对策，终因主张不同，难得一致意见，分成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军长王以哲等人因主张不同而遭杀害。西安阵营，内部不稳，矛盾重重。在南京的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带两种法宝，一手拿钱，一手拿官，前来西安地区活动。只要背叛张、杨阵营，投降蒋介石，军长可以升任省主席，师长

可以升任军长，旅长可以升任师长等等，黄金钞票大量奉上。这种欺骗手段，果真有效，把一些利欲熏心败类将领们诱上了贼船。

当时，驻防在陕西省蒲城县的东北军骑兵军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就是受骗叛变而投降的，蒋特务们给他30万元的现款，并将师扩编为军，檀任军长。檀遂于1937年2月2日发动蒲城叛乱，突然袭击县保安团队，扣押了团长韩寅生、参谋长呼延立人，软禁了杨虎城将军的母亲，以为人质。纵兵抢劫，奸淫烧杀，人民涂炭，杨将军对此内心十分不安。当时杨肩负着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母亲正居住在蒲城原籍。他很想把老太太从蒲城接出来，但无适当人选，何柱国推荐我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我当时是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当何传达杨将军的意图时，我立即承应。不久，就有几位我的要好朋友，来到我家，劝我不可去蒲城。一位朋友说：“檀自新这家伙是土匪出身，杀人不眨眼。他现投降了蒋介石，就是我们的敌人了，如果再以朋友的心情去看待，那是非常危险的。你去了他可能拿你祭旗，你何必冒这个风险呢？假如你推故不去，柱国不能把你怎样，杨主任更不能把你怎样，我看你应该三思而后行。”其他说话的人都是劝我不要去冒险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把我弄得七上八下，二心不定。正在人们纷纷议论之时，忽然一个人推门而入，一言未发，只听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并掩面啼哭。仔细一看，原来是骑兵十师驻西安办事处姜伟杰处长，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急忙说：“老姜，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快起来。”老姜说：“我不能起来，除非参议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赶快说。”老姜说：“昨天我和你谈的我们骑十师有变动的消息，在见我们师长时，千万别说我谈过这话。”我说：“赶快起来，这事一定能办到，一定能办到。”但老姜还是不

起来，又说：“我们师长那人手黑，杀人当吃盐豆。假如他知道我走露消息，我的命马上就完了。参议呀，您要救我这条命。”说着又大哭起来，我说：“你千万放心，老娄，我一定不向老檀说你走漏消息。”这时大家七手八脚把娄处长拉起来。他这场戏剧性的动作，把大家都闹愣了。有人说：“娄处长你别着急，杨参议还不一定去蒲城呢。”老娄一听我有不去蒲城的可能，便说“我看参议您还是不去好，我的师长那人你还不知道！那人不讲情面，翻脸不认人。这时候他已经红眼了，杨主任的老太太，你是接不出来的，根本就不能让她出来。前天我在蒲城开秘密会议，研究过杨老太太的问题，拿她当作人质，以防备别人打他。怎能让老太太出离蒲城呢？你要走，准吃大亏，我劝你千万别去。”娄处长不愿意让我上蒲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不去他的事就免生枝节，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家见仁见智地说了好半天，我也没开腔，后来我向大家说：“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劝我不要冒险，是为了我好，确实值得感谢。不过杨主任让我上蒲城接他母亲，对我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他虽然不是咱们东北军的顶头上司，但副司令临走时候，曾有过手谕，咱整个东北军归他指挥。明着是求我，其实也是命令，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另外听说他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蒲城经这次变乱，一定是搞得一塌胡涂了，目前还不知道老太太是死是活。人家是身价贵重的人，遭此灾难，我觉得我应该把她营救出来。我知道要是我不去，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老檀真格就把我杀了？我想还不至于。假如他拿我祭旗，那我也算为国捐躯。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蒲城。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不考虑那么多了。”我说完了，大家虽然不再吭声，但多半是不以为然。

决心已定，于是打电话给何柱国，约他领我去见杨主任。当我们二人来到杨主任的会客厅时，何将我向杨主任略作介绍之

后，便躲进客厅旁门小屋中去了。这时只有我和杨主任两个人对面坐着。杨主任又立起身来，走到我的茶几旁边，用双手把我的茶杯重新端正一番，表示敬意。同时我也用双手扶茶盘，欠身答礼重新坐定后，杨主任说：“这次想请杨处长辛苦一趟，到蒲城把俺母亲接出来，年纪大的人，搁不住兵荒马乱。前天我弟弟茂三从蒲城回来，檀师长说我们可以把老太太接出来，谁知他说的是否真情实话呀！见面时你告诉檀师长，我杨某人从来就是讲义气的，决不出卖朋友（是指檀将杨的母亲放走，然后杨派兵打檀），这事（指西安事变）是国家大事，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檀师长与我素无恩怨，他如果不许老太太出来，那你也不必过于激动，口出恶言，徒伤感情无济于事。”我说：“主任的命令我绝对服从，必能尽力而为。能把老太平平安安接出来当然很好，假如老檀心怀叵测，我也不能掉以轻心。当何军长告诉我主任的命令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请主任放心，我必能看事做事，随机应变。”杨主任听了，内心十分欢喜，并说：“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他不许老太太出来，也没多大关系，你回来后我们再慢慢想办法，但必须留意记住老檀说些什么话和他的心理状态，回头我们研究对策。饭已给你准备好了，吃点东西再上路比较好。”说着便唤人取饭。我说：“主任不必费心了，我是已经吃过饭才来的。”说话之间，有人端着一个小木方盘，开门而入，在桌上摆下了两盘炒菜，一碟盐面，一碟油辣子，另外一碗杂菜汤，两个蒸馍。杨主任再三督促我吃饭。其实我真不想吃，更加上心慌意乱，任何东西都不想吃。听杨主任的话，只好胡乱吃了半个馍，就点菜。喝几口汤，就算吃毕。立身向杨主任说：“这次我去蒲城接老太太，我已经准备了两手：一手是好的，顺顺当当地把老太太接出来，那当然就无话可说了。第二手是坏的，我也有所准备。何军长说我和老檀有交情，那是言过其实。我们俩

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情，不过是在职务上工作中常常打交道，他是军属的一个师长，我是在西安给军队办事，很多接触。老檀的为人，我素昔也知道一些。他这人挥霍无度，惟利是图，根本就谈不上讲什么道义。这次他投降了蒋介石，原形毕露，品质恶劣，有奶就是娘。临来以前，有的朋友就劝我说，老檀土匪出身，杀人不眨眼，拿我祭旗，也未可知，以表示他死心塌地忠于老蒋。”杨主任听了，便立刻站起来很严肃地说：“那么你可以先不必去了，等等再说吧。等空气冲淡一些再说。”我说：“去，我是一定要去，不过我是向主任交心，心里有啥说啥。朋友们这样说，也没有动摇我去蒲城接老太太的决心。假如我不想去今天就不来了。”杨主任听了我这几句话，立刻心情舒畅起来，面容有欢悦的表情，接着说：“假如老檀对你有任何不利行动，我是要对你负责的，我说话是算数的。”杨主任的话，使我去蒲城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说：“好吧！主任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马上可以动身了，主任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杨主任说：“就这样吧。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我说：“什么也不需要了。”接着我向客厅前门走去。

刚出前门，我就转回身来，向送我的杨主任要求握手告别，表示不让他再远送的意思，并连声说：“主任请回，主任请回。”而杨主任用左手换下来他的右手，用右手推我，轻轻地缓慢地向早已准备好的汽车走去并连声说：“不！不！”意思说我不能马上回去。未到车前，早有人将车门打开，这时我欲将右手抽回来准备登车，但杨主任紧紧握住不放，将右手搭在我肩膀上，表示依依不舍的样子，严肃而热情，一声不吭，两眼盯着我。我又说了一遍：“主任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他只是连声说：“没有，没有。”但他的两手仍然不做更变的动作。这时我暗暗自想：“他既然没有什么话说，手又不放，难道还有什么心事要说？”我说：

“那么我可以走了吧？”不等他回答，我便挨近车旁，不管他放不放手，我就将脚踏入车内，作上车的架势。这时杨才把手放开，同时连声说：“保重！保重！”车门有人关好。车内车外，互作手势告别，车速加快，出新城，直奔蒲城。

独自一个人坐车后沙发上，思绪万千，今事古事，涌上心头。首先想起来的是杨将军官居一方，封疆大吏，和我这芝麻粒大的小官儿，握手惜别，依依不舍，确有受宠若惊之感。接着就想起古今中外大人物要你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如此。又想起到蒲城后见了老檀，可能是什么样的局面呢？枪毙我之前，我要破口大骂：“背信弃义的檀自新，投敌叛变的没有好下场。”又想，老檀也许不至于杀我。又想，究竟打日本死了好呢？还是死在蒲城好呢？总之，一句话，心神不安。正当胡思乱想之际，车到了富平，被大路旁边的哨兵拦住：“哪儿来的车呀？上哪儿去呀？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呀？”司机一句也没答复。我便下车，一方面也想问问情况，听口音是东北军。我问哨兵是哪部分队伍，他们不肯说，光说他们师部有命令，凡是汽车经过此地，都必须登记，并说明来去方向，有何事干。我说：“到蒲城去。”他们一听蒲城，都表情惊讶。一个哨兵说：“不行，去蒲城的必须等师部许可才能放行。”正说话之间，贺奎师长后边跟着几个人走了出来。他一看是我，开口便问：“大实，你上哪儿去呀？”我没有急于答复，便走近他的身旁小声说：“我上蒲城去。”因为刚才我说去蒲城，哨兵们个个惊讶，所以此番我就不敢再大声说了。他又问：“你上蒲城干啥去呀？”没容我答复他就拉着我的手，走向说话别人听不清的地方，又问：“你上蒲城干啥去呀？”贺奎是我幼年同学，见了老同学当然不能扯谎，就把接杨老太太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是边说边察颜观色，看他如何表情。只看他好像替我担心似的。问我：“你去有把握吗？”我说：“你指的是什

么把握？指把老太太接出来接不出来呢，还指我个人安危呢？”他说：“两个都有。”于是我就给他解释说：“你这两个都问，我是两个都没有把握。临来时，有的朋友曾给我详细分析过老檀的为人，以及他此次叛变。我此番去接杨老太太或许他对我不利，不过我觉得，杨主任目前是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母亲困在蒲城受难，说到我的跟前，我没有理由说不去。假如老檀给我个三长两短，我也算对得起咱们东北军。老檀此次叛变，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旦打起仗来，蒲城县定要兵连祸结。那时老太太肯定要遭殃，将是个不可估计的损失。我想老檀也不至于把我杀了，假如把我杀了，我也算为国捐躯。杨主任在我临来时，也谈了这一点，他说他将对我负责。”贺师长听完这些话，便严肃认真地说：“大实，你自管去，顺顺当当地把杨老太太接出来，万事大吉。否则他如对你下了毒手，我贺奎对天发誓，全师出动，一定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粉身碎骨，身败名裂。我说话是算数的。”老贺这几句话，把我说得更是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我说：“好！好！咱俩没白同学一回。好吧，就这样吧，我就走了，你等候佳音。回头路上，也要经过你们富平。”就这样我便登车重上征途。

富平离蒲城大约四五十里路，来到蒲城西门外一里多一点的地方。司机回过头来向我说：“处长您听没听见城墙上打枪呢？”话音未落，只听“叭哒”的一声，一颗子弹，把车子前边的挡风玻璃打碎了，玻璃碎块纷纷乱坠。这时枪声听得越发清楚了，只听车子前后左右突突突乱飞，说时迟那时快，车子已到城西门跟前。我急忙下车喊话：“千万不要误会呀，我是慰劳你们的人，不是敌人，别打枪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城上也有人喊话：“你不是杨参议吗，你干什么来啦？”我只听得这个声音很熟，但想不起这人是谁，我便立刻答腔：“我是杨参议呀，别打枪啦。”

这时枪声已经停止，城上喊话的人跑下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素昔很熟悉的田排长。田排长边跑向我跟前边说：“太危险啦，太危险啦，听枪声你们为什么不停车呢？你们一个劲地跑，我们就一个劲地打，真太危险了，负伤了没有？”我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一点也没流血。”田排长说：“那简直太好啦！”后来检查车身中了几个弹，但都不大要紧，幸而司机和我，都安然无恙。田排长知道我和老檀很熟，便问：“您是不是要见见我们师长啊，我往师部打个电话吧？”我说：“那好极了，我来就是要见檀师长。”不大工夫，师部回来电话说我可以进城。于是田排长上车引路，直奔师部。

车子一直开到师部门口，然后由田排长引着我进了大门。老远就看见檀自新等人笑容满面地迎接出来了。走近时老檀说：“大实，你怎么来啦？我估计你或者刘士玲（军部少校参谋）准能来一个人。”我说：“士玲这几天感冒了，头晕目眩起不来。”一边说话，一边就到屋里了，我一看都是他们师部那几个人，我全都认识。叙座吃茶之后，老檀开腔了：“大实，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使命啊！”这时候屋内足有七八个人，都注视着我。我便说：“老朋友日久不见面了，这些天以来时局变幻如此之大，能不关心吗？”大家听了都微微冷笑，自忖道，这不是真话，这是官腔。老檀说：“别扯闲的啦，你究竟干什么来啦？”我看他问得很急，在座的人又都眼巴巴地等着我的答复，我便笑着说：“你问我来干什么，我倒要先问问你一件事，你们也就能知道一点我是干什么来了。我首先要问的是杨主任的母亲，目前是不是平安无事，依然健在？”大家一听我问的是有关杨老太太的事情，在座的人有的就窃窃私语：“我估计他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当说客来了。”老檀说：“你问杨老太太的事情，那正好，我正要和你谈杨老太太的情况呢。自从打枪后，我已经两次探望她老人家了，目

前不但依然健在，而且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了，我们派有专人给她买东西和菜。并在她住处，我们也派了队伍，专门守卫，严加保护，这一点你放心。回去后向杨主任报告，一万个放心。昨天我去杨公馆问候杨老太太的时候，我告诉她老人家，如果愿意回西安，可以回去，老太太说不回去，在蒲城住惯了，哪儿也不想去，就在此地住下去了。我看老太太很安心，心情还很愉快。你回西安前我们一同看看她老人家，回西安后，你可以据实报告杨主任。另外我也问过她，这次打枪一定受惊了吧。她还很有趣地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个人的惊慌不算个啥，我知道檀师长准能派队伍保护我，我就一点也没害怕，在蒲城住和在西安住是一样的安全。老人家那样的轻松愉快，我就想这老太太真英明。我又告诉她，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守卫的人，他们一定很快地转达给我。老太太又说：你不必操心我啦，我很好，我很好。”我听老檀一个劲地描述老太太如何心情舒畅，如何生活安适，多半有意不放她走，故意在精神上说服我，我只有假意地说：“那简直太好啦！只要老太太安全无事，比什么都强。”

这时候天色已晚，在座的人渐渐离去。老檀就命令勤务兵开饭，我们的话题因而改换。谈些什么张副司令不能回西安啦，服从中央是多么明智啦（服从中央是当时老檀贼党内部用语，承认蒋介石是他们的中央），西安城内外人民生活 and 交通情况啦等等的闲话。饭后勤务兵摆上了大烟盘子，老檀是个吃大烟老手。这时我看屋内，只有老檀和他亲信好友张临轩二人，他们师部都称张为参谋长。张是当过参谋长，现在赋闲，在骑兵十师给他们出谋划策，是骑十师的后台老板。张也是个老烟鬼，躺下吸了一阵子大烟，张临轩便开口问我：“大实你到底是干什么来啦？刚才说了半天，你也没说你究竟是干什么来的。”老檀接着说：“是呀，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特殊使命而来的呀？”这时我才慢慢地说

道：“我来是有两宗企图。第一宗，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我把杨主任的老太太接出去上西安，杨主任是有这个要求的。第二宗企图我先不谈，一会儿我一定要谈的。”老檀听我明朗地说出要接杨老太太出蒲城，他虽有抵触情绪，但不直接说不同意，便说：“依我看杨老太太在蒲城，比在西安还安全。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大实？”我说：“这话就看怎么解释啦。”老檀说：“不论怎么解释，都比西安安全保险，西安可以挨飞机轰炸，远射程的大炮，可以打到西安城。时局变幻不定，谁知哪儿安全呐。蒲城这地方往东一撤，就可以出潼关，出了潼关，那就更万无一失了。”听话听音，我一听他这套谬论，就是要顽固到底呀！一句话，就是要留老太太在蒲城作为人质。老檀这一席话，露骨地表明，他们要留杨老太太的用心。老檀让我吸一口大烟，吸完之后，我便慢条斯理地开始讲起了我在来蒲城前准备好的话，给他说开了。我说：“我今天说的话，也许你们不乐意听，或者反对，这都不要紧，因为我们是老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张参谋长插嘴说句笑话：“我知道你是当说客来了，任你有苏秦、张仪之才，也动摇不了我们师长的决心。”老檀说：“临轩，你先别说，让大实说。”我接着说：“这次来，并不是想动摇你们服从中央的决心，服从中央是一条光明大道，将来大家都要走的。不过你们先走一步罢了。”老檀一听，便喜形于色，把大烟枪一扔，马上站起身来说：“大实说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早晚问题。”我这是欲擒先纵的花招，把他们两个人先稳住。接着我说：“我还是谈谈杨老太太的问题。杨老太太在你们这里，你们以为是奇货可居，当作人质，万一有兵来打你们，你们可以摆出架势，要把杨老太太杀头，以作退兵的威胁。这个办法，简直是再笨再愚昧不过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听：早先年，刘邦和项羽争天下，历史上叫做楚汉相争。有一天，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和

刘邦的老婆给捉住了，当时刘邦的兵占领着西广武，项羽的兵占领着东广武，两军对峙，彼此还可以喊话。项羽在阵前吓唬刘邦，在城上安了一个大油锅，烧得油开滚滚，于是喊话给刘邦，说：刘邦你听着，限你三天赶快投降，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父亲和夫人上油锅炸了吃肉。你猜刘邦看见这种情形，能说什么呢？刘邦不在乎地喊出回话，说：我的父亲即是你的父亲，如要烹了我的父亲，请你给我点肉，我尝尝。项羽一看，此计不成，也就没炸刘邦的父亲。再有，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吧，曹操在徐州打败了刘备，俘虏了关羽和刘备的二位夫人。曹操以为这一下子，刘备非来投降不可，结果刘备也没在乎，仍然继续打仗。你们把杨老太太留在蒲城，能顶什么用呢？不但不顶用，反而是祸根。刚才我要和你们说的第二个企图，就企图搭救你们的身家性命。我说搭救你们的身家性命，这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意吓唬人。这些天以来，你们闭关自守，外边的消息隔绝，等于都蒙在鼓里。贺奎的步兵师，刘桂五的骑兵师，请缨上阵，以营救杨老太太为名，出师攻打蒲城。这叫做名正言顺，也就是出师有名。他们不管你们撕票不撕票，名正言顺的战争叫做正义战。不用说刘桂五的三个骑兵团，就光拿贺奎的三个步兵团说，就可以把你们打个稀里哗啦。骑兵是不善于打攻坚守城仗的，这一点你们是内行，都能知道。到那时，你们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后悔莫及。我所说的留着杨老太太是祸根，就是这个道理。翻过来说，假如没有杨老太太在蒲城，他们是不会出兵的，国家大事，个人谁和谁都是素无恩怨，他们又何必打仗呢？我来的时候杨主任对我说：“我杨虎城从来是讲义气的，决不出卖朋友。他的意思是不能在你们让我把杨老太太接出蒲城去后就派兵打你们，他是个大人物，说话算数的。”我又把杨主任和我说的话，添油加醋详细描述一番。

檀张二人听了，就像听评词讲故事人神一样，躺在大烟灯旁，瞪大眼睛，望着我。谁也不吭一声，谁也不分辩，谁也不说一句赞成，也不说一句反对。这时我有个感觉，我所说的这一大篇夸夸其谈，是起了作用，是鼓进劲儿去了。我就计上心头，说我想去厕所解手，我的意思是让他们二人互相斟酌和玩味一下刚才我所说的话。于是老檀的勤务兵打着手电筒引导我到厕所去了，我故意在厕所多呆一会儿。让他们讨论研究，然后我再进屋子察颜观色、望闻问切。好多一会子，我才回到房中，看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大烟灯旁，又过了好久，老檀才说出一句话来：“你怎么去这么半天解手呀？”我说：“大便干燥，拉不下来，就得他妈的多蹲一会儿，还是不行。”同时我看他们的面上表情呆木，仍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心情沉重，不像我们初见时那么多的话。又呆了老半天，老檀说：“咱们休息吧，你这一天也够累的了，又在西门外受了一场虚惊。”张临轩说：“你还算命大，不然就把你葬在汽车里啦。”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一阵，各自休息了。

张临轩回自己房睡去了，我和老檀在一房，老檀未上床就出去了。我因为吸了几口鸦片烟感觉特别兴奋，久久不能入睡，胡思乱想，老檀和张参谋长的表情究竟如何呢？明天一早起来就把我绑赴法场枪毙去？不会吧，一点象征没有，老檀这小子笑里藏刀呀，咬人的狗不露齿呀。但多少得有点前兆，今晚的场面使我观察不出来。不然的话也应该把我押到卫队连去呀。不让杨老太太走，还说求我给杨主任说情，也不像要杀我的神气。今天下午在西门外如被子弹打中，一枪就死了，还好办，要打个半死不活的咋办呀，使我后怕到万分，浑身打战，更睡不着了。索性起床披衣服坐起来吸烟。

人睡后，一觉醒来，日已高起。看老檀的行李，仍是整整齐齐

齐放着。也不知是早起走了，还是他整个一夜未在此房里睡。正在猜疑之时，老檀兴冲冲地走进来说：“你这一觉睡美了吧。一会儿我们吃过早点，一起到杨公馆。你今天就把杨老太太接走，见着杨主任代我谢罪。老太太这次受惊，我们老觉十分抱歉，好在她老人家今天仍然安全无恙。”我说：“那好极了，那么我们马上吃饭。如此措施，你们是聪明绝顶，一切灾难都灰飞烟灭。”老檀说：“旁的话我们也不多谈了，为了消除误会，还是你说得对。我檀自新敢做敢当，无所畏惧。假如因误会而引起不幸，那是划不来的。目前仍须等待一时，才能开拔。我还想和你说一件事情，你听听如何？”我说：“什么事情？”老檀说：“蒲城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地方保卫团和县政府都成了瘫痪，我看你是不是来当当蒲城县的县太爷，做个过渡政府？”我一听，简直出我意外。他这个葫芦卖的是什么药，我本能地立刻答应：“好好好好，我这半辈子还没当过县太爷呢，我真想过过瘾。不过你我说了算吗？”老檀说：“那个不难。等会儿你走，带上我给杨主任的一封信，我来保举你，准差不多。”我说：“好好，这倒是个好办法。”在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应付老檀时，我心中暗暗想：你要保举我当县长，我岂不也是个叛军县长了吗？岂不是也要留个千古骂名吗？我假如拒绝他，他将大大地疑我，老太太走后，大兵一来围攻，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了，把我也拉住，一同蹲在蒲城，谁来打他，他可以把我先杀了，怪我欺骗了他。所以我满口答应，假惺惺地愉快接受，使他看不出一点破绽。吃完了饭，他给杨主任的信，由副官送来。我接到手后，恭恭敬敬地折好，送进内衣袋。老檀说：“那我们就走吧，我不留你再多玩几天啦。”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前往杨公馆。

汽车拐弯抹角地走了好半天。老檀说：“这就到啦。”只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我暗想，名为保护，实是监禁。进了大门，

好像老太太早已知道老檀来了似的，神情不安地迎出房外。大家走进房内坐定后，老檀先开腔：“老太太回西安吧，杨主任派人来接你老人家来啦，快点收拾收拾东西，车子在外边准备好了。这几天你老人家饱受惊慌。”话音未落，老太太便说：“我不去西安，哪儿也不去。在蒲城住惯了，哪儿也不愿去。”老檀说：“去西安和你儿一块住去吧，比蒲城好得多。”老太太说：“西安有俺儿，蒲城也有俺儿，檀师长不是和俺儿一样吗？”说得老檀一声笑了：“老太太不要误会，是杨主任派来的人，他也姓杨，杨处长，快收拾东西吧。”起初，我还以为老太太真的不愿意离开蒲城呢，我便说：“老人家您不愿意走，当然可以在此地住下去，如愿意去西安的话，那就可以马上走，车子在外边等着。”这时候老太太的神情仍是疑信兼半，未做具体决定，只是不吭声。我接着说：“走吧，这不是开玩笑。檀师长他们已经合计好了，让你老人家离开蒲城，免得日久人家为您操心。”经这样一说，老太太完全信真，也领会了，喜形于色地说：“好！好！那么我们马上就走吧。”同时命令女仆人说：“走，马上就走。”女仆人忙要收拾东西，老太太大声说：“啥都不带，马上走。”于是立起身来，提着手杖，往门口走去。老檀坐在离门较近的地方，也站起身来。看老太太决心要走，就先出了房门，在前引路穿过天井，奔大门外的汽车走去，老太太随在老檀后面，我是第三。老太太边走边用手暗暗地指给我看墙壁上、门窗上以及灶台上的弹痕，我便点头会意。老檀在汽车旁，再一次和我申述，到西安后向杨主任代为谢罪。我说：“师长您只管放心，这一点我能做到。不但做到，还能更正经地替你表达这种恳切心情。”说话之间，均已登车坐好，老檀在车旁敬礼告别。车开，直奔西门。

出了西门不远，老太太拍我的肩膀说：“杨处长啊，你算积了德，救了俺这条老命。人说蒲城要打大仗呢，大炮把蒲城轰平

了，枪毙檀自新。那时候，我这条老命就算完了。”说着老太太老泪纵横，女仆人也随之落泪。我说：“别哭了，老人家，这不是脱离了危险了吗？应该乐，不应该哭啦。”老太太稍呆一会儿，也就转悲为喜地说：“多亏你杨处长，到西安后，我得好好谢谢你呀。”我说：“别客气了。只要你老人家平平安安地离开蒲城，我就念阿弥陀佛了。”老太太信佛，听我说阿弥陀佛，就开朗地笑了。女仆人接着说：“老太太就是性急，一点应用的东西也没带出来。”老太太说：“你真瓜（傻的意思），老檀既放俺们出来，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出蒲城，还说什么东西不东西。”大家都笑起来了。我问：“刚才老檀让您回西安，您怎么说不走呢？又说蒲城住惯了，不想离开呢？”老太太笑着说：“那完全是假的，俺不敢露真相，说俺愿走啊。谁知道老檀安的是什么心呐！杨处长你从未见过面，也得不到你真情实意。后来我听你再三说是真事，不要误会，我才有一半相信，一半不信。我想老檀他是不会放我出蒲城的，他怕虎城打他，最后还是你把俺说得相信了，所以，我提着小棍棍，马上要走。要上车没上车前，我们是心跳胆跳的，车子一开出了西门，这才放下心来。”说着老人拍掌大笑起来。

说话之间来到了富平，一〇九师的岗哨照例拦住了去路。我下车和哨兵说，请通知他们贺师长，就说昨天去蒲城的那个人，今天回来了，要和他见面。略等片刻，老贺和几位军官迎面而来，我告诉他说，杨主任的老太太现在正在车上。贺师长没多谈话，就大步走到车前，我随之介绍给老太太，贺师长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并请老太太下车休息，吃午饭后再去西安。老太太没听懂老贺的话，我作了翻译。老太太连声说：“不，不，谢谢，不必费心了，俺们都不饥困，就不下车了。”老贺遂问我昨天在蒲城的经过，我便一一详细地告诉了他，老贺连连点头。最后我

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檀怕别人打他。我就连蒙带唬地说：你和刘桂五二人联合，以营救杨老太太为名，出兵攻打蒲城，计划已定。不差我来接老太太，他们就将动手。今天如果接不出去，恐怕你们一半天之内，就将大祸临头。到那时你们是骑兵，骑兵是最不善于打攻守战的。将一败涂地，身败名裂，后悔莫及。我说这话之后，他们谁也不吭声，谁也不赞成，谁也不反对，一言不发，看样子是击中了要害。他们神魂颠倒，六神无主。后来他们开会研究了半夜。结果同意让我把老太太接出来。”老贺伸出大拇指对我诙谐地说：“你真行，你真行。机智勇敢，大功一件，回西安请赏去吧。”我们二人会心而笑。他又告诉我，昨天夜里少壮派把王以哲军长杀了。指名要杀王以哲和他们的办事处长宋学礼、何柱国军长和办事处长杨大实。结果王以哲、宋学礼丧了命。何柱国避难新城，你去蒲城，得到幸免。但你回西安前必须好好打听打听，目前消息如何，千万不可莽撞进城。我听说事情大概已经平息下来，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我因而想起昨天在蒲城西门外挨枪弹的遭遇，告诉了老贺。老贺说：“那简直太危险了。听枪声就应该马上停车，找个隐蔽物将身掩护起来，哪能还往前跑呢？幸亏没中弹，假如中弹身亡，你算白死。你是个文人，没经过战事，打仗要先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打击敌人，你这岂不是和子弹拼命吗？”他又说：“你昨天去蒲城，连我也替你担心，老檀有害你的危险。第二在蒲城西门外，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又是个冒生命危险经过。第三假如你昨天不去蒲城，将和王以哲、宋学礼一路而去，又是个生死关头。你真太侥幸了。”说完这话，我们就握手而别，开车直奔三原东里堡。在车上老太太问贺师长的情况。我告诉她，贺师长是我幼年间的同学，和我很要好。昨天他和我说，假如老檀对我不利，他将全师出动，为我报仇。因而我说了我来蒲城前，西安朋友们恐怕老檀

杀害我等等一些话。老太太听着听着，不禁又掉下了眼泪。老太太说：“你为了救我，冒着这样危险，我于心不忍。”当然我又劝解了一番。好久才收住眼泪说：“我们认亲吧！”。认亲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女仆人为我解释说：“老太太要和你认干亲，认你做干儿，你愿意不愿意？”我连声说：“不行，不行。老太太门庭高贵。我哪儿攀得上呀，门不当户不对，这事不能做。”老太太说：“你冒生命危险，救我一命，难道还不能做亲戚吗？啥子门不当户不对呀，现在也不是说话的地方，等到西安以后再说吧。”我说：“这车不去西安，上东里堡，主任现在东里等我们呢。”老太太点点头，没言语。

车到东里，只见杨主任和好多人迎候在大门外，老太太下车后，杨主任赶上前叫一声“娘。”老太太似乎没有理他。人们随之进房，大家坐定后，老太太面有怒容。问杨主任道：“你办的这事，能对得起西北人吗？既然把他（指蒋介石）得罪了，为啥又把他放了呢？你办的是啥事呢？”杨主任走到老太太跟前，小声说：“娘，这事以后再说吧，你老先好好休息休息吧。”老太太没言语，但愠色仍未减退。大家以为杨主任局促不安，很难为情，就全体起立，要求老太太休息，顺便辞出。大家陆续外出时，老太太说：“杨处长，你先不要回西安，我还有话和你说呢。”我说：“好，好，今天不回西安，走以前，必向你老人家当面辞行。”

当天晚上，杨主任的副官告诉我，明天上午杨主任要找我谈话。我想，正合吾意，反正也要见杨主任报告蒲城经过。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说杨主任传见。我到会客室时，杨主任早已在沙发上坐着候客呢。见我进屋，满面笑容，前来握手，开朗地大声说：“杨处长，这次可把你辛苦了。”坐定后继续说：“我听说你在蒲城西门外，遭受了一场非常危险的经过，太危险了。”我说：

“没有什么，人要是不该死，无论如何也死不了的。就拿这回我走蒲城来说吧，还不是冒着危险去的？结果老檀也没把我怎样。”然后，我把在蒲城经过作了详细汇报。杨主任说：“你看老檀心情怎样？”我说：“他惟一不安之处，是怕咱们这方面打他。听说刘峙派人给他30万块钱，事后编军，檀任军长。”杨主任说：“打他，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不过像老檀这样的举动确实影响很坏。”说话之间，他走到书桌上拿起一个纸鞋盒，说：“这是俺娘要给你穿的，她看你的鞋破烂了。来，把它试试换上。”我接过盒子一看，是一双高级皮鞋，黑色的，有鞋带捆着。我照例客气几句，就把它穿上了，因为我的皮鞋确实破得不像样子。换完之后，在室内走了几步。我说：“正好，鞋的大小正合适，谢谢老太太了。”杨主任说：“你这次把她接出蒲城，她真是对你非常感激。昨天夜间提到要和你认亲的事，听说你们在汽车上已经谈过了。我看老人家的心情也是难却的了。”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眼睛一直瞧着我，似乎等我的答复。我说：“我也已经考虑了，问题倒没啥问题，只是我的地位太低，不敢高攀。门也不当，户也不对。”杨主任说：“认亲是认亲，作亲是作亲，作亲讲什么门当户对，认亲不说这类话，都是因为某种场合发生特殊关系，只要双方情愿，就可以认。”

正在说话之间，老太太慢步而入。我们二人立起让座，请安。老太太笑容可掬地问我：“昨天休息得好不好？”然后问我什么地方的人，老家还有什么人，今年多大年纪了，有几个孩子？以及家庭情况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杨主任说：“他是东北军骑兵军西安办事处处长。”老太太说：“处长这官儿不算小了，你咋还说你官小呢，昨天说的认亲的话，你看咋样啊？你为接我，好险没丧了命，我们全家都感激你。”我说：“方才我和主任也谈到了这件事，你老人家不嫌弃我，那我只有从命吧。”老太

太便喜不自胜地告诉随侍人叫茂三来。片刻之间，茂三走进房内，老太太给介绍说：“这是俺二儿茂三。”我们互相握手见面。茂三是我第一次见面，也是身体魁梧的人。老太太向着我：“他比你大三岁。”这时杨主任提议，我们三个人一同向老太太行三鞠躬礼，就算礼成。然后命从人摆席开宴。霎时间，一桌丰盛酒席摆在面前，完全是素食，但其菜的形象，有的像大肉做的，比如红烧肉，和大肉做的红烧肉一模一样，但是吃一口，味道就不一样了；其他如鸡、鱼、牛、羊各类肉做的菜，惟妙惟肖。吃像这样的素席，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茂三说：“几位厨师，昨天忙了半宿。”杨主任说：“老太太吃素多年，成年烧香信佛。”我心中不禁暗想，昨天副官说主任找我谈话事，是早有安排的。席罢，老太太说：“听说西安近几天很不安宁，在我这里再玩几天回西安也不迟。”我说：“今天清早，我往西安我们的办事处打了个电话，说西安目前完全平安如常了。”杨主任说：“事情是过去了，肇事者们已经作了妥善处理。不过在东里多住几天也可以。”老太太说：“你去蒲城搭救我，得免西安灾难，这是善有善报，老天不负好心人。”大家都笑了。席散时主任小声和我说，让我下午3点多钟再来此处，有事和我商量。

下午3点我到会客室不久，杨主任也到了，开始向我说：“你去蒲城一次，你大概不知道蒲城情况怎样吧，县保卫团长韩寅生和参谋长呼延立人，都被老檀扣起来了，县长程海岑行动也不太自由。城内城外，还时有枪声。老百姓叫苦连天，叛军官兵，时常三五成群，到处胡作非为。目前蒲城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想和孙主席商量一下，派你到蒲城给临时维持一个阶段。我考虑你和老檀总算有点交情，就看你能把老太太接出来，也算有些友谊关系，你去可以要求老檀严禁官兵扰民，目前你是惟一的能和老檀说这话的人。也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我说：

“主任的命令我是应该服从的，不过兵荒马乱的蒲城，我还是不想去的。昨天离开蒲城前，老檀也提到这一点，让我去蒲城给他当御用地方官。但是他有他的打算和用意，他是想把我留在蒲城，替老太太当人质，一有动静，他可以把我先杀了，因为我骗了他。谁还愿意钻这个虎口呀？另外我若是当了这个县长，岂不是也当了乱臣的县长了吗？老檀和我说的时侯，我满口应承。假如我反对他的意见，怕连老太太和我都扣留在蒲城。他还给你有一封信，这封信我本来不打算让你看，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你既说到这事，只好让你看看这信。”说着我就将信交给了杨主任。他看完信，便笑着说：“老檀的主张和我们相同，但目的不同，他想利用你一个时期，防地有自己人主政，办事方便。”我说：“他想利用我好办事，我岂不是成了叛军县长了吗？”杨主任说：“那可就是两码事了。他只能推荐不能任命，任命你的将是陕西省政府，何尝是叛军和乱臣贼子县长呢？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你去可以让老檀好好约束他们的官兵，少扰民不扰民。你是比较和他们容易说话的。至于说这方面出兵打他，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事已至此，就不采取那种方式了。”最后我说我还是能服从命令。

160 回到西安办事处，孙副官和我说：“他们（指暴乱分子）派来一连兵，到何军长公馆，扑个空。派一排人，到参议公馆和办事处，也扑了个空。参议等好运气，不然也就和王以哲和他们办处长宋学礼一样遭祸。参议去蒲城前，咱们办事处的人个个替你担心，又听十师姜处长说，你不但接不出来杨老太太，恐怕命也得搭在蒲城。他这么一说，大家更是忧心忡忡了。另外听说你在蒲城西门外，遇到了枪击，真太危险了。你要是不去蒲城，那也够呛。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完人们都笑起来了。回家时我老伴说：“昨天来咱家足有好几十个大兵来逮你，办事

处和咱家，都挤满了拿枪的大兵，把人都吓坏了，幸亏你不在家，要是在家，非把人逮着不可。”

第二天，有一个人坐着三轮摩托车，给我送一个木箱子，箱内盛着1000元现金，他说他是新城绥靖公署申副官，奉主任、老太太的命令，送1000元现金给杨处长。我说这钱我不能收，他说送钱是他的任务，我要是不收，可以送还，但他的任务必须完成。说完转身就走了，没有任何手续。我急忙跑到门外追他，只听得摩托的响声，人已不见了。此后不久，接到陕西省政府的委我任陕西省蒲城县县长的委任状。随即谒见孙主席，到蒲城履新。到蒲城后，收拾残局，抚辑流亡，自不必说。有一件事，无妨在此简略叙述一下。有一天，蒲城县西区区区长刘香亭急急忙忙跑进我的办公室，说有一件紧急的事，要我去办。几天前，骑兵十师外出巡逻的兵，逮捕了5名共产党嫌疑犯。现在老檀的队伍马上要出发去河南，拟将这5名犯人移交给蒋介石新派来的队伍周岩部队处理。刘区长说：“这5个人要交周岩处理，非枪毙不可。救人一命，胜修七级浮屠。惟有县长你才能救这5条命。”我说：“你咋知道这件事的呢？”他说：“兴镇有个刘木匠，在老檀师部做活，今天去结账，听说这件事。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5个人交周岩部，九死一生。他出来遇见我，让我想办法。我有啥办法呀，还是县长你出面吧。”于是我便带着刘区长一同去老檀师部。老檀一见就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我们今天走，谁也不送，今天你又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来又有点新事。你们巡逻队逮捕的那5名共产党嫌疑犯，怎么办啦？”老檀说：“那事已经决定送驻此地的中央军处理，恐怕这批犯人早已送走了吧。”我说：“这批犯人是在蒲城界内逮捕的，应由蒲城县政府处理。”老檀说：“咳！你何必自找麻烦呢？何况杀人要作孽呢，让周岩办算了。”我说：“公事公办，该咋的就咋的，该谁

办就谁办，怕作孽也不行。”老檀说：“那就问问看这批犯人送走了没有。”派人打听回报说，军法处仍押着这几个犯人，还没送走，马上就要送了。老檀说：“那你们蒲城县就提去吧，还有别的事没有？”我说：“没什么别的事了。”就此告别，我把5名犯人提到蒲城县政府，暂押在看守所。3天过去了，老檀队伍开走完了。傍晚时，我将此5名犯人提到我的办公室审讯。据这5人说他们是陕北民运部门派来搞民运工作的。出来的比较迟，正在返陕北途中，被骑兵十师巡逻队逮捕的。其中4个人都30多岁，有一个人50多岁。这50多岁的人说：“我们在骑兵师部押着，听说队伍要开河南，要把我们送中央军处理，恐怕没有活路了，可能枪毙。后来提到蒲城县政府，我们思想上都愉快了一些。因为听说县长是东北军人，是进步民主人士，我们或者万一有条生路。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县长，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县长办公室，不是审犯人的地方，又兼一进屋子你就让我们坐下，也不像对犯人的待遇。”我说：“你们也不必问谁是县长，今天我打算把你们放走。在我这里押你们3天，是等叛军开走，黑天了把你们叫来是马上让你们回陕北。我已经准备了一些吃的，你们吃完后再带上一些馍馍咸菜，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去延安的大路口上，你们回去吧。”这5个人听说要放他们，乐得难以形容，感激莫名。在当时我曾经有个供录，记载得比较详细。后来有人看见，不让我留这痕迹，恐敌对方面抓住把柄，因而就把它烧掉了。所以至今几个人的姓名全不记得了。这5人之中，我想或者能有人依然健在的，我现在陕西省政协工作，愿取得联系，至为欢迎。

自从蒲城离职后，就把家安在西安市西关外东新村，老太太住在城内红埠街，时有往还。逢年遇节，老太太亲自来或打发茂三来我家，送些东西，如吃的，小孩和大人穿的衣料等。我也常到红埠街去请安问候。老太太好念佛经，但不认字，时常让我给

念佛经，听得非常入神，并告诉我，让我也吃素，可以延年益寿。我说我不吃素，一辈子不吃肉我不干，她也就笑了。就这样往来，久久不断。

第三章 欧美之行

蒋介石对杨虎城恨之入骨，但一时又莫可奈何，只好玩起惯用的手段，让杨出国。一方面，眼不见心不烦；另一方面，先调虎离山，再慢慢想出惩治办法……

一、陈立夫暗中策划刺杀未遂

褚龙吟(时任镇江江苏区监察使署)口述：

1937年春天，我在镇江江苏区监察使署，忽然接到南京道署街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CC特务机关）季元朴电话，叫我马上到南京来，说是有紧要事件商议。难道又发生了新的事件？被囚禁一年，刚恢复自由的我，只得硬着头皮搭乘首都特别快车，到达南京，去找季元朴。他笑容满面地说：“你老兄来了，恭喜！别的话先不用说，只说拿什么请客？”我说：“请客不成问题，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你先告诉我！”他说：“别管什么事，你刚刚下车，当然没有吃晚饭，我们一道去吧！”随即带我跳上一部流线型汽车，对司机说：“中央饭店。”下车后，他引我走进二楼一间带有浴室的房间，向茶房要了纸笔，问我点什么菜。我笑着说：“你是客人，怎么反倒问我。”他说：“这就叫做客随主便。”一边说着一边提笔写了几样珍贵的菜，如清蒸燕窝



1937年5月，杨虎城出国前，在上海与于右任、刘守中、邓宝珊等合影。前排右起：于右任、杨拯中、刘守中。后排右起：王陆一、邓宝珊、邓慧琳、谢葆真、杨虎城

之类，并且关照茶房拿一瓶陈白兰地来。茶房下去后，他对我说：“你不要心疼，今天绝对不会吃你，我想着替你接风，还办不到呢，现在另外有人请你，我是奉命做陪客的。”又说：“你的住处，就是这个房间，觉得怎样？吃的东西，由你吩咐，只要南京能办到的无不从命。我也可以沾光白吃。”饭后，他和我闲谈身世状况，对于我父亲的生平、死亡，好像极感兴趣，直到11点钟，他才起身说：“时间太晚了，你休息吧！立夫先生打算和你谈话，明天一早9点钟，我来接你。”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他说：“现在用不着说，反正明早你自然晓得。”他走了以

后，我挖空脑筋，怎么也猜测不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看样子似乎不会有什么恶意。

第二天8点多钟，他果然来了，仍旧坐着那部汽车，接我到常府街18号陈立夫住宅去。到了门首，警卫人员和他打招呼，他说：“先生叫我陪这位客人一道来的。”警卫笑着说：“是，是，秘书业已吩咐过了，您们请去吧！”他领我上了二楼，进入一间密室，很小心地用屏风遮蔽了沙发周围，然后出去。

陈立夫进来和我握手，佣人退出后，他问我对监察院的工作感不感兴趣？又问我月薪多少？我一一答复后，他装出很惋惜的样子说：“屈才！屈才！如果在我这里，不会让你小就的。”跟着像讲学般的对我说：“一个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事业，必须要求‘大受’，不可只求‘小知’。”又夸奖我“很有正气，如果能够善养，将可塞于天地之间”。他还说，过去顾建中等把我的自由限制了些日子，他根本不知道，后来他曾当面申斥，因为我放走了共产党，对于党国固然不无微疵，但仗义救友这一点究属可取，观过知仁。并说：“你并非异党分子，当然不会危害党国，为什么还要限制你的自由？”

讲完这一套后，他亲自动手，扣上门锁，靠近我坐下，低声说：“这一次张、杨拥兵叛变，劫持统帅，个个都欲得而甘心。可是委座豁达大度，对张学良仅判十年徒刑，还要呈请国府特赦。对于杨虎城毫不惩处，让他逍遥法外。我今天作个持平之论，张学良对于党国起码有功有罪，如统一东北，统一华北，解散扩大会议，都不无微劳。杨虎城完全是委座提拔起来的，竟然犯上作乱，实在罪不容诛。许多忠党爱国之士都激于义愤，要求杀他。我不能不俯顺輿情，又不能不善体委座德意，所以把你特地找来，和你商议。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掩外

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5个月牢，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私人出资，供你出洋留学。到哪一国去，你自行决定，回国以后的职位，我完全负责。至于具体行动，你和季元朴商量。这件事我想你一定不会不干的？”他两只狐狸眼睛注视着我的面部，频频捋着他斑白头发，候我答复。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他说。“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我说。“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尊？”他问。“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我答。“那么，你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中控告杨虎城？”他追问。“我控告杨虎城的事实，陈先生没有看见吗？上边何曾提到家父一个字。”我平静地答复。“晓得咯，这是你的聪明处，可是我查得明明白白，杀害令尊的确是杨虎城，现在报仇与否，听你自行决定。”

我说：“这件事先不要谈，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5年以前，或者还说得下去，现在他揭筑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当儿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君子爱人以德，这样扶持杨虎城成名的事，我不能干，就是陈先生你也应该审慎一下。”

他狡猾地微笑说：“做大事者，不顾小节。你这种书生之见，是要不得的。我对你希望很大，想成全你千秋万世的令名，不料你这样迂腐软弱！古人说：时乎时乎不再来，《易经》上说君子不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不得不苦口相劝。”

我有点愤然，因为他当面说我软弱、迂腐。我就很朗然地说：“陈先生的厚意，我非常感激，我虽放荡不羁，但对于大是

大非，尚不至颠倒混淆。今天这件事，即使成功，充其量我不过落个公报私仇的愚孝而已，反之将会落个不明大义，残杀爱国人上的凶手，只怕将来要受到万世唾弃，连家父也要冤沉海底，还会有什么‘令名’。要说我迂腐软弱，我不敢强辩，但是21年，我以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敢和率领十万大兵的杨虎城斗，今天有陈先生主持，中央照护，对于一个摘除兵权的孤身武夫，难道不敢去惹？更何况毫无危险，坐享其成！个中委曲，陈先生一定能够鉴察。我也是剖心献肝的真话。”

反复辩论了四五个钟头，外面几次敲门，他总是叫等歇再来。壁上时钟敲过12点很久，他才打开了门，和季元朴在外面咕叻了十几分钟，俩人才进来。陈说：“时间晚了，就在这里便饭吧。”季抢着说：“不方便，还是我陪他吃小馆子去。”陈说：“也好，简慢的很。”我立刻告辞，和季元朴乘车到浣花川菜馆。在汽车内，我惶惶不安，意识到今天这个场面，很有被杀灭口的可能，中途一语不发，到了浣花，自己乱点些菜，红烧熊掌之类，并且要了一斤大曲，用茶杯斟饮，准备醉饱而死。季元朴劝我说：“少吃点酒，等歇还要商议正事。”我只是不理。饭后，回到中央饭店，他问我和陈谈话的内容，我据实告诉了他。他说：“可惜！可惜！你老兄断送了一生前途。”他告诉我刺杀张苇村的凶手，也已到了伦敦；又告诉我刺杀张宗昌的郑汝成和动手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俱已名利双收。最后他问我是否有考虑的余地，我趁着酒兴，写了四句：

拼用枯棋了去生，着着错尽气自雄。

曾经九死哪怕鬼，仅剩一身不怯穷。

他看了以后，说：“你老兄喝醉了，好好休息吧！等一会我

来看你。”他拿了那首诗走后，我就昏昏入睡了。大约晚间9点多钟，他喊醒了我，叫我和他出去宵夜，在夫子庙转了一匝，胡乱吃了些点心，又叫我陪他一道到钞库街去看朋友。到钞库街，进入很深的一院旧式房子，在第三进中，一间设备很齐全的厦房，电灯辉煌，可是没有主人。他和我坐下后，一个佣人送来了茶。他对那个人说，“老丁，这位先生在此地借住几天，你要好好照护。”又对我说：“你要什么东西，或需要什么吃的，喊他去弄，不要客气。”我意识到又被囚进特务机关，当即问他，把我押在这里如何处治。他笑着说：“你又神经过敏了，这哪里是关人的地方。因为立夫先生今天对你讲的那些话，杨虎城三两天内就要到京，你是一个名士派头，假若无意中泄露出去，岂不太糟？所以请你住在这里不要出外，等大事办完之后，再让你回镇江去。完全是为你设想，毫无恶意，千万不要误会。至于中午那个话，要干的人很多，你既不愿便作罢，可是千万不要乱说。方才我已当面关照老丁，你要什么，找他好了，我们都是朋友，怎么能给你过不去，我还有事，你休息吧。”他扬长而去。

住了一天一夜，不见他来，我很着急，猜不透他对我究竟要怎样办，那个老丁倒很和气问吃问喝，非常周到。

第三天一早，他来了，匆匆忙忙地对我说：“你今天可以回镇江了，走！和我一道去吃早点。”在夫子庙绿杨茶楼上，他告诉我：“果老（陈果夫）不同意立夫先生的做法，说‘目前尚非其时，以后相机处理’，你没有住在这里的必要，可以回去了。但是要永远记住，这一段话绝不能告诉任何人，万一有点风声，将来要你完全负责的。”

这样，我于中午又回到镇江。

二、蒋介石两次召见，明拉暗打

李志刚口述：

我曾任杨虎城部的驻南京代表，在西安事变中于1937年1月曾代表杨虎城将军与蒋介石进行过谈判。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心怀报复，坚决要杨出国，就是报复的第一步。

杨虎城先生赴杭州见蒋

1937年2月4日，杨和诸将领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事变。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有接受中共团结御侮的主张。我由南京回到西安，19日见杨汇报情况。杨评论说：“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示前途有望。

2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如让孙蔚如主陕，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厅长，我蝉联省政府委员，民、建两厅厅长则原封未动，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3月间，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我说给了杨，杨对宋的话，不甚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才觉着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这是杨先生决定赴杭见蒋的过程。

杨虎城先生在杭州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

3月中旬，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和我共8人。坐定后，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蹋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就又换了一副面孔，说：“孝侯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说来，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

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唐孟潇（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自吹自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们出来以后，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杨虎城先生第二次与蒋介石谈话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杨出来后对我们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杨对我们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杨虎城先生回陕

4月间，蒋给杨以“革职留任”处分，并使他出国考察。蒋玩这样的手段，宋子文还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

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要我向杨解释。

杨先生回陕以后，仍在注视华北的紧张局势，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他的意思是：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在宋家他要英文外国报，让我们翻译，就是找这样的消息。

5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当时日军向华北进逼，引起全国人民武装反抗，虽成必然之势，但还看不出有什么爆发的迹象，所以杨在蒋软硬兼施的压迫下，不得不出国了。

杨虎城先生出国

5月底，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裁、樊雨农等，到上海住新亚酒店。十七路军参谋长韩光琦和我们驻南京办事处人员也到上海为杨办理出国手续。后来杨、谢带拯中移住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家中。他到上海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那时，上官云相夫妇刚由欧洲考察回来，来看过他一次，谈了些在欧洲的见闻。上官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他想了想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我想他这样说法，还是应付环境的，因为在他出国的前几天，我同韩参谋长往宋家去见他，我问他：“你到外国想看些什么？”他低声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

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我又问他：“假如时间稍长，将怎么打算？”他说：“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事后证明，他确是这样做了。因为他出国很短的时间，何应钦就对我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下，发言悖谬，物议甚多”等等，他们所谓悖谬者，我想主要是指“杨讲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抗日条件”，这正是当时蒋、何所最憎恶的。

6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15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6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当宋子文催杨赴沪时，曾说予以考察专员名义，及杨到武汉，蒋不提给名义了。杨对我说：没有名义在国外说话就不方便得多了。

6月29日，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及秘书亢心裁、樊雨农登轮赴美。码头上不约而同来欢送的人士，不下一二千人，很多工人学生争请杨、谢签名留念，人民的抗日热情，于此可见。

马文彦(西安事变前任杨虎城秘书)口述：

1937年5月，邓宝珊由西安回到三原，对我和杨明轩说：“虎城要出国！”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和明轩都感到惊讶。我急问邓：“虎城为什么要出国？”邓说：“南京要他出国，不出不行呀！”他希望我们在杨出国前能去上海和杨见见面，并说他

将去上海和杨住几天。邓走后，我和杨明轩商量去上海为杨送行的事，杨明轩说他近来身体不好，要我去上海见杨代为致意。我于5月下旬专程去上海，并和杨在一起会聚了近一个月。

杨虎城出国，要熟悉所去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风俗习惯，还要学习交际舞。杨白天由邓宝珊和我陪同去马宏根家，晚间另外安排住处。马在上海多年，曾经到过西安，与杨虎城、邓宝珊相识，他家也很排场。杨、邓和我每次去他家，他都能即刻约来上海艺人为杨组织个小堂会，演唱些小戏，或者邀来舞师，为杨教习舞步，有时陪杨、邓和我去郊外私人花园散步谈心。杨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马宏根家和于右任家度过的。

一天，杨和我在马宏根家小花园散步。杨说：“文彦，你是解西安围救过我的，与别人不同。我有点事曾经考虑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给人谈过，今天我想跟你谈谈，希望你能记住我说的话。”我说：“啥事情？你就说吧！”杨说：“是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我这个人一生只做了四件事情，其他不足道也！”我说：“请你说吧，我一定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话。”

杨说：“第一件事是杀了恶霸李桢。这件事你不知道，我向你大概说说。”

“李桢是蒲城县的一个大恶霸，~~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不但和蒲城县的官吏勾结，而且和省城里的官吏勾结。我21岁的那年，为了给地方除害（也包括报私仇，但私仇不能提），我就杀了这个恶霸。清朝时代，法禁森严，杀人偿命，还牵连家属。我杀了李桢，往北跑到原家（村名，距城20里），原家有个原老三，我过去认识他，是个挚友，就在他那里躲藏。原老三这时双目失明，只在家里喂养牲口，他把我藏在牲口圈内小房里，每天给我拿馍送饭，十分关照，我在原家躲藏了一个多月。离开原家，受了好多曲折之后才去吃粮当兵，从此我就走上

了当兵之路，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件事。其他三件事你都知道，今天只扼要地提一下。

“第二件事是：1921年陕西靖国军解体后，我孤军作战，众寡悬殊，我打着靖国军旗帜，撤往陕北，坚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为民主主义革命）到底（邓宝珊是靖国军第四路的一员，该路接受了奉系收编。因此，这是今天没有约邓的原因）。”

“第三件事是：坚守西安。这是为了缩短国民革命（即民主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这话是在西安被围时，我向李虎臣讲的。1927年1月初在三原史可轩家已向你讲过。”

“第四件事是：发起去年（1936年）的‘双十二’起义，促进了抗日，停止了内战，你参加了全知道。”

“快要抗日了，我现在被逼迫着要出国……”说到这里，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再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看他眼圈湿润，快要掉下泪来，便故意用别话岔开。这时，杨站了起来，大声说：“总而言之，我这一生只做了这四件事，其他不足道也！”

三、无孔不入，杨夫人上海遇险

晁晓愚口述：

（插图）

176

南京办事处派人照料

1937年3月29日，杨虎城将军在杭州已决定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和政治。随后，我们南京办事处即着手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外交部等机关，交涉办理出国的各项手续和护照。

但在联系预定的随员中，因朱亚英（时在南京陆军大学上学，过去曾在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工作，通德语）起初答应随同出国，以后又提出疑难，犹豫不决。又几经南京和西安再三电报商

权，最后，改为樊雨农随行。

这时，大家对杨这次出国也有各种疑虑和不同看法。陈子坚说：主任（杨将军）对“双十二”运动的估价是：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在政治上仍是胜利，总算见义勇为的好事！这话当然有它一定的正确性。张汉卿在蒋答应了“八大主张”之后，亲送蒋返回南京。蒋介石不顾信义，判处张以10年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以后在名义上虽予特赦；但事实上，张仍在奉化拘禁，不能得到自由。当时号称“三位一体”的张，既是如此；现在杨的出国，怎么还说成好事呢？李筱亭说：蒋对西安事变，认为是“危害国本，凌乱纲纪的妄行！”这在他写的《西安蒙难半月记》一书中和今年2月间所开“三中全会”上完全讲明了这些问题。所以，人家只准许他出国，肯定的也不是好事。其他人认为，蒋介石全不看“双十二”的动机是什么，他能生还南京，这是出乎他意料的一件大幸事！但他现在只为蒋孝先、杨镇亚、肖乃华、蒋瑞昌等特务之死哀悼！就丝毫没有想到这几个人之死，固然也是惨事，而打内战，动辄死人数以万计的那种凄惨为何如耶？

我们把这些看法告诉李志刚代表后，他说：“出国的事，业经主任和委员长（蒋）于3月29日在杭州当面研究决定了，旅费10万元。现在，咱们‘成事不说’，对主任出国不必多疑，赶快办理手续好了！”

4月底某日，南京办事处忽然接到周梵伯由西安寄来一件航空快信，内容大略是：“奉主任面谕，即函你处。因为谢先生（杨主任的爱人谢葆真）拟同拯中等人，日内即从北平径往上海，料理出国一切琐事，以便主任到沪后，就不至再为多延时日，希你处速派干员，先往上海照料，和预定安排居住的旅舍等问题。特此达知，并将办理情况，随时告知，以备转报为盼！”

办事处接到周秘书的航件后，即着运输科长张慎夫，即日赴沪，去给谢先生在上海选定旅舍。经几次函电商榷，最后决定了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五楼大小房间，即电西安转达北平谢先生知照，径行前往。

谢葆真由平到沪

电报发出后，未经几天，谢先生即携她的孩子拯中与勤务兵张遇春等人乘平沪直达快车到了上海，即住在预定的新亚酒店。为了安全，在旅店登记为“孙”姓。

跟着，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也到上海，就住在新亚酒店中谢先生房间隔壁，以便每日照料方便和走访友朋。当时在上海的熟人，也不时地前往新亚，按房间号去找“孙”姓。至于办理其他手续，也从来未露出杨和谢的姓名关系。

在这期间，杨将军由陕飞沪的日期一再向后展延。原定5月6日，后又因他本人的身体不大舒服；加之5月下旬某日，他的幼儿拯人患病后，虽经中西医生诊治，医药无效而竟夭折！他因此受些刺激，精神欠佳，未能按时飞沪。

因杨将军飞沪没有确实日期，张科长这时又有军用物资，亟待装车，所以他就返回南京，交涉办理军运事宜。

张既返回南京后，上海方面仍需有人照料，我便准备前往。

我赴沪往视和送别

在这期间，西安、南京和其他各地前往上海送行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我是驻南京办事处的主任，1932年曾在上海呆过一年）。当我去的这天，即在下关车站，又遇到于右任先生所派王陆一，焦易堂所派史新三，此外还有杨任天、冯华堂等人也到了上海。除王陆一有他经常来沪的固定住所外，其他几人由我

招呼住在西藏路一品香饭店内。安排好他们，我就去新亚酒店看望谢先生。但我去后，谢同李等已外出，未在酒店；我便同张遇春谈了一会。下午我再去时，他们都在，大家交谈了在南京、西安方面最近所做的准备工作情况之后，我问李：“维城兄，是否需要我也搬住在这里招呼？”李答：“因为主任尚未到沪，这里有我，也没有什么事可办；你就不必再住这里了。”我说：“咱们住在一起，人多了热闹些！”李说：“现在咱们对外还保密着，没有露出真实姓名，所以外人还不知道这里住着杨将军的眷属。我觉得人多了反而不好！”谢说：“你和南京来沪的许多友人，既然已住在一品香，就暂且不要搬来；如果有事，再给你打招呼吧！”

缓后几天，西安的各界人士和乡亲们前来上海给杨主任送行的人数更多了，但杨主任因其他事故，又推迟行程，尚未到沪。

于公馆来的“副官”

有一天早晨约八九点钟，我刚起床，李经理即由新亚给我打电话，他说：“请你来一下，有事需要面谈。”当我到新亚后，李说：“刚才发生一件令人吃惊和讨厌的事！”我急问：“什么事？”李说：“我早上到谢先生房间正谈话时，茶房进来对我转递于右任的一张名片，说‘于院长公馆来了一位副官要见’。我说‘请他进来’。茶房即将一位叫张庆善的副官招呼进屋，他进来后向我和谢先生一一鞠躬。当给谢先生鞠躬行礼时问：‘是杨太太吗？’谢先生即以小声回答：‘是的。’这时，那位张庆善副官就说：‘我是监察院的副官，名叫张庆善。今天早晨，院长公馆炖牛肉，大阿婆（于的老夫人）着我来请谢先生和少爷一同去吃肉，现在，请你收拾一下，公馆的汽车来了，在门口等着！’

“我听了他的话，即发现几个疑点：（一）于院长公馆既然准备炖牛肉请谢先生，为什么昨天晚上不事先来电话联系？（二）

今天早上打电话也可以，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却派来一位副官？
(三) 副官来了怎么还这样的俗气，拿着院长的名片作证明呢？
(四) 这里酒店中备有新式汽车多辆，专供客人出入，很方便！为什么要派汽车专接呢？

“我就立时代替谢先生对那位副官说：‘好吧！请你先回去，谢先生稍事收拾一下，也就去了。’而那副官却说：‘我是不是在外边稍等一等，同太太一同去好些。’我说：‘那不必，这里的汽车也很方便，不要客气。’他看等不着，随即告辞退出，经我把他送到屋外后，即拨于院长公馆的电话，问明情况，方知并无此事。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知那家伙不是好人！即问茶房：‘刚才那位张副官呢？’茶房答：‘他已下楼去了。’我想我们这次来上海并未露出真姓名，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呢？不但知道得清楚，欺骗的手段也是那样的高明，你看多危险呀！”

上述情况，李一面对我说着，一面又把那张假于右任的名片交给我看，这张名片是仿宋字体铅印的。从这张名片上，怎能辨认出真伪呢！

李的话说完，谢也说：“刚才如果没有李经理在这里的话，恐怕就要闯下大乱了！他真机警，我不能在这里再住了！咱们研究，另找妥善地方。”

我说：“维城兄的阅历丰富，经验很多。今天多亏他在这里招呼，使坏人无机可乘；不然的话，那真是危险万分了！”

李说：“我起初也仅仅是觉得他说的有些离奇，并没预料到那是坏人呀！现在谢先生她既不情愿在这里住，你来了，咱们研究一下，看哪里合适？”

我说：“咱同谢先生研究吧！现在主任来沪尚无确实日期……”

这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上海华洋杂处，坏人很多，绑匪

拉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真是乌烟瘴气、黑暗污浊的鬼世界，没有好人立足的地方！对谢的安全问题，实觉可虑。李接着说：“主任既然还没有来这里的一定日期，咱们是不是离开这里，先回西安？”

谢说：“这个问题，我看虎城他也不能在西安再久待了。咱们回去往返……”我看她的意思是不肯匆忙返回西安。

我即问：“那么，南京呢？”

谢答：“虎城他最讨厌的就是南京！所以我也就不应再去了吧！”

李说：“咱们既然不愿远去，那么，咱们就在本市内，你看宋委员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宋子文）和于院长他们这两个公馆中考虑一下，究竟哪家比较合适？咱们再决定和他联系好了。”

谢说：“在这两处，当然于家要比宋家熟悉得多了。”

最后，我们就决定由我去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内和于公馆联系。当我去于寓晤见了大阿婆，说明来意后，她说：“葆真要想在咱这里憩两天，还有什么说的呢？请她和孩子都来，我老婆子都欢迎！”

经我把大阿婆的表示回复了以后，谢先生即于当天的12点以前从新亚移居到静安别墅于的公馆中了。

杨将军由陕飞沪

在谢葆真母子移居静安别墅于公馆以后，约有10多天，我收到西安来电，内容是：“……主任决定于感日（27）上午9时，乘欧亚班机飞沪。同行9人，请转告亲友们届时到龙华机场迎接！……但亦不宜扩大从事！务望注意，特此电知。……”

这天晚间，我又接到李代表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大意和上电

略同。李电说：“……顷奉主任来电，方悉感日上午乘欧亚班机，由陕起飞，过京不停，即行赴沪。预计下午3时，即可抵达龙华机场。希转知至亲良友，届时往迎！注意不宜扩大，其他各项，俟弟明晨到沪后，再行面谈。志刚叩号印。”我即把这两份电报内容分向诸友好传达，通知他们届时去机场迎候。

5月27日下午3时，杨将军和随行人员乘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平安飞抵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同行飞沪的人有邓宝珊、周梵伯、申明甫、贾文郁、亢心裁、于明江、樊雨农和白澈如等9人。遂下榻于法租界霞飞路祁齐路宋子文的公馆。谢先生也从于寓再迁于宋宅。在沪稍事休息和周旋了几大，于6月4日，又偕邓宝珊、宋子文和宋美龄乘美龄号波音式飞机，飞往牯岭再晤蒋介石，报告十七路军总部结束经过和辞行。9日仍乘原机飞返上海，仍住祁齐路宋子文公馆中。

李志刚代表已在南京外交部王宠惠处把出国护照领出了。这张护照上记明6人：杨将军、谢葆真、杨拯中、随员王麟阁、亢心裁和樊雨农等。亢通英文，樊通德语。

在杨将军由庐山牯岭飞返上海以后的这几天内，凡是前往送行的各地各界人士，包括军、政、商、学、工、农和宗教界等，人数愈来愈多。嗣后，他们都要求备宴为杨饯行，聊表寸衷！这种隆情盛谊，在当时使杨无法可却，只得顺从大家友好的意志。备宴有以个人名义的，也有以集体名义的，他们都要求款别时间居先，一时颇费筹思。究竟应把谁答应在前，而把谁迟居后呢？最后，只好大略排了一下，大概情况是这样的：6月22日是邵力子先生在乐乐居；23日是王晓籁在功德林；24日是杨虎在广东酒家；25日是杜月笙、张啸林在国际饭店；26日是黄金鏞、虞洽卿在沪西四教堂；27日是吴铁城在漕河泾畔的绿荫草堂，即洗冠生的冠生园；28日上午是各地各界人士数百名在国际饭

店 19 层楼欢宴和照相；下午是于先生和刘守中在新亚酒店 7 层楼。大家热闹地把酒言欢，盛极一时。这时，因宋子文赴广东未归，曾电告其弟弟宋子安、宋子良，即在他们的私宅中作家宴。家宴也有好多次。上述宴会，由我作陪的也有好多次。

杨将军在上海，曾着陆军上将服装拍照成大半身像和便衣半身像，又把在国际饭店中各界欢送像，都加洗了许多张，分送给来沪送别的各位友好，作为留别纪念。这些留别纪念像，至今保存者为数也还不少吧！

在这次送别的各界人士中，原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如孙蔚如、冯钦哉二人虽未曾去沪欢送，而叛变杨已逾 5 年的马青苑，经过南京的友朋劝告，并经由大阿婆的规诫，这次竟能同往上海给杨送行。

杨临出国的这几天，对至亲友好的谈话中，也曾流露出了许多愤懑言词，不得抒诸心怀！如我曾听到他和友朋晤谈时，几次谈到“恩多怨深”呀！“愤激思奋”呀！因为我那时在上海也是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对于送往迎来，颇为忙碌异常，所以对杨将军和朋友们的谈话，未能作长时间有系统的静听，仅可断断续续的偶然一听罢了。他的话其中当然有暗示的某人和某件伤心事的存在，而是愤恚异常的！

在常住上海的人士中，这次仅未看见杨将军和徐朗西的往还，这必然也存在有什么矛盾吧！

黄浦江上依恋别离

6 月 29 日上午七八时，凡来到上海送行的同志们，都已齐集到外滩黄浦江边码头，大约 9 时，杨将军和随行出国的人员、陪同送别人员都先后赶到轮船码头。这时，因为胡佛号远程轮船排水量大，而黄浦江中的水量过小，所以胡佛号不能靠近码

头，即停泊江湾中心，须由小火轮载着客人们转送到轮船。上海名人张嘯林先生着他的自备小火轮，专将大家一齐送上胡佛号。轮船起锚开船的时候到了，杨将军、谢先生等同送行者一一握手话别。当大家仍退上小火轮时，胡佛号上的彩色纸花，风吹飘扬于外滩江中和江边，杨将军等招手和大家热情依恋而离别出国了。

当胡佛号开动东行时，杨将军等人还站在船上和大家相望，直至船开行约有数里之遥，彼此已看不见时，张嘯林先生的这艘小火轮才回靠江边码头，大家各自登岸。

此时，送别的同仁都有相同的感觉：杨将军从军多年，抱着救国的心情，现在放洋出国考察，他日归来时尚不知大好河山是怎样？客主们无限的惜别和怀旧心情，与他在离开西安时告别亲友的情景是一样的。

四、调虎离山，被迫出国军事考察

亢心载口述：

1937年5月初，杨虎城将军被迫接受蒋介石命令，将前往欧美各国进行考察。消息传出，引起各方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十七路全体官兵无不心怀激愤、留恋和惜别之情，各方打听杨将军的行期，除了向他写信、送纪念品和登门访晤外，还积极准备盛大、热情的欢送会，借以表达对杨将军的爱戴和崇敬。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将军由西安动身赴上海。这一天，风清日丽，万里无云。天还未明，就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整队或分散奔向西安西关飞机场。打着各式彩旗，响着各样乐器，人流从城内、郊区四面八方向飞机场汇合。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人

人都想再看一下杨将军，都说，这是空前的大欢送。一些进步的人士说：这既是对抗日将军的欢送，也是对蒋介石的示威。

上午10点钟左右，杨将军和随从人员（我也在其中）到了机场。首先，部队吹起礼号，接着群众的乐器也敲响了，无数面彩旗随风招展。郊区来的农民特别多，他们中不少人带着红缨梭镖，敲着大锣大鼓。群众的欢呼声和军号声、乐器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杨将军从人海中的狭窄甬道通过时，振臂挥帽，频频向欢送者致意。两旁排列的人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这时，有十七路军的一个营长，看到杨将军走近，他挺胸举手敬礼。当杨将军向他伸手握别时，他激动得流出热泪说不出话。知识界的队伍排得相当长，他们的口号也特别响亮。“欢送杨将军”，“抗日万岁”，此起彼伏，有的人直喊得声音嘶哑。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杨将军登上机舱前，大家向他连说：“珍重，再见！”“一路平安！”这一天，在西安的顾祝同等也来到机场，同杨将军握别。我登上机舱。群众欢呼声和锣鼓轰鸣响成一片。杨将军满怀激情，不断向群众招手答谢，连声高呼：“朋友们，同胞们，再见！”

由西安到上海，杨将军和我们一行搭乘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这一天，天气爽朗，飞行很稳。这时，忽然听见乘客中有人同杨将军谈笑自若。我伸头向前排仔细端详，那位乘客转过身来，我忽然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同志。他身穿朴素的蓝布制服，头不蓄发，面颊上刚剃过的胡子还微露“苗头”。另外，和他们一起有说有笑的，还有邓宝珊先生。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飞机中途在郑州降落加油，陇海路局钱宗泽局长在机场迎

接，大家一起共进茶点、休息片刻，继续飞行。下午4时左右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安全降落。我从机窗外望，见有迎接人群，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其余的人我已记不起了。周恩来同志先我们一行步下机梯，很快地经人迎迓，坐着一辆黑色小汽车驶向市区。最后，杨将军下机。

杨将军5月27日到达上海至6月29日登轮放洋，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除“奉谕”去庐山看过一次蒋介石：“面聆指示”，作礼节上的辞别外，全部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在上海，他住在距宋子文公馆不远的一所西式寓所里。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7岁）由陕到上海，和他住在一处。这一期间，杨将军同各方面的交接应酬，的确是席不暇暖。由于他要远离祖国，而且归期无定，所以各地的老朋友、旧部属，不少人都亲到上海送行。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赵寿山将军在杨启行前二日，独自约我到一间小屋，亲切地对我说：“维恪（我的原名），你就要随杨先生出国了。究竟你们在国外要待多久，看来谁也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请你记着，到了船行海上，盼望你转告杨先生，不管天变地变，‘双十二’举义的初衷不能变，抗日的立场不能变。最后胜利，必属我们。务请杨先生坚持我们的正义主张，不可稍有动摇。”另外，有不少人嘱托我，杨将军无论走到天南海北，一定要同国内友好保持联系。也有人谆谆以杨将军的安全为重。叮咛我时时提高警惕。以后到了国外，杨将军忆起大家的关怀，总是铭感不置。

杨将军这次出国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随行人员，除杨夫人谢葆真、二儿拯中外，还有樊雨农（参

谋)、王麟阁(译员)和我(秘书),一共6人。樊雨农和我由西安随行。王麟阁是出国前不久由宋子文介绍来的。王曾担任过南京政府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和驻西班牙公使馆的代办,50多岁,是外交界历经几朝的老吏。据说因为他熟悉外交礼节,特派来给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另据传说,王实为南京派来监视杨的(归国后,传闻王因公奉派赴马尼拉,在海上跳水自杀)。另外,还有一位仲跻翰先生,也随同杨将军一道东渡。仲原任山西航空队队长兼教导团学员总队队长,这次出国考察欧美航空事宜,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介绍,愿和我们同行。仲年已40岁,有一副军人气派,对杨将军如长官,老是毕恭毕敬。到美国后,他就同我们分手,单独活动。

6月29日,杨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大来轮船公司的“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杨将军的亲友、旧部属和各方代表、同乡数百人来码头送别。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杨将军手扶栏杆,不断挥手向大家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都离去了,自己还不忍转回客舱,仍然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以下是杨将军欧美之行的旅程。

1937年6月29日动身出国,同年11月26日从法国马赛返抵香港。这次旅行,环绕地球一周,历经11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历时约5个月。

6月29日,轮船离上海港口以后,7月1日、2日,先后在日本的神户和横滨港停泊。7月8日,舟行太平洋上,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9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埠檀香山。7月14日,船抵美国西岸的旧金山。7月28日,杨将军偕我由旧金山飞往美京华盛顿,次日到达。7月30日,乘火车到纽约。8月4日,乘法轮“诺曼第”号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8月9日抵伦

敦。8月11日赴巴黎。8月28日，前往柏林。9月7日，离柏林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9月10日，赴奥京维也纳，12日转回捷克斯洛伐克。9月14日，经德国南部赴瑞士。9月17日，返抵巴黎。9月28日，应邀赴英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10月9日，再赴巴黎。10月14日，飞往西班牙新都，亲赴战地访问。10月21日，重返巴黎。10月28日，离巴黎，往马赛。10月29日，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东驶归国。11月26日上午11时，到达香港九龙。

综览5个月的旅程，可以看出，杨将军这次欧美之行，以在法、美两国居留的时间较长，在法约50天，在美约计3周。其次，就是英、德两国，在英约有两周，在德约有10天。至于在其他一些国家，有的只作了几日的游览，有的甚至过境而已。杨将军居留法、美、英、德四国的时间比较久，这并非偶然。因为这几个国家，是世界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通过这样重点的考察，就易于了解其社会生活和存在问题，就能理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走向死亡的必然性。另外，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有比较大的发展；除南洋地区外，我国的侨民在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多的。为了宣传抗日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机会同外国的进步人士和爱国侨胞、留学生多作接触，也有其重要意义。

杨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在杨将军离美赴欧洲时，即决定暂留旧金山，并由樊雨农参谋随同照料。以后，杨将军东归之计确定，才电召他们到巴黎会合。随员王麟阁，原先也留在美国，杨将军返国前不久，也由美来欧。

6月29日辞别了祖国，杨将军同我们随行人员在甲板上畅谈了一个月来在沪的各种感触，我们深深感到他对事物的体察如此深切。虽然多日来应酬频繁，但他的精神仍然十分振奋，并未显出疲劳。午饭后，他约我们去他的座舱里闲谈，风趣地讲到

10年前他在日本的情形，接着告诫我们说：“大家到了国外，免不了每日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中国有些人媚外，有的人排外，我看这都不对。我们是个伟大民族，我们应持不亢不卑的态度。对人应有礼貌，也不要卑躬屈节，要有自尊心。要每天挤出时间学习，特别要着重学习新问题和有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我文化水平很差，希望大家不断帮助。”谈话结束时，他要求大家如有任何意见，务必随时提出。经杨将军这样一讲，大家也都有所警惕了。杨将军本人在轮船上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读书或和我们一块儿谈问题。他这次由上海带来若干册书，他同我商定，先阅览李鼎声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由我诵读）。晚间，船上组织的文娱活动，他除了看看电影之外，其余一概不参加。他最喜欢听我们讲中外历史和当今的各国政治形势。而我们都极乐于听他讲辛亥革命和陕西靖国军、西安8个月守城的故事。

船驶入波涛汹涌的黄海，我记着临行时赵寿山将军对我所讲的一席话，就趁其他随行人员去看电影的机会，和他进行了一次密谈。我把赵寿山将军托我转告的话，一五一十地给他讲了之后，他长吁一口气，然后微笑着说：“寿山和我一起，出生入死，多年共过患难。他进步很快，意志坚定，我极信任他。这次我到海外，纵然喝了洋水，但总不能换了脑子呢。寿山不断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我自然也不愿落后。我们在西安发动事变，是为了什么？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方向。所以我认为，寿山用意很好，我只是觉得他有点过虑。我将来还要回国，来日方长，让他等着瞧吧！”

东渡之后，轮船将要行经日本的神户和横滨，而且在两港都要停泊，杨将军又召我们商谈过境应注意的事项。他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不断向外扩张，尤其近年来对我国步步

进逼，以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阴谋多端，用心毒狠，得寸进尺，自以为得计。但对中国人民他们总是非常害怕的，尤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趋扩大，它对我国革命日益发展的形势，已表现出无限忧虑。我这次东渡，日本当局当然早已得到情报，对我，他们是非常仇恨的。因此，船到码头后，警察、刑事、新闻记者等一定要对我进行监视并来访问，可能还要我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甚至要我讲讲“西安事变”。我讨厌这帮家伙，准备称病不见，一切由亢、王两秘书设法应付。

7月1日上午7时，船驶进日本神户港。果然有同盟通讯社记者神板鹤太、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柴田九万彦和崑信正、大阪每日英文新闻社坂井浅太郎、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上村四郎、《神户新闻》记者下司利一等，进舱请求谒见杨将军并摄影。他们还没有行近杨将军的门口，即由我和王麟阁引导到我们房间，与之接谈。他们几次要求会晤杨将军，我们都以婉词谢绝，说杨将军乘船昏晕，身体不适，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代答。这些自称记者的人，询南问北地乱问一气，从西安事变扯到中国共产党，从上海黄浦滩又说到拯中的年龄，从我国南方的霉雨季节再说到日本的气候等等。有的要求给他们一张杨将军的最近照片，我们也推辞未允。最后，他们提出几条有关时局的问题，经我代答如下：

（一）中国政局，自西安事变以来，日趋统一和稳定。处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均已觉醒，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和内争。现在各党派为了共御外侮，都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齐心协力，终止内战，发展国民经济，以期巩固国本。

（二）日本以往对中国的非友好行动，使中日两国人民，同受其苦。中日问题解决不难，只要日本政府放弃侵华政策，以平

等态度对待中国，两国邦交，当可逐步改善。

（三）你们说我主张联俄，其实凡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任何国家，中国人民都愿与之合作。联俄本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实行的“三大政策”之一，主张联俄的人，绝非共产党一个党派。

（四）西安事变，乃日本政府数十年来对华实行侵略政策之后果。溯自九一八以来，我国人民目见国土沦丧，人民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益见高涨。西安事变，正是反映了人民共御外侮，保护国土的正义要求。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但没有危及中央政府的统一大计，而且促成了全国各党派的大团结。

（五）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我所谓抗日，是反对贵国实行侵华的极少数人；对日本广大人民，我向来主张友好相处。昔年我到贵国考察，曾结识一些朋友，觉得中日两国人民并无恶感。贵国人民，也是不赞成少数人的侵华政策的。

（六）我奉派赴欧美考察军事，不来贵国，这是因为十年前我曾到过这里。但是将来中日邦交一旦改变，我仍打算作二次访问。我对贵国人民感情很好，愿通过你们的报纸，对贵国人民致意。

代答问题毕，他们还再三叮嘱我，代向杨将军致意。

我不曾去过日本，原想上午把记者们对付过了，下午登岸观赏一下岛国的风光。不料一点钟左右，又来了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伊井喜子治、警察部外事课勤务松本一雄、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通办鸿山俊雄等三人。他们也要求会见杨将军本人，我用对付记者的办法谢绝了。看起来这帮人不同记者，他们不多谈时局问题，而侧重了解杨将军的旅行动向。谈话进行了两小时，最后向我要了一张我的带衔名片才去。

警察们去后，忽听船上通告旅客一律携带护照到办公处集合；必须本人到场，不许代办。杨将军、杨夫人、拯中和我们就按通知前往。不料正在核对护照时，原来访晤杨将军的记者们并未完全归去。他们趁此机会，迅速拍摄了杨将军的照片，并走近他的身旁，称谢而去。

7月2日，船抵横滨。横滨水上警察署勤务外事高等视察矢作乙五郎、《日本广告报》记者田中源治、神奈川县广外事课手岛邦三和其他新闻记者十二三人，登轮请晤杨将军。他们还说，他们奉上级命令，知杨将军过境，特地前来招待，并向他致意。记者们也是要求同杨将军本人晤谈，我和王麟阁仍按在神户办法，谢绝了他们的请求。

在横滨，樊雨农参谋趁登岸给我们购买一些日用品之便，曾买了几份当日的日、英文报纸。关于杨将军乘船过境以及记者访谈情况，都有所报道，有的报还刊有照片。报道大致是说，杨将军因病未能接见记者，仅由秘书和他们周旋。说我们秘书代答询问，多是闪烁其词，不肯正面直言；说杨将军口称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却仍然主张联俄；说杨将军对中日关系，归罪日本，并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为两方面，这是离间之计等等。

唐得源口述：

杨先生是在1937年7月底抵达纽约的。在他抵达纽约的次日，我们三个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的陕西学生，得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某的通知，一道去杨先生住宿的旅馆，会晤杨先生。去的三个人是韩寿萱、王子休（德崇）和我。在杨先生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期，我曾经以教育厅代厅长身份列席过省政府委员会议，任职约半年，和杨先生是比较熟的。杨先生在纽约住的是一家高级饭店。我们进入饭店之前，很清楚地看到在饭店外

面的楼上挂着中国国旗（因为杨先生是奉政府委派出国考察军事的，按照国际礼节，美国政府是应当这样表示的）。我们在向杨先生表示问候之后，杨先生对我们说，他这次来，是为了搭船转赴欧洲，住不了几天。随同杨先生到纽约的只有秘书亢心裁一人。亢曾经被杨先生资助到英国留过学，蒲城人。

关于杨先生到纽约后的食宿、交通等事项，都是由驻纽约总领事于某负责料理的。于曾经招待杨先生吃过多顿饭，我们也被邀参加过不只一次。当时据我们从旁观察，于对杨先生的招待，还是比较殷勤的。

杨先生在纽约停留期间，纽约华侨曾开会欢迎，并请他讲演。这一活动是由冀朝鼎负责接洽并陪同杨先生参加的。随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也邀请杨先生讲演，我们三个人都参加了。我还是组织者之一，因为当时我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中国学生会的会长。讲演地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参加听讲者有百余人，当杨先生在亢心裁陪同下来到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在讲演中，他精辟地阐述了抗战必胜的一些主要论据，并且积极地表示了他自己准备回国参加抗战的决心。讲演的具体题目，记不清楚了。关于抗战必胜的论据，他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日本经济基础薄弱，如果战争拖得过久，摊子铺得太大，恐怕他的力量难于支持下去；第二，从国际形势来看，战争发展到一定时期，英、美、苏联等国，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在远东的利益，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这对中国将是非常有利的；第三，中国是为反抗侵略而战，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并且我们有辽阔的大后方，这些都是我们必将取胜的有力保证。最后杨先生谈到他的态度时说：“我是军人，是最先倡导抗战者之一，今天抗战既已全面展开，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尽速返回祖国，站在抗战第一线，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听众对杨先生在

讲演中所作出的精辟分析和表现出的高度爱国热忱，深为感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遗憾的是，当讲演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以责问的口气提出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要求杨先生回答，又有一两个人站起来，随声附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当众给杨先生以难堪。这几个人我们不认识，肯定是混进会场的几个国民党特务分子。当时马上就有人站起来针锋相对地给以反驳说：今天我们请杨将军来主要是讲抗战问题，如果在此范围以外有什么问题要请杨先生解答，不妨在另外的场合或用书面提出，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不适当的。这时，我们几个人就趁机拥护着杨先生很快地离开了会场。随后，我们陪同杨先生和他的秘书，游览 105 层的摩天大楼，一直上到了最高层。在上边我们共进了晚餐，并且一起照了相。在进餐中杨先生谈笑风生，兴致极好。

在杨先生到达纽约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当地新闻记者的注意。据亢心裁对我们说，到旅馆访问杨先生的记者日必数起。《纽约时报》曾专题报导了杨先生到达纽约的消息，并附有杨先生的小传和照片。直到杨先生坐上了轮船以后，我们上轮船去送行，还发现有记者赶到船上进行采访。

当杨先生离开纽约的前夕，我们几个人到他住的旅馆作了最后一次晤谈。谈话的内容我记得有这样两点：第一，我们建议他到欧洲以后，不妨多停留一段时间，多看一些地方，来一次也不容易，国内战争情况也有待进一步了解。最好在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再考虑决定动身回国的事情，这样比较稳妥一些。他回答说，我准备到了那里，到几个国家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就够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国内前方将士们都正在战场上流血流汗，我呆在这里游山玩水能行吗？至于谈到个人问题，我也顾不上考虑得那么多了。我们三个人听了这一席话，心情突然感到沉重起来。

第二，我们问到他关于所谓对张杨训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含蓄地说了一句：“这个问题，连我也答复不上来。”

杨先生乘诺曼第号客轮离开纽约的时间，距离他到达纽约的日期大致不超过一个星期。大约隔了三几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杨夫人谢葆真带了她的7岁的公子拯中和随员樊雨农到了纽约。可能杨先生早已和杨夫人通过信，了解到我们三个人在纽约，所以在她到了纽约以后，很快地就和我们联系上了。见面后，杨夫人首先告诉我们，他们一行这次是从美国西部到纽约来的，准备搭船转赴欧洲，陪同杨先生一道赶回中国。她在纽约的一切生活，也是由那位总领事负责料理的。她在纽约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此期间，我们三个人陪同她和那位总领事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参观过一些热闹街市，并在商店买过一些东西，而且不止一次地到她住的旅馆里进行过访问和谈话。此外，我们还陪同她和拯中、樊雨农看过一次电影，又到唐人街吃了一顿广东饭。由于她是以陪伴杨将军的身份来的，她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当时杨夫人和拯中穿的都是西装，杨夫人风度落落大方，非常健谈，公子拯中天真活泼，引人喜爱。俗话说：乡亲见了乡亲亲。因此，杨夫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表现是非常热情的。杨夫人一行也是搭乘诺曼第号由纽约转赴欧洲的。

195

秦丰川(当时系旅德华侨)口述：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把蒋介石送回南京，马上被扣起来。不久，杨虎城将军也被迫离开军队，由国民党政府给了一个“军事考察专员”的名义，到欧洲各国去考察军事。大约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杨虎城将军到了巴黎。和他同行的，只有一个他过去的宪兵营长金闽生，一个照料生活的秘书亢心裁，以及杨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

那时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旅欧华侨正在巴黎开第二次抗日救亡大会，旅德华侨也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因此有机会在巴黎认识了杨虎城将军。关于杨虎城将军的为人，我早就听到过一些传说。听说他少时家贫，没有念过书，长大为武，很能打仗，经常打富济贫，有绿林豪杰之风。“双十二”事变后，他和张学良将军的行动，天天在柏林的各种报纸上刊登，有时也介绍一些他们过去的历史情况。那时张、杨齐名，都成了国际新闻人物。我想象中的杨虎城将军，一定是一位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人物。可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却是这样的：年纪四十几岁，身体魁梧壮实，方脸浓眉，两目有神，说话操关中口音，态度和蔼可亲，谈问题头头是道，一听就知道他有相当高的政治思想水平。

杨虎城将军在巴黎的时候，名义上虽然是国家的“军事考察专员”，但他根本得不到法国政府的正式招待，哪有军事可以考察！他也曾给蒋介石打过电报，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是始终没有答复，只能作些个人参观游览的事情而已。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世界展览会，他差不多每天都去参观，对于苏联展览馆特别有兴趣，看了又看。参观以外，抽时间就看苏联电影和法国的进步戏剧。他很虚心好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请人解释。记得有一次，他请几个留法同学去看话剧《母亲》，因为语言和情节都不懂，回到旅馆后，让我们把高尔基的小说内容，给他说了一遍。这样不懂就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杨虎城将军身上是很突出的。

为了避免蓝衣社特务的捣乱，杨虎城将军没有在旅欧华侨抗日救亡大会上讲话，但是和各国华侨代表团举行过几次座谈会。那时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听他谈一谈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但他始终没有详细谈过。他总是矜持地说：西安事变的原

因，是要求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只要坚持持久抗战，中国一定能够胜利等等。并且，他每次谈话都是比较简短的，我们感到不过瘾，便向他的随员金闽生去打听。从金闽生的谈话中知道，杨虎城将军当时所以不谈西安事变的经过，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因为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的宣传，如果自己再谈真实情况，必然会揭露蒋介石的欺骗，这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第二，因为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西安事变的要求已经实现，自己正在要求回国抗战，再谈西安事变经过，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第三，因为在欧洲各国，到处都有蒋介石的特务，他们对自己一定怀恨在心，尽量设法捣乱，不谈西安事变经过，可以免去不少麻烦。同时，金闽生还告诉我们，杨虎城将军为了争取回国抗战，真是委曲求全，不敢再有得罪蒋介石的地方。

杨虎城将军对西班牙战争非常关心，他几经交涉，得到去西班牙的机会。在西班牙两三个星期的访问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认识了世界人民团结的力量，增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举了许多亲身遇到的事例，说明中、西两国人民互相支援的热情。他说，在西班牙的国际义勇军里，有几个华侨，代表中国人民，参加反抗佛朗哥的战争，人数虽然不多，起的影响却是很大。旅欧各国华侨，不断地捐款寄给政府，支援反法西斯的斗争，钱数虽然有限，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小。他又说，西班牙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十分同情支援的。他走到哪里，人们欢迎到哪里。有一次，他和两个随员进了一家饭馆，堂倌起初以为他们是日本人，不理睬，后来知道是中国人，便热情地招待起来，最后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更是欢天喜地，一再表示敬意。在算饭账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不收，硬要自己请客。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对于德国之行，杨虎城将军很是慎重。因为他知道希特勒政府是不会欢迎他的。加之蒋介石的特务，在柏林最多，估计可能和他为难。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柏林不但遇到大使馆的阻挠，没有参观上德国的军事，而且遇到蓝衣社特务捣乱，没有和更多的华侨见面。在杨虎城将军到柏林的时候，车站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人欢迎他：一部分人是我们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的代表，有几个人是蓝衣社的特务分子。火车进站以后，两方面的欢迎人们，都拥到车门口，抗联会的代表给杨虎城将军献了鲜花，欢迎他住在预备的旅馆里，自称大使馆的代表说：“你是国家的军事考察专员，应该住到大使馆。”在这双方争执的关头，杨虎城将军胸有成竹地说：“我就住在旅馆吧，免得给大使增添麻烦，回头有时间，我去看大使。”那个大使馆的代表，还想威胁什么，可是杨虎城将军已经随着抗联会的代表走了。事后杨虎城将军对我们说：“我很清楚，自称大使馆的代表，是想把我骗到大使馆，软禁起来，限制我的行动，我当然不能上当。”

杨虎城将军在柏林住了不到两个星期，除了参观、游览以外，便是和抗联会的朋友们来往。由于蓝衣社特务对于他的活动十分注意，因此抗联会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只是举行了几次小型的座谈会。但是对于这样的活动，特务们也不放松破坏。记得有一次，抗联会要举行一个规模较大的座谈会，请杨虎城将军讲话。为了防止特务，地点选择在一个僻静地方的旅馆里，通知是用人连人的办法进行的。可是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20来个“面生歹人”。他们进了会场，有计划地挤坐在一起，这时抗联会的会员到了七八十人，杨虎城将军已经坐在U字形桌子的正中，既不能宣布座谈会不开，又不能告诉杨虎城将军情况有变。在紧急的关头，我们只有通过彼此的暗示，迅速采取了临时布置：坐在特务周围的人，对他们实行监视；坐在杨虎

城将军旁边的人，对他实行保护；坐在门口的人，对以后再来的人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大家在思想上都作了动武的准备。可是机警的杨虎城将军，早已看出了情况的变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团结抗日，根本不谈西安事变。不料不等杨虎城将军讲完，特务们就进行挑衅。有一个特务打断杨虎城将军的讲话问：你为什么不讲西安事变？我们要听西安事变的经过。杨虎城将军知道这是特务捣乱，他既不生气，也不吃惊，心平气和地说：“西安事变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用不着我再讲。”又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问：“《西安半月记》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杨虎城将军微笑着回答说：“西安事变是个要求抗日的请愿，如今抗战已经开始了，当然是真的。”又一个特务跳起来问：“不安内能不能攘外？”杨虎城将军还是很从容地回答：“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是安内抗日，现在已经团结抗日了。”这样答复之后，特务们一时再提不出什么挑衅的问题，坐在那里互相观望。抗联会会员就抓紧机会，接二连三地发言。有的人介绍国内抗战消息；有的人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人呼吁旅德华侨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会场里顿时充满了爱国热情，不但是抗联会的会员人人振奋，就是和特务们一同来的人里，也有人表示“不抗日不行”。这一场斗争，显然是以抗日力量胜利，捣乱分子失败而结束。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来的20来个人里边，有半数以上是特务们临时从华侨小商中雇来的。他们只是来壮声势，并不热心捣乱会场。甚至有的人来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开会以后，才知道是欢迎杨虎城将军。他们也想听一听抗战形势，内心里反而讨厌特务捣乱。

杨虎城将军原来很想从德国到苏联去访问，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没有去成：一方面是由于特务的造谣破坏，使他产生了顾虑，怕蒋介石怀疑他和苏联有什么关系，不让他回国抗战；另方

面是由于苏联大使馆在签字以前，得向政府请示，需要耽搁一些时间，他急于回国抗战，不愿意再等。对回国以后如何参加抗战，当时杨虎城将军谈过两套准备：首先是请求蒋介石委派抗日工作，让担任什么工作，就担任什么工作，只要能为抗日出一把力，便是心满意足了。其次，也考虑到蒋介石可能忌恨西安事变，不给工作，那就争取回到陕西，在关中地区组织民兵，至少可以动员十万之众，和日本帝国主义周旋。在这样打算之下，他返回巴黎，积极准备回国。那时蒋介石对他的几次“请缨抗战”一直没有答复，但他再也等不下去。他说：他是一个军人，过去主张抗战，如今抗战已起，自己怎么还能躲在国外！况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国以后，不愁没有事做。他要求回国抗战，真是急如星火。为了帮助他抗日，他还约了十几位留欧学生，和他一同回国。

在10月底左右，杨虎城将军离开巴黎，从马赛乘法国轮船回国。在一个半月的航程中，他的抗日宣传活动，比在欧洲时还要积极。他虽然坐的是头等舱，但是和大家并不是隔离的，每日三餐，他都和大家在餐厅吃饭。当大家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以后，就有人要求他讲话。他除在餐厅对中国旅客作过一次集体讲话外，还和一些旅客在饭前饭后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及其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二、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胜利的条件；三、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他谈得很活跃，大家听得很兴奋。每天他总是抽出一些时间，和一同回国的留欧学生谈话。有时是个别谈的，有时是两三个人在一起谈的。这种谈话，内容非常广泛，或是问讯个人历史，或是交换政治见解。他特别好提出国际问题，让人分析。

轮船经过西贡，因为上货、卸货的关系，整整地停了三天。

有些客人在西贡下船后，向华侨宣传，说是船上有个杨虎城将军，华侨商会知道后，马上派代表来欢迎，并且要求上岸去讲话。记得杨虎城将军在西贡讲了两次话：一次是在七八百人的欢迎大会上讲的，一次是在五六十个华侨代表的宴会上讲的。他讲话的内容，除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问题外，又增加了国际政治形势和华侨抗日救国的问题。他所讲的国际形势的内容，主要是在船上新学来的。虽然他听人分析，没有记过笔记，他对人讲话，也没有写过讲稿，只是站在台上，脱口而出，可是讲得有条有理，生动活泼，这说明他有过人的记忆能力和一定的逻辑天才。

轮船将要靠近新加坡码头的时候，我们在甲板上看到岸上黑压压地站着许多人，手持小旗，向船上招呼。有一个音乐队，站在人们的前头。起先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等到看见一幅写着“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额，才知道是华侨的欢迎行列。这时，杨虎城将军以感奋的目光，注视着人群。轮船刚一靠岸，岸上锣鼓齐鸣，群众高喊欢迎口号，接着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激荡着山河，也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杨虎城将军就在这个在欧洲没有遇到过的场面中走下轮船，含着兴奋的眼泪，和欢迎的人们热烈握手。欢迎的代表说：他们接到西贡华侨的通知，知道杨虎城将军坐这次船来，特别欢迎，现在就请出席欢迎大会。于是大家分乘大小汽车，向市内进发。卡车上的旗帜，迎风飘扬，青年们的歌声，在人们的心中激荡，杨虎城将军的兴奋眼泪，总是含在眼眶里。他连连地点头说：“中国绝对不会亡！”

和在西贡、新加坡的情况相反，轮船到了香港，岸上没有华侨欢迎，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事委员会来欢迎的。这人30多岁，歪戴礼帽，流里流气，一看便知道不是个

正经东西。就在这个“欢迎者”的引导下，大家一同到了九龙。杨虎城将军和他的眷属、随员，被安置在一个旅馆，我们随他回来的学生，被安置在另一个旅馆。距离虽然不远，但是很少往来，这和在船上的情况完全不同。有时我们去找他，他也很少说话，在肩宇之间总是有一种苦思焦虑的表情。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他找我去说：“我到了香港，就给蒋打去电报，一直等到昨天，才接到回电，说是叫我到赣州和他见面。”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说：“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那你们就来，大家一同干；一种可能是把我扣起，那你们就另找抗日的机会吧。”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真会被扣起来，顺口就说：“扣是不会的，全国都在抗战，他扣起一个要求抗日的将领，怎么能向人民交代！”他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张汉卿不是还没有释放吗？”我说：“既然如此，不如不去，另找抗日道路好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并不妥当，那会给他们更多的诬蔑借口。现在是只许他扣我，不许我不去。为了团结抗日，个人纵然有所牺牲，也是值得。”我看他的主意已定，没有再说什么。最后他说：“我明天就走。我走之后，如果三天以内没有消息，你们便不要再等了。”他走之后，三天过了，没有消息；一星期过了，还是没有消息。我们知道他是真的被扣起来了，只好分别乘坐飞机、火车，前往武汉，再作打算。

从那时开始，杨虎城将军一直被蒋介石的特务囚禁着。和他一起被囚的，有他的爱妻谢葆真和幼子杨拯中。拯中生得聪明漂亮，平时很安静规矩，对人很有礼貌。到欧洲时，虽然只有7岁，但有大人的风度。他识字不少，好看书画，在人们谈话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总是坐在旁边看书看画。杨虎城将军对他很宠爱，经常不离左右，看到他的人们，也都十分喜欢他，认为他是

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谢葆真是一个女师毕业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思想比较进步，性情爽朗，心地公正。在杨虎城将军被囚以后，她自动带着拯中陪丈夫坐牢。不想这样善良的妇女和天真的儿童，也被特务囚死在狱中了。

五、遥望家国烽烟起，被羁他乡空忧愤

穴心裁口述：

7月2日下午7时，轮船离日本东进。太平洋上水波不兴，预计到达檀香山还有一周时间。杨将军对我们说：“过了日本这一关，前途的麻烦就少了。我们应趁海上风和日暖的季节，好好地读几本书吧！”杨将军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这时已阅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史略》两章。

杨将军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举世闻名，在这一船的旅客中，更是“知名之士”，因而虽在海上，曾不断有中外旅客前来拜访。其中谈话比较恳切而深入的，有中国的周崧先生、美国的辛慈爱夫人和一位牙科大夫。周崧先生是旅美多年的华侨，一位拥有雄厚资本的爱国商人，同情杨将军的政治主张。那两位美国人，也是仰慕杨将军的英名而踵门求见的。在单调的海上生活中，这种接触，对他也是一种慰藉。

7月8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为了证实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他着我即给宋子文发一急电。

杨将军听闻上述消息，心情十分激动。这天晚上，他睡得很迟，和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谈论国内抗日形势和发展前途，直至第

二天凌晨2时，才告罢休。从此以后，他的日常起居也有所改变，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使他不安，并嘱咐我们随时收听广播，并把每天张贴的新闻摘要念给他听。他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国内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遇有中外旅客访谈，也必然问问他们对事变的看法。这时他翻书也少了；同我们一起扯闲话也少了。他的心情是兴奋而紧张的，但有时却表现沉默，好像认真考虑什么重大问题似的。

7月10日和11日，连接宋子文由上海来电。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第二封电报后，杨将军经过熟思，即命我作复，电云：“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又发上海全国经济委员会王炳南同志一电，文云：“余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诸友好。”为了明晰事变详情，另发由上海转西安孙蔚如先生一电，电文是：“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此后，轮船驶经檀香山和到达旧金山，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船上通告，7月9日可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檀香山。杨将军在同我们闲谈中说：“檀香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听说岛上风景极其秀丽，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在这里宣传革命，首先成立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兴中会，掌故可能不少。因此，我们行经这里，一定要好好地瞻仰一番。”

7月9日上午10时许，轮船到达檀香山。刚一驶进码头，中国领事馆梅景周总领事和黄荫余领事以及新闻记者八九人首先登轮，热情迎接杨将军。上船后，华侨代表和群众百余人齐声鼓掌，向杨将军表示热情的敬意，并给我们戴上花环，表示欢迎，争相握手，非常热情。饭罢，杨将军乘车到领事馆门口，早有成群侨胞在门外等待。有人给杨将军拍照，有人请他签名，有人送赠他土产、纪念品。一会儿，学生群里忽然一致高呼：“欢迎抗日将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胜利万岁！”杨将军随即招手，向大家表示谢意。有位老年侨胞，操着广东口语，走近杨将军，右手搭扶他的肩膀，兴奋地说：“杨将军，你走的路对啊！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老侨民也死不甘心！盼你早一天回国抗敌。”杨将军安慰老人，紧握着他一双手，回答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一定要赶走鬼子，收复失地。”老人听罢，不住鼓掌。

午前，杨将军由梅、黄两领事导游岛上各处名胜，参观了市容以及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他对潜水艇兵员训练感到很大兴趣。

下午，仍由梅、黄两领事陪同，参观了宝石岭、大学、驻军区域。傍晚应梅总领事宴。宴罢，一同观赏夏威夷土人舞蹈。

檀香山和毗连各岛，共有人口40多万，中国人占2.7万。土著民族由于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歧视和残酷剥削，人数不断减少。

对于观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遗迹，他一直没有忘怀。因据梅总领事说，从前曾经保留了一些遗物和资料，现在多数已运往中国，有几座建筑物，也为地方政府占用，而且都变了样儿，按轮船行期，时间也无法安排了。后来，在领事馆茶叙时，梅总领事为聊偿杨将军的心愿，特约集几位老年侨胞，向他讲了中山

先生当年在岛上闹革命的一些掌故。

这次经过檀香山，虽然时间只有一天多，但由于领事馆的悉心安排和殷切招待，所见所闻，都给杨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船上同我们闲谈中，他扼要地叙说这一次的感受，他说：“岛上风光，真是秀丽已极，尤其行经附近丘陵地区，树林夹道，野花可称得香闻十里。不幸的是，美帝国主义今天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不但当地有色民族长期受难，远东其他地区，也严重地遭受着侵略。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就不会有和平的日子。另外，中国的侨胞真可敬可爱，他们关心祖国，使我万分感动。我们这次到岛上，大家热情地欢迎、欢送我们，我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这样，完全出于支援祖国抗战的心情。我们国家向以文化悠久和地大物博自豪，我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赶走侵略者，振兴中华，才不辜负侨胞们的殷切期望。”

按轮船行程，7月14日才到达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杨将军从行囊中取出七八部有关美国历史和社会情况的书籍，同我们一起，连续学习、讨论了两天。此外，就是经常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

7月14日下午3时，轮船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港。当地领馆黄朝琴总领事和主事邝兆荣前来迎接，还有报馆记者十余人也登轮访谈。我们上船后，看见码头并无欢迎杨将军的人群，心里就觉得惊异。事后从可靠方面获悉，杨将军到达旧金山的消息，既未见当地报纸刊登；华侨方面，也未得到领馆的通知。他们在杨将军到达后的次日，才从一些华文和英文报纸的报道中看到这项消息。

杨将军到了旧金山，住在奥克兰市的塔湖旅馆。居住才定，即接领馆转来国内拍发的电报两封。一封是宋子文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另一封是孙蔚如拍发

的，电文是：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退。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杨将军看到宋子文的电报，立即现出沉默。他的返国意图不能实现，当然引起了他的不快。可是看见孙蔚如的复电他的表情似乎又露出兴奋，因为“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这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对日本这一次武装进犯，似乎不再采取退缩的政策，而要准备和侵略者大干一场。同时，根据美国报纸消息，日军也在大调人马，看来大战终将不免。对南京“输送大军北上”这一点，心里得到慰藉。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特于16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还分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先生，表明决心，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紧接着又给孙蔚如、邓宝珊两先生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这时关于杨将军的行踪，全美主要报纸都先后作了报道，这一消息也在侨胞中间传播起来。此后，他除按照和领馆商定的日程考察军事和其他设施外，其他时间几乎完全被社会的交接活动占去了。华侨团体的负责人、侨胞中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的进步人士以及各报刊的新闻记者等，接连不断地前来旅馆表示敬意或谈论问题，确实使他应接不暇。

考察方面，7月19日通过领馆定妥了计划，由20日起至26日，先后参观过旧金山军营和飞机场、旧金山要塞、炮兵部队和军医院等处。事后，杨将军向我们谈了一下他参观后的感想，他说：“美国工业发达，当然军队装备和物质待遇都比我国强得多。他们的武器、服装及福利设施，可称世界第一流，但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政治。我所谓的政治指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按普通人的理解，当然他们对官兵也不断进行自己的教育，可是只是为了保护少数财阀的利益，这就永远得不到最后的胜利。政治是军队

的灵魂，因为军事到底是给政治服务的。所以，我看美国军队只是装备好，物质条件好，操典学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总括起来说，杨将军从事参观多日，他心里老觉得，华北炮火连天，每天不知死伤多少人。而自己在海外，穿着军服，同外国的军事官员迎来送去，并得不到什么有益经验，实在有些无聊。

在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中，首先应提到和新闻记者们的会见。除14日登岸时，有记者10余人访谈外，17日又来美报记者一批。口头询问后，他们还以书面提出一些问题，请杨将军答复。现追记几则如下：

问：杨将军认为中日冲突有扩大的可能吗？

答：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我国，早已制定计划。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东北、华北广大领土。这次进犯，我国人民，绝不能再事容忍。因此，战事必将扩大。

问：杨将军是否准备返国参加军事行动？

答：我已急电我国政府，请求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问：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援助？

答：苏联对日和我国利害一致，而且我国人民向来同苏联人民友好，苏联政府一向支持我国反对外来侵略。至于实际帮助，我目前尚无足够资料可作肯定答复。

问：中国抗战的实力怎样？

答：我国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党派已消除私见，为外御强敌而加紧团结；南京政府已接受全国人民“终止内战，一致对敌”的共同要求。我相信，抗日战争一起，必能持久。

接着，杨将军又问记者，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侵华抱什么态度？记者仅说美国朝野一致同情我国抗战。最后，杨将军对他们表示谢意，并请通过他们的报纸，向美国人民致意。

其次，再介绍一下《美西工人报》记者威尔逊夫妇的访问。7月19日晚，他们远道而来，首先向杨将军表示敬意，然后问到杨在旧金山参观和游览的感想。他们接着把事先准备的12个问题提出，请杨扼要予以答复。记得所问都是围绕着中国对日抗战问题，其中最关心的还是我国国内各方的团结和南京政府能否坚决抗战等问题。杨将军一一回答毕，也请他们把美国的政治情况作一介绍。威尔逊先生慨然应允，大意是，美国工人约3000万，而实际上失业的就有900万之多，其中300万人，由政府给以临时工作，聊以自给，其余就是依靠慈善机关施舍。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逐步提高，加入工会的日多，其中尤以西部海岸海员工人，组织坚强。将来中日战事扩大，可以发动他们拒运赴日的军需原料等。以后又较详尽地讲到美国资本和土地的集中情形，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将有显著下降之势。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他说一般美国人都同情中国抗日，美国政府现在虽然迁就日本，但如果由广大人民施加压力，对中国抗战也可能有所赞助。威尔逊先生结尾时，把他们近期的几份报纸送给杨将军，请他指导。遂即亲切握手后辞去。

此外，奥克兰市的几家报纸记者，旧金山的《诊察报》、《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曾先后拜访了杨将军，并拍了照片。23日，金山广播电台还约杨作了半小时的讲演。

杨将军应邀参加欢宴和讲演、座谈也有多起。各方代表人士前来访问的，更是接二连三，每日不断。据我能记忆的，有广东银行邝经理、《中西日报》社社长苏醒之夫妇、杨清白堂和金山抗日会等十次以上的宴会。邀请讲演座谈的，有国民俱乐部、斯丹佛大学中国学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华侨抗日宣传大会等八九个团体。个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崧先生。他这次赴美，和杨将军有同舟之谊，对祖国抗日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主动把自

用汽车给杨作临时长途旅行之用。他虽然是个富商，但他热爱祖国不落人后。

杨将军虽然极其忙碌，但稍有余暇，就各处游览。除了访问一些侨胞的家庭和一些中外代表人物外，还参观了加利福尼亚大学、金门长桥、旧金山迤南的农村等等。

7月22日，杨将军得宋子文复电，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又接蒋介石电，嘱杨将军继续考察。杨将军对于考察军事，虽已毫不感兴趣，现据蒋、宋来电，知目前回国已不可能。

杨将军在接到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来电后，心情变得较前沉闷。7月27日，他忽然召集我们谈话，说：“近来华北抗日战事逐渐紧张，依我判断，战局还要继续扩大。我们既在旧金山参观、游览了一个时期，对美国社会已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其他地区大体上也相差不多，没有多事参观游览的必要。我想带维格一人先去欧洲，其余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电知你们。”接着，我在下午就遵照指示买了赴华盛顿的飞机票，并以行期通知旧金山总领事馆。28日下午6时，我随杨将军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飞机仅停留1小时），到华盛顿，居留一日夜。杨将军深厌同中外官员打交道，但既到中国大使馆驻地，也不能不去看一下王正廷大使。王虽为他设宴洗尘，但王却没有出席，委托参赞应尚德接待。杨将军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名胜和国会图书馆等。30日到达纽约，在纽约住6天，同侨胞代表人物接触较多。他们有的旅居海外几十年，有的时间较短，可是关怀祖国和对杨将军的仰慕心情却无二致。除了总领事、郑副领事代表官方设宴洗尘、欢送两次外，杨清白堂、致公堂以及司徒美堂先生、李国钦先生、纽约安民工会等，均先后设宴欢迎。同时，杨将军为了交换抗日意见，也约请了一些进步人士聚

餐欢叙。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其瑗和冀朝鼎两位先生对杨将军的关照和支持。他们在纽约主办《先锋报》，在侨胞和美国人民中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很著声誉。他们知道杨将军来到了，非常热情地接待，除给详尽地介绍美国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外，对我们的考察还提出宝贵的建议。通过他们的《先锋报》刊登了欢迎的文章，还正确地介绍了杨的生平事迹，报道了他宣传抗日的活动。

在短暂的参观访问中，杨将军亲眼看见了“唐人街”的侨胞生活。还特地前往黑人住区访问过一次。记得当时有些黑人小孩子，衣不蔽体，满身污垢，他急忙屈身把一个孩子抱起，让人拍了张合影。临行时，他安慰着说：“小朋友，将来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再见吧！”

杨将军在美国居留的20天当中，美国各地的报刊对他的来到和主要活动多有报道。华侨出版的报纸，刊载的消息和文章比较多，基本上都同情他的抗日主张。当然，国民党的党报，立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他的抗日主张，但一提“双十二”事变，总不免对他有所责难。美国人的报纸，因为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喉舌”，不可能对杨将军有公正的议论。进步报刊很少，我们当时仅看到三四种。

他们一般都以显著版面刊载了杨将军到美考察的消息，但措词免不了污蔑、歪曲，为蒋介石捧场。特别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提到“西安事变”，于是就题发挥，说他和张学良将军都是“受共产党指使”，“劫持统帅”等等。

杨将军在美连续发表抗日言论，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这从社会接触和各方来信可以证明。但也有些中国人显然是不高兴的。有一天早晨，杨将军走进我的房间，笑着说：“这是刚送来的那封信，看一下。”我接过信，信封用中文写着住址和“杨虎

城将军亲启”以及发信人的地点，从外形看来并无可疑之处。乃至打开信封，抽出一张很硬的白色信纸，只见中间用钢笔画着一只手枪，枪口还冒着浓烟，并无只字片语。杨将军看见我的惊异表情，笑着说：“人家警告我哩！看起来，抗日有罪这股风，已经吹到太平洋东岸啦！”以后，我随杨将军离旧金山时，黄朝琴到场送行，我看见他怒气冲冲的神色和同杨将军握手时言而不欢的情况，当时曾向杨说：“这里的反动派，必然接受南京密令监视我们，大事故不会发生，但恐怕要在小事上使我们难堪。”杨将军听罢，一笑置之。

7月25日，经中国留学生唐锡朝联系，杨将军应邀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教授为他举行的夜宴。餐毕，大家移座一个会议室，请杨将军讲话。杨着重讲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抗日和他对抗战的看法，结尾希望美国知识界主持正义，对中国人民抗战大力支援。并对教授们苦心钻研，给学术作出贡献，表示敬佩和感谢。讲话毕，接着就有人提出问题，请杨将军作答。有一位老先生问：“中日两国因领土多次发生冲突，中国政府何以不请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却一定要诉诸武力呢？”杨将军详加解答后，又有人问：“南京政府是由法律产生，为各国所承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以在野党地位，不通过会议选举执掌国政，而竟要霸占一方，另立政府且拥有军队呢？”以后，还有几位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如“中国实力不足，对日作战有什么把握？”“中国人希望美国怎样帮助中国政府抗日？”杨将军对上述问题，分别讲出自己的看法，有的具体，有的只笼统地说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武力抗日而不企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这一点，他巧妙地反问：“如果贵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遭到侵占，不知各位的心情怎样？当年华盛顿总统武力抗英，受到贵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看不诉诸武力，只靠谈判，恐怕贵国今天

不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吧？”说到“双十二”扣蒋介石，他说：“如果说我们犯上，那么不知诸位对克林威尔如何评价？是否要把这段历史重写一下？”当然，对他的答问，也有个别人提出异议。总的说来，杨将军的议论，大大地出乎教授们的意料。

8月3日在纽约。先一日有自称纽约中国学生抗日会的两个代表拜访杨将军。看那两人的样子，不是好东西，不怀好意，我意谢绝他们为妙，杨将军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是学生抗日会，不管他们居心怎样，我去讲抗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即下楼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并约定时间、地点。

第二天，杨将军应陕西同乡留学生王子休和唐得源二人约，先去他们的寓所吃午饭。饭毕已是下午一时。我同王、唐二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就同我们一道去参加“学生抗日会”的约会。到会后，杨先讲国内的形势，各方面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接着说明这次日军进犯的严重性，分析了敌我力量，说明最后必能胜利。不料正在讲话中间，听众中有一个戴黑眼镜的大块头站起身来，说：“将军主张抗日，到处讲演，现在我们抗日会经费非常困难，请给我们捐款。”这个家伙说毕，另一个矮个子站起来，指着杨将军说：“请将军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为什么囚禁最高领袖？”接着又一个站起来说：“请问西安事变是否受共党指使？”以后还有几个人要提问题，杨将军当即严肃地斥责了他们。我看情势不对头，即走近杨的身旁，附耳低语：“咱们走吧！不必同这些小子费唇舌了。”杨将军点头同意，我就向台下宣布：昨天给你们代表说过，杨将军同外国朋友约会的时间已到，你们有问题，改日再谈吧。”我即跟着杨将军走下讲台，这时王、唐两位也走近他的身旁，我们4人一齐离开会场。我只听得会场里一片乱嚷声。我们4人即上汽车离去。

次日上午，那两个所谓代表又来到旅馆，他们不说别的，只

说抗日会的经费的确困难，一定请将军捐助一点；不然，他们就不离开旅馆。我把情况报告给杨将军，他笑着说：“学生受人利用，不必计较。你看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和蒋介石都讲妥协哩。给他们 100 美金吧，送交于总领事转给。”我遵照指示传达后，那两位代表才称谢而去。

8 月 4 日晨，接宋子文电称：“（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

下午 3 时登法轮“诺曼第”号赴英。于、郑副总领事、李国钦先生和华侨代表等 40 多人，都到码头送行。美记者十几人进入房间、询南问北，直至船开前离去。

8 月 9 日，法轮驶进英国南萨木敦港。这一天，米暂沉、周梵百两人（当时在伦敦读书）到港迎接杨将军去伦敦，住“公园巷饭店”。10 日，在暂沉、梵百陪同下，杨将军游览了市区、大英博物馆、动物园和蜡人馆，并访晤了驻英大使郭泰祺。11 日上午 10 时许，杨将军偕暂沉和我一同往巴黎，下午 5 时，到达巴黎北站。从车窗中已看见月台上聚集一大群人，其中有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商协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和国民党支部等团体的代表和驻法大使馆郭则范参赞等，估计有 100 多人热烈欢迎杨将军，并有妇女趋前献花。到巴黎后，我们到一个普通旅馆下榻，这是杨将军的用意。他对我们说：“以后我们同外国官员不多接触了，应该朴素一些，同普通人们生活水平看齐，也可以省几个钱帮助最急需的人。听说旅欧的中国学生，特别在法国，以前是勤工俭学的青年，生活苦，他们需要救济。”所以由英国起迄回国止，帮助法、德两处中国留学生，大约共达 3000 多元。

杨将军在巴黎居住的 40 天的时间里，除同驻法大使顾维钧有数次应酬接触外，他整天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不懈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来巴黎刚一住下，就是华侨团体的代表 40 多人前来访问。以后，《巴黎晚报》、《救国时报》（华侨办）和其他报刊记者也前来访问。《救国时报》于 8 月 20 日还特别为杨将军设宴，邀约中外记者多人座谈。在这次会上，记者们提的问题很多，现摘述几例如下：

问：中国政府对日抗战，是否有决心？

答：这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战就要亡国。政府看来似已有所准备；万一政府动摇，全国人民势必要坚决抗战到底。

问：中国政府的统一真相如何？

答：全国人民遭受日本长期侵略，已认清非各方团结，全面抗日，就不足以图存。现在在野各党派团体认为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问：将军对国际形势观感如何？

答：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现在被迫抗战，凡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赞助我国的正义行动。中法两国人民向来友好，相信法国能站在中国这一边。

问：将军是否准备返国抗敌？

答：最近即可成行。

在这些日子里，杨将军应邀参加了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以及旅法侨胞组织的各爱国团体的座谈会、聚餐会等。24 日，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广播讲演十分钟。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中法邦交友好，两国人民都酷

爱和平，但两国人民都受到邻国的侵犯，因而两国人民都坚决反对侵略者。（二）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三）中国抗战已成全国各方面一致的行动。这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一定要抗战到底。（四）破坏世界和平的战争，十分不得人心，最后必败。

法国侨胞具有革命传统，在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影响下，他们特别注意祖国政治动向，因而对杨将军的为人，他们并不陌生。杨将军每次去侨胞居住区时，他们一定要请他讲话，表现非常热情。有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说：“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不抵抗，白白让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几省。法国有些人瞧不起中国人，讥笑我们中国是‘大炮’。我们遇见外国人，抬不起头来。”侨胞们说：“将军回国后，一定要规劝各方，自家兄弟别再互相残害，要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希望你早一点回国抗敌。”真是万里路上遇乡亲，多少话也表达不出这颗心。杨将军受到很大感动，对我说：“不到海外，不知道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可是在国内，我们看见达官贵人耀武扬威，骑在人民头上逞英雄，哪知侨胞的辛酸呢？”

法国的进步人士，对杨将军也有很大的鼓舞。我这里只简叙法国参议员哈勒和他的会晤。9月18日上午，杨将军准备出外参加九一八6周年纪念会。哈勒参议员来看杨将军。他年近70岁，外貌虽然显出衰老，但身体还刚强。他同杨将军亲切地握手问好，然后说：“我是法国议会一个参议员，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我斗争了多年，现在、今后还要不懈地斗争。法国劳动人民关心自己国家和殖民地的革命，也关心中国的革命。今天来看将军，因为我们知道将军坚决抗日。我们法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所以同情将军的主张。只要你们抗日，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杨将

军向这位法共老战士表示谢意和敬意。哈勒给杨将军介绍了法国革命的形势，特别联系到德国纳粹的上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又说到西班牙内战的前途和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你们国内有共产党，他（蒋介石）担心的是共产党，怎么能坚决抗日呢？”杨将军说他想去西班牙看看，哈勒表示赞同说：“那里名说是内战，实际上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我可以协助你作些安排。可惜你要回国抗日，否则，你可以参加国际纵队，他们一定欢迎。”两位老战士交谈后，一再握手告别。

总的来说，对杨将军在政治上的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还要首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通过《救国时报》和其他群众组织，杨将军公开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既有领导，又有群众基础。当然，旅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以及一些外交人员中，也有反对杨将军的。这帮人以往同进步力量不断明争暗斗。但毕竟这里的进步力量雄厚，更加上国内抗战局面的日趋扩大，他们不敢公开破坏抗日宣传活动，但还是不得不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9月24日，杨将军得王礼锡先生由伦敦来函，约杨将军赴英参加抗日宣传活动。28日，杨偕我同去。29日下午4时，杨将军接见伦敦各大报记者，交谈抗日战争问题。30日，又有晚报和一些摄影记者造访。下午8时，杨将军应邀参加了伦敦西区援助中国大会，到会中外人士约1500人。伦敦华侨比在法国的少，而且多属小商小贩和劳动人民。所以在会场里，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英人习性端重，会场气氛因之显得肃穆。这次讲演人以杨将军为主，另外还有张彭春、顾小姐（顾维钧的女儿）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工党理论家拉茨克。杨将军讲话内容和在法国历次所讲的大致相同，主要强调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胜利有信心。为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惩治侵略势力，各国人民都应尽力支援中国抗战。其他几位，讲到中英友好关系，保卫和

平人人有责。吁请英国朝野一致主张公理，反对日军，援助中国等等。听众最注意杨将军的讲话，不断发出赞同的掌声，收到了良好效果。

10月1日晚，王礼锡约请了同情中国抗战的英国各界知名人士十几位，在他的寓所座谈。主要介绍杨将军同他们会面，并听取杨将军对我国抗战的意见。当天早些时候，经王介绍，杨将军特地访问了自由党领袖路易·乔治。那时他已是74岁的老人了，态度平易温和，对杨将军也很热诚，由谈话中可以了解，不少外国人对我国的政治内情，知之很少。他们常注意一些领导人物的政治主张，而对广大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却不完全理解。特别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中苏关系，往往被反动宣传所迷惑。这位老先生，亦不例外。

10月2、3两日，杨将军由左翼读物会荷兰茨先生陪同，去英格兰北部的达拉姆、桑德兰和新堡三个城市作抗日讲演。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议，每次杨将军都讲了话。这几个城市都是工业基地，所以到会的多属中低层的群众。除杨将军外，荷兰茨也作过几次简短的讲话。有的会上，还通过援助中国的决议案。与会人士还向英国外交部写信，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残暴行为。每次都有捐款，多者四五十镑，少则十几镑。通过这种会议，英国人民对中国政治真相，就有了较正确的理解；对抗日问题，也认识清楚些了。

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新堡的集会上，居然也有“中国同胞”在海外给中国人丢脸！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进入会场，已看到有数位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坐在会场的后排座上。杨将军进来，他们都没有理睬，这也不必深究。后来当杨将军讲话时，群众接连鼓掌，而他们仍都毫无表示。当杨将军讲了十分钟后，他们之中竟有一位站了起来，质问杨将军说：“华北大战已起，你既是

抗日将军，为什么不回国打仗呢？”当时，会场群众多数不懂得他说了些什么，扭回头来，“嘘！嘘！嘘！”显出十分讨厌的神色。他看到群众不满，不得不垂头坐下。苟兰茨附耳问我，我说：“别理他们，请杨将军继续讲。”对此，杨将军笑着即席插了几句话，告诉那个“中国同胞”，自家人有意见，请会后到旅馆详谈。这不是中国人互相讨论的场合。如不愿听讲，可以退席。说罢，那几个人竟然走出会场，嘴里还不断嘟哝什么。苟兰茨是外国人，他不理解。我告诉他说：“这种人，到处都有。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抗日，张、杨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也是迫于无奈的。”他点头表示同意。

由英格兰北部回到伦敦后，杨将军除访问了几位工党领导人，交换援华抗战问题外，还先后应工党左翼组织和其他团体之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本部援助中国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在百忙中，又去东伦敦“中国城”侨胞住区访问一次。

8月28日上午10时，杨将军偕我由法赴德。旅法侨胞团体代表和个人，包括顾维钧、李石曾在内，或来旅馆话别，或到车站送行。因为当时德国纳粹当政，在德国的华侨又很少，所以杨将军决定着重游览并和中国的知识界尽可能多接触。

初到德国西境，海关检验护照，他们就对我们颇多留难。到达柏林车站，中国留学生、华侨代表和大使武官等三四十人前来迎接。因为居住问题，我们同大使馆人员曾发生小的争执。他要我们住豪华的旅馆，以显示中国官员的“派头”，而杨将军却决意住普通饭店。他说：“来这里，我不预备同德国官方来往，何必要排场呢？”以后到9月1日，杨将军在普通旅馆里，觉得花钱倒不多，只是每天看见纳粹先锋队来来往往，穿褐色衫，行纳粹礼，心里很烦，干脆移住到同乡谢济生（奉教育部派，考察教育，陕南籍）原住的客寓了。

在柏林，杨将军同驻德大使程天放有过两次礼节上的接触和应酬。由连仲玉、温康兰夫妇们陪同，游览了柏林各处名胜，去过波茨坦，还往柏林东北某地参观过一项水利航运工程。孔祥熙当时在南德的一个温泉胜地休养，为了解国内抗战近况，杨将军曾偕连仲玉往晤孔一次。

柏林的华侨很少，杨将军在德 10 天的时间，主要是同一些进步留学生接触。8 月 29 日至 31 日，一连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次旅德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员座谈会。在柏林和巴黎大不相同，这里是纳粹的天下，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正在酝酿结盟，搞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谈抗日是不许可的。所以抗联召开三次会议，都是在会员的寓所秘密举行，人数不多，大家无所拘束地交谈国内外大事。通过几次座谈，对杨将军的政治认识，有所裨益，更加促使他早日回国。

9 月 7 日上午 9 时，杨将军偕连仲玉、张明鼎和我去捷克斯洛伐克都城。行至德、捷交界处，因杨将军和我都持有红皮护照，海关人员很客气，只验了一下护照，并未要求看行李。

驻捷公使梁龙，对待杨将军很好，畅谈中还有亲切之意。欢迎欢送，都亲身出马，不像王正廷、郭泰祺、程天放辈，对我们摆官僚臭架子。譬如，为杨将军到捷洗尘，几次吃饭都在公使馆。我们一行并无女性，梁公使也请自己的夫人和龚秘书夫人作陪，这在沿途还少有。杨将军对在捷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9、10 两日，承梁公使安排，杨将军带我们西去皮尔森，参观有名的斯科达兵工厂。同日下午又来到布伦诺，参观机枪制造厂。由于梁公使的关怀，东去西行，都派员照料。

9 月 10 日下午 6 时，赴维也纳，8 时许到达。11、12 日两天，由驻奥公使馆代办童实堪安排，两次登上近郊加林堡游览。又承童代办招待，看了国家大戏院的名剧，观看了舞蹈、冬季滑

冰场等。时间短促，还须返捷参观，因而未作遨游。当天下午返捷，参观坦克制造厂，并看了轻（三吨半）、重（七吨半）型坦克表演。杨将军认为这个国家的幅员虽不大，但人民浑厚朴实，工业发达，而且革命的潜势力也很雄厚，纳粹可能一时压倒了它，但终究一定要站起来的。

14日，离捷经南德纽伦堡等地赴瑞士日内瓦游览。曾和胡世泽公使等会晤交谈，还同中国图书馆胡祥麟游山、聚餐。顾维钧、梁龙当时在日内瓦开会，也访晤了他们。17日，再赴巴黎。车经里昂北站时，法国抗联多人迎候，略谈后就登车北去。

这次中欧之行，虽然在沿途一些地方游览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参观了某些工业和文物，了解了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杨将军的游兴并不怎样浓厚，因为他日夜盼望回祖国抗战。

杨将军在西班牙是10月11日。因为要准备归国，我当时奉命留在伦敦，料理有关东归事。跟着杨将军去的是樊雨农和杨将军另一个旧部金闽生。金是由国内直接去欧洲游历的，不期而在巴黎相会。他们去西班牙访问时，往返都是乘坐飞机。归后，据樊雨农说：杨先生到达新都后，受到政府军领导人和国际纵队司令官的热烈欢迎。还遇到几个侨胞，他们是从法国去的，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国际纵队，对杨将军表示特别欢迎。政府军战斗精神十分昂扬，他们对我国人民抗日非常关心，他们希望抗日和反佛朗哥的力量互相支援。杨先生还到达政府军前线，非常兴奋，曾蹲在战壕里向叛军方面打了几枪。西班牙因为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讨厌日本人。我们初到时，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瞪白眼，不理睬。后听说是中国人，还有抗日将军，便伸出大拇指，跑来握手欢迎。

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给了杨将军以深刻

的印象。从檀香山的珍珠港到旧金山的卧波长桥，各地飞机场日夜起落如梭的飞机和一望无际的烟囱。在英格兰中部和德国的莱茵河流域，真是工厂接连工厂，矿井举目在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杨将军不止一次感慨地说：“这些东西，十年前我在日本都看到一些。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今天它又成为工业前进的绊脚石。”

杨将军称赞西方国家工业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水平，这只是旅行印象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他曾亲身到几个地方的工人住区、黑人住区访问。多次深入“唐人街”、“中国城”，了解一般华侨的实际生活。

他在柏林看见纳粹党徒，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冲锋队拿起皮鞭，威逼犹太人，当时他生气极了。后来，在巴黎一次集会上，他谴责德、日、意法西斯，曾引起“外交抗议”。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记得是10月下旬，我们已在巴黎。有一天，接到驻英大使馆抄转何应钦致杨电文一件，大意说，杨在巴黎讲演中大骂法西斯，已引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抗议，嗣后务请注意云云。杨将军气愤地对我们说：“不管是谁来的电报，别理它。”

在归国途中，杨将军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悲痛生活，激起他对帝国主义的深切憎恶。革命斗志，愈加坚定。这样就促使他排除众议，忘记了个人的一切，毅然归国。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将军就决志归国，参加抗日战争，曾给蒋介石、宋子文连发电报，提出自己的要求。另外，还电请南京某些“要人”促成此事。后来得蒋、宋复电，嘱他继续考察，不要回国。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北益急，战事逐渐扩大，他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杨将军这时心情苦闷，表现得沉默寡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阅读报上登载的有关抗日军事的新闻，有时独自一人闷坐，考虑问题。忽于7月27日晚，杨将军向我说：

“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让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日下午就动身。”跟着向总领事馆和一些熟人通电话说明行期。到法国后，8月13日，接宋子文电，谓华北已发生激战。14日，方振武来晤，据说他已决定最近回国，问杨将军怎样打算。杨将军说正在计划返国。18日，接孙蔚如复电云：“全国决定抗战。余今日飞南京。”杨将军由最近国内来的电报，确悉抗日战争益趋扩大，南京政府已决定抗战。这些新的消息又促使他希望尽快归国，于是又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陕北解放区的路线，这是需要绝对秘密的。对外，只说去苏联参观，也考虑到苏联可能持什么态度，是否让我们通过。杨将军的意见是走着看吧！我即于21日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据答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见分晓。按手续，在去苏联大使馆前，我先去驻法大使馆说明意向，并得到许可。说明中国的外交官员，已知道杨将军的行止动向了。22日，接樊雨农由美国来电话，说一位姓赵的由芝加哥致电杨将军，请他赶快回国云云。赵君是谁？为什么在芝加哥发电？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即复电，请他查明。27日，樊回电说，电报是由南京发来的，详情不知等语。究竟是否赵寿山将军？迄今不知。28日，杨将军要去柏林，先一日特去向顾维钧辞行，据顾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签字，说明两国邦交已好转。中国各方面团结，一致抗日，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云云。

杨将军决计采取这一条路线回国，因之以柏林为起点，向东欧几个国家进行，待赴苏联护照办妥，就可顺道东行，免得东西反复了。我们到柏林以后，曾去苏联驻柏林领事馆打听护照签证消息，据说莫斯科还没有指示下达，两次探寻，而签证迄无消息，杨将军已表现出焦急的心情。9月7日，到达捷首都布拉

格，即请驻捷公使梁龙给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去电，说在莫斯科交涉入境签证。几天后由维也纳重返捷首都，经询签证仍无消息。杨将军当时看到护照迟迟不签，里面必有文章，看来通过这一条路归国已成问题。后来杨将军在伦敦时，10月6日果然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原电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那时顾维钧正在日内瓦开会，电报是交由王麟阁航邮转来的。

10月2日，杨将军在英期间，又接到日内瓦转来宋子文发来的电报（密码），文云：“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同时还接到一个法文电，是王炳南同志由上海所发，也请杨将军即速返国抗敌。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杨将军的神情显得很振奋，随即研商如何结束在英的活动和打听船期等问题。并电告在巴黎的米哲沅、周梵百两人，他们也复电同意。我们也仔细地研究过以下问题：（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看来是这样：杨将军于七七事变后，曾由美电蒋介石请纓返国抗敌，当时蒋复电嘱继续考察，不要回国。几个月来，杨将军在外作抗日宣传活动，蒋介石得有情报，从何应钦来的电报，看出对杨的活动有所不满。至于申请赴苏考察，这个消息驻外使馆既然知道，也必然会吹到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对杨不能放心。因此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的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后来，经过一再商谈，杨将军仍然没有决定。他说：“回到巴黎再和大家细细商量一下，然后决定行止。”回到巴黎，朋友们各抒所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

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多次交谈，他仍然坚决主张最近动身，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大家看见他态度很坚定，从此再也不谈这一问题了。接到宋子文、王炳南二人的电报和金闽生由巴黎来电催他往西班牙时，他已着我在伦敦买好船票。杨夫人、拯中和樊雨农等，也于10月5日由美到英，东归之计已作决定。同时，杨将军也考虑到大家的善意，从西班牙转回巴黎后，即着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东归，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金、樊二人于10月30日乘意轮“康德罗素”号东进，按航程11月21日可达香港。随即杨将军偕夫人、二儿拯中、连仲玉、张明鼎和我，还有杨明轩先生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同行，28日离巴黎赴马赛，29日登轮归国。

出发前，杨将军曾于10月22日给宋子文拍发一电，这次电文较长，约计200多字，着重叙述他出国近5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23日，又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各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29日由法国马赛动身以迄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直没有接获他们的来电。船在地中海上，还给宋子文拍发一电，也未得复。

11月2日午夜，船抵波赛港。3日晚8时到达苏伊士码头。经过运河，航速很慢，共需时12个半钟头。在这里，我们曾向海关打听意轮“康德罗素”号的消息，据答才走过4小时。杨将军闻讯，说意轮几乎和我们一起行走。看来金、樊二人先行，起不了预计的作用。

7日下午1时，船抵吉布提，停泊两小时，杨将军登岸游览，深感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悲苦和帝国主义贪婪可恶。8日，行经亚丁湾，从广播中得悉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协定”，杨将军就召集同行一些人谈论这事。他当时认识到，德国纳粹攫取了政权，已威胁着欧洲和平，这次德、意、日又签订“反共协定”，这就进一步造成对世界的威胁。他们借口“反共”，实际上是企图重行瓜分殖民地。因此，抗日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抗日战争将会延长。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座上有人说：“这样一来，苏联的地位就很危险，因为德、日一旦东西夹击，苏联势难两头兼顾。”杨将军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账要全盘算，不能片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少不了的。狗吃肉，必然要争。我看他们不一定先向苏联开火。”在这次航行中，杨将军虽然坐头等舱，但他总是找大家一起谈天。每天吃饭，也多和大家在一个餐厅。和他同船的中国旅客，除了个别访问之外，还请他作过一次集体讲话。所以这次航行，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精神是舒畅的。

14日，船到哥伦比亚，下船在旅馆茶点毕，买了10多份报纸打开看。据载太原失守，西安被炸，杨将军看到这些消息，推断南京对日军作战有问题。据他看，蒋介石总不肯拿出他的嫡系部队，只是叫杂牌军打先锋，这是蒋介石的“两败俱伤”之计。另外，他必然要防八路军，兵力分散，势所必然。

从这里得悉，金、樊二人所乘的意轮昨晚五时才驶离港口。

19日晨6时，船到新加坡。在船上，我们早看见码头上挤着一大群人手里打着小旗。杨将军上了岸，就有20多个华侨的代表趋前向杨将军一行表示欢迎。有十几位新闻记者团聚一起，向杨提出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杨周游各国的感想和归国后的工作计划。一会儿，华侨团体代表请杨将军聚餐。主座致词，向杨将

军致以慰问和敬意，还希望他回国之后，参加抗日战争，赶走侵略者。11时，船开，大家又齐到码头欢送，同杨将军一再握手告别。

这一晚，接王炳南由上海来电，问杨将军是否需要他来香港。复电请他届时前来。

21日上午6时，船抵西贡。船上宣布，23日上午4时开船，这样船在这里有两个整天的停留。西贡地方的华侨，同新加坡的消息很灵通。杨将军见船停留时间较长，原来就计划上岸，访问侨胞。可是船一抛锚，就见有成群的人打着小旗，前面还有音乐队，直向码头走来。人群前面，还有“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幅。杨将军刚一上岸，乐队就吹奏起来，一些学生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杨将军同领头的侨胞一一握手后，就挥手向大家致意。接着，坐上侨胞预备的小汽车，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博物馆，并访问了“中国区”。侨胞代表关怀地问了杨将军旅行见闻。对于国内抗战和他归国后的计划，谈得更多。下午8时，侨胞“缩食会”设宴招待杨将军。并请他讲话，前后约一小时。22日，西贡华侨团体联合游行欢迎杨将军，与会的有800余人。杨将军又比较系统地讲了抗日战争问题。他深入浅出，说理透辟，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

南洋各地是华侨最多的区域，多年来，由于祖国的贫弱，他们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百般欺凌，当他们从报纸上或广播中听到祖国的好消息时，就欢欣鼓舞。祖国的兴衰，是侨胞们最敏感的，他们无时不在盼望祖国富强。这次在西贡，有一位侨胞老人向杨将军诉说：“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们的政府不抵抗，把军队撤入关内。那时一个印度商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悠久、地大人多，这样好，那样好，为什么这次不打日本人？不把敌人赶走呢？杨将军，你们长年待在国内，哪能体会我们侨民的处境啊！”

杨将军听了这一席话，竟感动地流出泪花。他手拍着老人肩膀，像发誓似地说：“老伯，以后再看吧！”

24日晚，杨将军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23日赴陕。他24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王菊人、申明甫到港迎候。这时法轮正在我国南海的汹涌波涛中驶行，眼看一两天就要重返祖国怀抱。去时炎夏，回时寒冬。在暮色苍茫或晨曦微露时，我见他独自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意态严肃而坚定。

11月26日下午1时，轮船到达香港。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40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在九龙，杨将军和杨夫人等住在一处，我同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住在另一旅馆。这时，王菊人和王根僧由西安到达九龙。跟着，宋子文、王炳南也由上海前来。从此，我就同杨将军很少晤面。30日，杨将军偕王根僧乘飞机去长沙。我也因父亲病重，在他去后，搭乘飞机经汉口返陕。九龙一别，杨将军被蒋介石幽囚12年后，终遭杀害。

第四章 囚禁岁月

烽烟中的祖国，使杨虎城再也无心考察。他自动归国，主动请缨，但等待他的，却是漫漫无涯的囚禁岁月……

一、抗日心切，岂料甫归国即被软禁

王惟之口述：

杨虎城将军欧游归来，途经越南西贡时，致电上海王炳南约我（杨将军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期，我担任绥署军需处处长）同去香港会晤。我们于11月25日，乘意轮“康梯卢梭”号离开了上海。轮船在夕阳西下时，驶出了吴淞口。饭后，我们在甲板上闲眺，忽有人喊道：“哪位是 T. V. 宋？这里有封电报。”王炳南低声对我说：“宋子文也在这艘船上，大概是去香港会晤杨将军的。”我们乘坐的轮船到达香港时，已是27日中午了，靠拢码头时，杨夫人谢葆真携其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裁及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来接。下船后，王炳南被友人邀去同住，我即住九龙酒店王菊人处。略事休息后，王拟前往访杨，适杨夫人来临，她说：“杨先生（指杨虎城将军）偕同王根僧过港游山，尚未归来。”杨夫人去后，我问王菊人：“你是同王根僧

道来的么？”他说：“我是奉孙蔚如主席命，同申明甫、王金鳌等由西安来的。王根僧是代表一七七师由郃阳防地来的。”

午后，王菊人陪我同去半岛酒店，适杨将军已游山归来，他问我“八一三”后，淞沪抗战的一些情形。我当就所知，向他报告了淞沪抗战经过和国内各方面的情形，顺便提及宋子文亦同船来港的消息。他说：“宋这次来港，是我专电约来的。”不久，王炳南亦来。杨将军夫妇约我们外出就餐，在吃饭时，他对我们说道：“我现在已到香港了，看见全国热烈抗战的情况，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忆从前我在日本时，曾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侨胞和留学生的轻视和无理压迫，使我内心难受极了。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继之以七七事变，竟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些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言谈之间，处处流露出为祖国、为人民一片忠贞爱国之心。饭后，我们一同仍回半岛酒店，他把欧游感想和在欧时看见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参战，自己却漫游国外，不能为祖国、为民族效力的苦闷和焦急的心情，给我们谈了一遍。后来，我和王菊人辞出，王炳南留下长谈。

宋子文到港后，杨将军曾驱车往访。晚，宋移居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二楼。当晚，他们作了长谈，一直谈至深夜。

第二天上午，杨将军叫我，我刚走进客室，有一个细长身材的青年，也跟着进来了。杨说：“现在没啥事可办，你先回去吧！”可是他并没有走，还站着不动，经催促后才走了。杨笑着对我说：“这个人真是有些不识相，他不管你有事没事，有客没客，一进来就坐下不动，老是叫人催他才走。有几次我想说他，总觉得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也就算了。”我问：“那位青年是谁？”他说：“是张秘书，留法学生，经人介绍给我在法国临时当翻译，我回国时，他也跟着回来了。”我问：“南京有电来吗？”

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我说：“好！我一定在你走后，把他们送回西安去。”接着我问：“是哪个梁参议？”他说：“是军委会派来招呼我们的一位少将参议。”我接受杨将军的嘱托后，刚退出时，看见陈铭枢将军正叩宋子文的门，因无应声，折回访杨。我报告后，杨即迎陈到会客室里。我回去后，将以上情形告诉了王菊人，并问他是否一同回陕。他说：“你负有使命，请先走一步，我随后同申明甫等一起回去。”

是日中午，港绅何东爵士邀宴杨将军于其私邸。我和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送杨将军至轮渡码头过港赴宴时，梁参议已先等候在那里，当申明甫、王金鳌随同杨将军登上轮渡时，梁参议把申等挡住了。他说：“我带的有人，你们在此人地生疏，不必去了。”说罢用手一招，由人群中走出二三个类似包探装扮的人，一同跳上轮渡，随杨将军过港去了。申明甫等只好返回九龙酒家。王菊人和我在回去的路上，研究了这一令人怀疑的现象。当晚，即向杨将军谈及，但是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11点钟过后，我们回去，刚走下楼梯，即有人走来问道：“你们上哪儿去？”我们说：“回九龙酒店去。”大概他听我们是西北口音，带笑说道：“你们是跟杨将军的人吧！我是在这里值班、保护杨将军的。”当我们走下阶沿时，又有两个人手执折扇，口叼烟卷，摇摇摆摆走来，用同样口气发问，经回答后，他们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自抗战爆发后，香港情形较前复杂，晚上常出事故，现在夜已深了，你们没事时，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说罢，扭转身子踱着慢步，两个人唧唧啾啾地走向草坪花丛中去了。王菊人说：“前边如此，后门可能也有人站着。”我说：“如果这里有

后门的话，肯定是有人在那里站着的。”

回酒店后，王菊人对我说：“你对今天看到的一系列情况，是否感觉有些异常？我一再考虑，既然是保护杨将军，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因此，我认为情形不简单，我们作为杨将军旧属的一员，今日面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绝不能置之不理，须即向杨将军陈报。”但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去半岛酒店，确有不便，只好等候天明再说。

下午，接杨将军电话叫我去。王菊人要我再劝杨在香港多住几天，看清情况再说。去后杨对我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他们母子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我又乘机建议他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他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我说，“据王菊人、王根僧他们谈，十七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些回西北去，领导他们抗战。他们来港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来欢迎你的。”他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我说：“抗战爆发后，西北已不是大后方，而已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兴奋地站起来，又来来回走了几步，大声对我说：“去冬，我和汉卿发动事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现在抗战爆发已快半年了，我既然回来，岂能久住香港。我回来的心地是极坦白的，为了参加抗战，别无其他。”我说：“谁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只记私仇，不讲信义，有必要多加考虑。”他说：“我和陈铭枢将军会见时，也曾谈到这些问题。同时，知道原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均还侨居海外，未被起用。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蒋介石却在排除异己，敌人节节进迫，蒋介石却在处处退让，这些做法，当然要引起人们怀疑，那是不言而喻的。正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因为如此，我曾多次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南京看看，蒋介石如果真在串演着假抗战，真投降，假团结，真排挤的戏的话，那我就决定离开南昌回西安去了。”虽经我多次劝阻，但他依然坚决去南昌。最后，我才提出请王炳南来商量商量再定，杨夫人也表同意。说到这里，住在对过房间里的张秘书，忽然推门进来了，杨将军对他说：“你没事，等会儿再来！”可是他双手交叉，稳坐不动，也没吭声，大有久坐不去之意。我看不能再谈，就告辞而出。

刚回到九龙酒店，王菊人就问如何？我将谈论经过及张秘书进来打断谈话的情形告诉他。他听后默不作声，沉思很久才说道：“既然如此，只好等晚上去时再说吧！”

当晚，王菊人和我前往半岛酒店时，又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分散地站在酒店附近，瞅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楼梯口也有一个人手拿折扇，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注视着行人。我们急步走向会客室，及至进门一看，里间坐满了客人，其中不少系杨将军资助回国的留欧学生，所谓张秘书亦杂坐其中，纷纷谈论如何分组、分队取道广州、桂林、武汉和重庆等地，争取早日参加抗战，以及竭诚拥护杨将军北上抗日等问题。有人主张，把直赴延安不在中途停留的人，另编成一组。总之，会客室里充满一片议论和欢笑声。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深感无法进言。不久，梁参议也来了，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以谦恭而很有礼貌的态度走到杨将军跟前，低声向杨说了几句话，就退坐一旁，倾听大家的谈话，有时也和人交谈几句。但是从他那种过分矜持的动作中，不难看出他的虚伪性。11点钟过去了，客还没散。我们插空问杨将军，明天带些什么？我们可以帮着整理。他只说带一些简单用品和衣物，业已整理好了。我们又问是否决定带王副师长一同去？他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

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接着他又说：“这里客多，还要招呼，你们先回去休息，明晨早些来，11点钟，咱们就到飞机场。”我们回去时，在酒店附近仍然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那里注视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

30日上午，当我们亲送杨将军到达九龙机场时，前来欢送的人们热烈鼓掌，杨将军下车后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这时梁参议早已带人在机场恭候，并在四周放哨，作警戒状。

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11点40分。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正打算走出机场时，梁参议走来对杨夫人说：“机票已办妥，你们可乘下一趟飞机起飞，时间是12月2日上午11点30分。”说罢，点了点头，转身就和他带来的几个人，乘上汽车走了。

12月1日晚，去杨夫人处，帮助整理行装。谈到杨将军尚未来电时，杨夫人似乎忧心忡忡，手抚爱子，默默不语者半晌。

2日晨，去杨夫人处，见他们母子已整装待发。10时过后，同去机场，适王炳南陪同杨明轩先生亦来，今天也乘这趟飞机回西安。11时半起飞，午后3时许，抵达长沙上空，降落加油后，继续飞行，到达武汉已是夜色苍茫时刻。机上人员说，当晚在此过夜，明早8时，再飞往西安。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刚一坐下，她就先问我道：“关于杨先生的情形，

你有所闻吗？”我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她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证明王菊人和你在香港所见，同现在事实的发展是一致的。由此推测：杨先生抵达香港后，梁参议一来，就已经受到监视了。住在半岛酒店的那个张秘书也是一个大为可疑的人！”

王根僧口述：

一七七师是十七路军的一部分，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驻在陕西洛川、三原一带。是年9月3日起，先后以半个师驰往河北会战，以半个师开赴潼关迄北禹门黄河西岸构筑国防工事。迨11月间，正当士气高涨，誓死抗倭救亡之际，传来杨虎城将军回国的消息，群情欢腾，凭添无限力量！当时师长李兴中、政治部主任郭则沉和我们研究对杨将军返国如何表示全师将士欢迎之忧，嗣郭则沉同志建议由我代表全师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杨将军。

我于1937年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了。

11月26日 杨将军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船“哲利波”号于午前9时安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由

杨将军资助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

27日 午前随杨将军遍游香港各山。正午，港绅陈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点，曾摄数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纪元酒家邀宴。

28日 晚，郑宝照局长邀宴，杨将军命我代去婉致谢意。

29日 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外国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次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

宋子文由沪抵港，黄昏时我随杨将军往访。晚，宋亦迁寓半岛酒店，曾与杨将军长谈。

30日 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11时37分由九龙乘欧亚机17号起飞，午后2时50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侯1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12时20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12月1日 午后3时30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2日 午12时30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

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 1 时 55 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然无言者久之。

3 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4 日 戴笠陪同杨将军乘汽车游万寿宫，我随行。

5 日 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6 日午 戴笠陪同杨将军和我游青云谱烈士墓。

7 日 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8 日 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

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9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10日 午后1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下午5时40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至翌年2月21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6月23日我们赶到上海送别杨将军出国，仅5月余，今日之别，前途莫测，不胜悲愤！

1938年1月14日 十七路军将领认为杨将军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真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17日 由戴笠安排，杨夫人谢葆真和小孩拯中于晚9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二、要求一次抗战，加重一次惩罚

韩子栋口述：

我和杨虎城将军从1938年起，在湖南的益阳、贵州的息烽、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重庆的歌乐山，同坐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但没押在一个院子里。

我和他的亲信副官阎继明、张醒民，部下宋绮云先后同斋、同监房好多年。我和阎关在一起是在益阳，和张是在息烽的白骨洞，和宋是在息烽的猫洞。

下面所叙杨将军狱中的几件事，一是听阎、张讲的；二是听管理员讲的；三是听狱中地下党人讲的。

要求一次抗战，加重一次惩罚

在狱中说到杨将军坚决要求参加抗战的事时，阎继明说：“‘头’（编者注：指杨虎城）回国，我到香港去接。他坐的船还没到，军统已在码头布置好了特务。船一靠岸，特务就包围了下船的地方。接他的车是军统的，住的旅馆也是军统定的。‘头’这时节在香港，他们不敢逮捕，但事实上已失去了自由。到了武汉没多久，就接到蒋委员长在南昌接见他的通知。到了南昌，他们就把我和‘头’分开了。我被送到湖南益阳后，关到王家大堡秘密监狱里，‘头’的消息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人啊，人！一旦有了权，就从头发梢变到脚底根，一没有了权就熊。西安事变时，‘头’派我照料蒋秃子的生活、饮食、起居。我乍一看见他，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蒋委员长。一瞪眼吓死人的蒋委员长，一夜之间变成缩头瘪脑的怕死鬼，小瘪三。他那畏畏缩缩的熊样子活像个丧家狗，瘪嘴哆哆嗦嗦，假牙都哆嗦掉了；两颊凹陷，长脸上只剩下一个通天鼻，像耍把戏的猴子，挨了鞭子。

‘你发疟子啦？’我问他。他斜视我，摇摇头，然后蒙头睡下，在被子里瑟瑟颤抖。说心里话，那时候我觉得他怪可怜的，他哪里受过这个！他老是睡，不吃饭。上边叫我跟他说，饭是我

孝敬的。这法还真灵，我这样说了以后，他急忙起来，说：‘你的我吃，他们的我不吃。’他明知道这菜饭是我端回去，热了热又端回来的。他可真会掩耳盗铃，捏着耳朵擤鼻涕，装憨。大人物都是这样！他吃得可香啦。先前他不吃，是吓尿了，害怕的不知道饿啦。眼下睡够啦，饿啦，不说我孝敬的，他也一样吃。上边咋样吩咐就咋说呗。我按‘头’的吩咐照料他，他说我侍候得好，侍候得周到。他要是还能回南京，叫我到南京去找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他走到门口，还回头跟我说：‘依到南京去找我。’谁知道他说这话是安的什么心，这家伙历来都是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办足’。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呢’！张、杨满心要救国，举行兵谏，蒋一答应抗战，张学良忠心耿耿地亲自保送他回到南京，他反倒关起张学良来。‘头’在外国游玩得好好的，鬼迷了心眼，不看张学良的下场，要回国抗战，落了个张学良第二。抗战、爱国，爱国、抗战，谁抗战，谁爱国，谁就坐监，妈的！”

“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他关起张学良来，你阎继明要是那个时候去南京找他，说不定会官运亨通，财头兴旺。”宋绮云风趣地说。

“为什么？”阎不高兴地问。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摆着的例子，也是一面照妖镜。外面打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行辕的旗号，指挥抗战的首脑部，内里干得却是屠杀爱国志士、抗日青年的杀人场，你说是为什么？”

“又要当婊子，又要叫人给立贞节牌坊呗！”阎继明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你姓阎的去找他，他赏你姓阎的钱，封你姓阎的官，不是叫人觉得他蒋委员长并非忘恩负义的人。扣押张学良或许另有原

因，也可能有非如此不可的苦衷。巴不得你姓阎的去给他脸上抹金，给他装门面。”“老蒋叫老阎去找他，我看可以试试老蒋的心。老阎把这番话写给狱吏和戴笠，看他们怎么办？朝坏处说，无非是坐监，朝好处说，说不定还可以派到用项。”张醒民慢条斯理地讲。

“我阎继明不是孬种，早就拿定了主意，与‘头’共患难同生死。命豁出去了，管他好和坏。”

“还说这干啥，我要没这种决心，我会要求跟谢葆真来？”张醒民接着说：

“谢葆真是杨将军的夫人，她从香港回到西安，知道杨到了南昌被蒋介石扣押了，不顾一切的去南昌与杨共度铁窗岁月。副官张醒民刚结婚正在度蜜月，毅然要求与她同去。事实正如杨夫人所料，到了南昌就被关到监狱里。”

杨乍被关起来，待遇比后来好得多。杨回国是为赴前线杀敌，他虽被关起来，爱国之心，没有改变。他写信给老蒋，要求把他作为一兵一卒派到前线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马革裹尸，以偿宿愿。他每写一封信，戴笠对他的待遇就降低一次，对他的看管也更严厉。他整天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愁闷、抑郁、发脾气，要不是谢葆真，不堪设想的事难免不发生。

241

日本侵略军没能炸死他

张醒民讲：“从湖南益阳解贵州息烽的途中，日本飞机跟上来轰炸，幸亏是在漫野里，山陵起伏，容易躲藏，没炸着人，只炸着了行李车，把‘头’的东西炸光了。要是在外面，炸的那些东西对‘头’来说算不了什么，九牛一毛。但是现在他和外面隔绝了，和我们一样，得不到外面的一点接济，被炸的损失就变成

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了。如果不是那次被炸，‘头’虽没有钱，还有东西能偷偷地卖给他们，或明或暗地卖给他们，总不至如此的困难。现在可好，财物两空，只剩下没被日军炸死。没炸死他对日本侵略军来说非常遗憾。”

宋绮云夫妇被捕入狱

1941年，宋绮云在杨虎城的旧部孙蔚如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做事。该部国民党部的中统特务探知孙信任宋，二人有私交，而且宋与该部的官佐关系很广，并与孙电蒋，请准许杨虎城暂回西安为母做八十寿辰，事毕返回，电报是宋写的。戴笠用先下手为强的手段，以调宋去军官团受训为名，令其速去报到。同时又假借宋妻徐林侠的名字电宋说她患病望宋速回西安。军统原计划在途中绑架宋，因途中出了事故未遂。宋刚到家，军统特务也跟到了。

宋绮云是黄埔的，蒋介石原是黄埔军校校长。特务劝宋：“忠于校长，从内部搞垮孙蔚如的部队。”宋绮云以孙蔚如正在前线抗击敌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理由，坚不听从，遂被下狱。特务正打算利用宋的爱人徐林侠，以妻子儿女的生死祸福逼宋，恰在这时，闻知她到处打听宋的下落。宋在杨部多年，是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兼副社长，各行各业很多人知道他，影响亦大。军统怕徐林侠奔走呼号促起各界的声援，将她和怀抱中的儿子宋振中（后来狱中称他小萝卜头）诱捕。

徐林侠痴爱丈夫，更爱丈夫的事业，她不理睬特务的花言巧语、威胁利诱。特务把她关进满室皆冰的冰牢中，她坚持如故，毫不改变。最后以宋绮云忠于杨虎城为由，决定将宋归入杨案中，与杨虎城同时处理，押重庆，转息大^①。

^① 军统内部称息烽猫洞秘密监狱为息烽大学，简称息大。

在“人间地狱”中的斗争

1944年前后，狱中地下党叫宋绮云同阎继明、张醒民要求和杨虎城关到一起。要求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

隔了好久，狱中地下党通过地下渠道请杨向典狱主任周养浩也提出此要求，并同时叫阎、张、宋再次做书面请求。阎继明并以蒋介石两次要他去南京找蒋为出，要求见蒋。

“人主有逆鳞”，戴笠对于蒋介石的逆鳞，知之深故避之切。他是善于“脚踏两只船”的，对蒋介石的意旨凡是捉摸不透的，他都用左右逢源的方法应付。

阎继明占了戴笠脚踏两只船的这个便宜，和张醒民解到杨虎城那里去了。从此以后，宋绮云再也没有对此事提出任何要求。隔了四五年，军统特务突然于1949年将宋、杨关到一起去了。这里有必要说一说中共猫洞地下党为什么决定宋绮云同阎继明、张醒民提此要求？

军统的秘密监狱分三个等级。最高级的称为大学，如息烽的猫洞、重庆的白公馆等。关押在大学里的暴露了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其结局不是死就是当特务。特务们说：“他们按大老板、小老板的意思办。什么约法啊、六法大全啊，全不管。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说杀就杀，说砍就砍。”就是没有刑满释放这一说。写到这里，我就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庆造反派以为《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是四川军阀罗广文的胞弟，断定他是叛徒，要我予以印证。我问他们可曾知道，已经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关进白公馆的是不可能释放的。军统当时迫于罗广文在四川的重要性，同意罗广斌写了“出狱后不再作政治活动”的声明后办理释放手续。罗广斌是共产党员，敌人有证据，但他宁愿死在狱中，也拒绝写这几个字。这是对党忠心耿耿的表现。以罗

织诬陷为本能的造反派，竟也编织不出从白公馆释放的一个共产党员来。军统特务对于杀害共产党是绝对的，一个也不留。

军统不怀疑宋绮云是共产党员。狱中党支部认为他关到杨虎城那里去，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可能性小。杨一旦被释放，他也可以恢复自由。

我们当时认为日本侵略者没能炸死杨将军，蒋介石还不至于杀害他。事实证明，我们错了，太以君子之心度蒋委员长之腹了。

三、杨夫人主动陪囚，监中受尽非人折磨

杨拯英口述：

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8年之久。对于她的死，尽人皆知。但她惨遭杀害的真相，人们却几乎毫无所知。

1983年，我怀着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之情，随陕西省政协文史办的同志，赴贵州省息烽县、四川省重庆市做了认真的调查。这才使我对母亲的壮烈牺牲有了清楚的了解。

旅欧归来，身陷囹圄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强迫杨虎城将军辞职出国考察。谢葆真携爱子杨拯中随将军出国了。她性格刚毅、有胆有识、精明强干，是杨将军的得力助手。

在法国，她和杨将军一起读书，研究中国现政的弊端，宣传中国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争取国际各方人士的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国外进步人士、中国留学生和爱国侨胞的积极响应。他们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的纪念九一八6周年大会；组织旅欧留学生回国抗日；参加全欧抗联代表联谊会；杨虎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

城将军在法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谢葆真在华侨妇女团体集会上演讲，到女子学校里去座谈……

245

然而，与此同时，迫害狂的阴影却像幽灵般地向他们逼近。

1937年11月27日，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将军一行，刚刚抵达香港，便被蒋介石的特务们监视起来了。

翌日，蒋介石来电邀杨虎城到南昌相会，并指令特务头子戴笠“迎接”。

11月30日上午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乘车送杨将军到九龙机场。机场周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11时40分，飞机渐渐离开了跑道。谢葆真的眼睛里溢出了

泪水。拯中向杨将军挥动着小手：“祝爸爸一路平安！”

谢葆真痴痴地看着远去的亲人，直至云团遮住了飞机，挡住了视线。

归行前，将军嘱咐谢葆真说：“你回西安后，要千方百计地支持青年们的抗日救国行动。”并对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王维之说：“我走之后，你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你对他们母子多加关照，不要让拯中乱跑。我到南昌就给你们拍电报。”

谢葆真遵嘱回到了西安。她每天在忧虑、焦躁中等待着亲人的电报。一天、二天、三天……依然杳无音信。她走出了家门，四处去打听。

消息传来了：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骗到南昌囚禁了！

壮志未酬，却身陷囹圄。此时此刻，谢葆真万分愤慨，痛恨之极！

谢葆真决定去救援杨将军。她要亲自去问扣押将军的戴笠：“抗日有什么罪？”

女友李馥清竭力劝阻，因为此去凶多吉少。谢葆真顾不得个人安危了。因为她知道，此行不仅仅是为了救援杨将军，而且重要的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她愿与杨将军同甘苦，共患难。

临行前，她把一部分钱和物，捐献给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她安排母亲带着4个女儿去四川投亲避难。为了使被囚禁的杨将军得到宽慰。她带着爱子杨拯中上了飞机。

飞机抵达武汉。但谢葆真未找到杨虎城将军的下落。

戴笠假惺惺地安排谢葆真和杨拯中去了南昌，但杨将军并没有在那里。受骗的母子和副官阎继明、张醒民都被监禁了。半年后，他们才被送到湖南益阳桃源监狱，与杨虎城将军囚在一起。

从此，杨将军和夫人便开始了漫长而难耐的监狱生活。

狱内斗争

1938年的冬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部地区。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杨虎城夫妇和爱子拯中被押解到贵州息烽秘密监狱的玄天洞。

息烽秘密监狱是中美合作所的前身。整个山沟都是中美特务合作的机构。玄天洞位于息烽县南山山麓的中段，洞高15米，洞内面积1300多平方米，是具有300年历史的名胜古刹。这里群峰环抱，地势险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而上。幽深险峻、与世隔绝，恰好成为特务们秘密监禁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的牢房。

牢房周围戒备森严。内、中、外三层警卫线，便衣特务星罗棋布。牢房内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杨虎城夫妇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谢葆真在微弱的煤油灯下，读着经过特务审查的报纸，向将军学习写毛笔字，教拯中读书认字、练习画画……正值学龄的拯中没有进学校读书的自由，谢葆真只好给年幼的孩子补课。

正在发育时期的拯中，身体十分虚弱，瘦小，而且头发花白了。夫妇看着这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心如刀割。拯中，这个不满10岁的孩子，宛如父母般的坚强。监狱生活使他懂得了同龄儿童难以理解的道理。为了耐过艰苦的日子，他坚持用冷水洗脸、洗澡，锻炼身体，磨炼意志。

军统特务早已获悉谢葆真是共产党员，因而对她倍加严格监视和残酷折磨。

谢葆真担心年迈的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女儿，生活没有着落。她写了一封接一封的家信，交特务送邮局。但这些信一封也没有

邮走，都被特务点燃烧成了灰烬。她没有和外界联系的自由，岂能让她对外写信？

谢葆真的身心都受到了特务们的严重摧残。

在囚禁中，谢葆真怀孕了。由于生活的残酷，她生下的女孩仅仅活了8天。

特务们还常常从精神上折磨她。机敏的谢葆真看出敌人的阴险用心，她时时提防，并向特务们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她大骂特务是汉奸、卖国贼、坏蛋；当她知道特务扣压了她写给母亲的家信时，她用丝线缠住手指，用剪刀刺破，在白绸子上写了血书，向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抗议！

有一天，特务头子李家杰走进了牢房。正在吃饭的谢葆真立即站起来，厉声问道：“抗日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囚禁我们？”李家杰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谢葆真怒不可遏，把手中的饭碗使劲向李家杰砸过去。李家杰看势不妙，拔腿便逃之夭夭了。

又有一天，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带着他的小老婆来到了玄天洞。他们站在牢房外，假惺惺地说什么“来看望”杨将军和夫人。谢葆真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忿忿地向杨森喊道：“坏蛋来了！”并把牢房内的砖头、凳子朝他们扔去，迫使他们扫兴而归。

谢葆真的英勇反抗精神，使得特务们恼羞成怒，对她更加残酷地进行迫害。

1941年春天，谢葆真又生了个女儿拯贵。她瘦弱的身子，没有奶水哺育拯贵。在杨将军的坚决要求下，特务头子才应允由他们自己出钱雇一位奶母。

这位奶母叫吴晴珍，是一位出身贫寒的善良农妇。她在同谢葆真的共同生活中，十分敬佩杨夫人的品德，她对杨将军一家寄

予了无限的同情。她以自己的乳汁喂养着拯贵。杨将军一家与吴妈相处得亲密无间。

然而更令谢葆真痛苦的事情临头了。特务编造了种种借口，迫使将军夫妇分居。特务们以让杨将军去温泉疗养的谎言，将杨虎城和拯中搬到新洞的房子里去囚禁，而谢葆真、拯贵和奶母吴晴珍仍住在旧洞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患难夫妇分开了。后来，杨虎城将军坚决要求与病弱的妻子住在一起。特务们才不得不允许谢葆真又搬进将军的牢房。

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使谢葆真的病情日趋加重了。

1943年的秋天，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谢葆真抱着女儿拯贵跑出牢房，站在院中淋着。她说特务要谋害他们母女，她要站着死，不能让特务害死。她执意在大雨中淋了整整一夜。吴晴珍劝阻无效，只好把拯贵从她怀里夺过来。

第二天，特务们又把谢葆真的铺盖从将军的囚室搬出去了。美其名曰：照顾杨将军休息。

从此，分室囚禁的患难夫妻，只能靠吴晴珍传递消息了。

无论囚在什么地方，谢葆真对将军的爱是忠贞不渝的。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宁愿把特务们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希望杨将军和他们的儿子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

在那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谢葆真始终是爱憎分明的。她牢记着党和人民对杨将军也是对她的希望，时刻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为己任。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充满深情的爱；对蒋介石及其驱使的特务们，怀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1945年8月的一天，息烽群众庆祝胜利的锣鼓声，传到了死一样的沉寂的监狱。

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的伟大胜利！谢葆真冲到窗前，跳着，喊着，激动的喜泪唰唰淌下……

壮烈牺牲

抗日的胜利，给狱中受难的人们带来了获得自由的希望。杨将军和夫人向往着自由，憧憬着参加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展望着色彩斑斓的前景。

然而，阴险毒辣的蒋介石，对爱国将领岂肯容生！1946年4月10日，杨虎城夫妇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夫妻仍分室囚禁。这里的戒备更为森严。

谢葆真失去了一切自由。她抗议当局对政治犯的非人的待遇，她绝食了。绝食的第四天，她向吴晴珍讨要火柴粉，想服毒自杀。谁知好心的吴晴珍不忍心看着夫人死去，却找来一包葡萄糖让她喝了。

谢葆真知道自己受骗了，继续绝食。

特务们用夹子夹开她的嘴，硬给她灌葡萄糖水。她抵抗着，从嘴里流出鲜红的血。

谢葆真被拖进了陪都医院。这是中美合作所的内部医院。这里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迫害政治犯的一种方式。

谢葆真继续绝食。这是她当时惟一能向敌人斗争的方式。

1947年2月8日（农历腊月三十），几个从成都赶来的医生，突然闯进谢葆真的病室。

他们以治病为名，先把病床抬到屋子中间，然后蛮横地把谢葆真捆绑在床上，床旁铁架上挂着一瓶“药水”，连着药水瓶皮管的针刺进了谢葆真的小腿，随着“药液”的缓缓输入，她痛苦地挣扎着、呻吟着、呼喊，渐渐地，她的眼球鼓出来了，脸色变得青紫了。当“医生”们收净物品，走出房门时，谢葆真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位年仅34岁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杀害了。

杨虎城将军和儿子拯中闻讯赶来。父子的悲愤自不必说。

老泪纵横的杨虎城将军亲自为夫人火化遗体，收了骨灰，装进木盒，随身携带。

1949年9月6日，杨将军和拯中、拯贵及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人，被特务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1949年12月，在戴公祠挖掘烈士遗体时，发现杨将军的遗体和谢葆真的骨灰盒在一起。

全国解放后，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杨虎城、谢葆真及随同遇难的烈士的灵柩，运回了西安，安葬于西安市郊。

四、狱中12年，把栏杆拍断，壮志难酬

沈醉口述：

杨回国抗日，被蒋用计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诺言；并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入骨髓，将张公开扣押，逼杨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真和儿子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了一下，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卖国投降政策。杨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以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20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

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杨抵香港后，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迎接。当时蒋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见，由戴陪杨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以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奈何，只好忍住再说。熊式辉的这座别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先返西安，蒋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约在1938年春间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当时是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的附近民房内。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20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杨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当时杨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他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到了贵州息烽县后，他又在军统设在阳郎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用作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

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讯、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那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杨在息烽玄天洞六七年的囚居生活

1939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以后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的玄天洞，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庙，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人，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身体条件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而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400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1940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

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那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每到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1944年前是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

历时看到的東西，絕口不敢談西安事變時的情況。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個什麼李虎臣守西安的舊事，馬上就不愿再談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記憶和听別人念東西時那種專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談話，不但能很清楚地記得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看到過什麼東西；而且在別人談話中，什麼地方有問題或不符合事實，也能在听完以後，一點一點地給指出來。

約在1941年間，楊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不少安慰，但這種暫時的安慰，很快就變成憂傷。因為軍統認為他夫人謝葆真是共產黨員，不但對她的言行特別注意，並且經常有意刺激她。幾年中由於種種不如意事，使得她漸漸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務，甚至戴笠去時，她也憤怒地加以斥責。這更引起特務們的不滿和仇視，更想方設法去折磨她，在她產後也很少給以應有的照顧。有一次，她在吃飯，正感到飯菜粗劣得難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務隊長李家杰去看他們，她便提出質問。李用言語頂沖她，她氣憤極了，便將手中飯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對，拔腳便跑，回去後便說她有了很嚴重的精神病，要把她同楊隔離，以免妨碍楊的生活。軍統批准了李的建議，硬叫她同楊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廟內一個人去居住。經楊再三請求，才答應讓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內，楊則搬進濕暗的玄天洞去。就這樣把他們夫婦拆開，楊對此很為悲憤，但在那種情況下，又有什么辦法。楊夫人被特務們這樣折磨，精神真的越來越失常，整天叫罵，特務們都不敢見她，終日把她關在房內不讓她出來。楊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勸慰，只有暗中揮淚，難過異常。

1941年冬或1942年春，戴笠去看楊，楊在忍无可忍的情況下，向戴提出請求撤換李家杰，因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應下來，到重慶後便改派龔國彥去接替李任隊長，另外派原來在特務隊任醫官的張靜甫兼任副隊長。同時認為李家杰經常反映

杨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当时除了在医药费上揩点油外，什么病他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1944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的工作。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军统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别人充当，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

一声手枪响了。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封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自动释放他。他天天盼望，一直望到1946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才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继续囚禁。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8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1947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山谷。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杨患胆石病很重，到1948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

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问他聊天。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一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李玉方(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财产管理处主办会计)口述：

1946年，杨虎城将军由贵州息烽县玄天洞被转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戴笠已死，我搬进戴的杨家山公馆（戴改名为养佳山公馆）办公。我的职务是国防部保密局重庆财产管理处主办会计。杨先生住在我的住房后的半山腰，相距约百米的一幢平房内。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的伪驻德大使张治平（安徽人）、上海英文《大美报》编辑马佩衡（上海人）都住过。杨先生每天都在山上散步，山下为警戒区，是不准下来的。我因工作忙，没机会上山，所以没有机会接触。

就在这年八九月间，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前来看望杨先生，由财产组高砚宸（河北丰润县人，高树勋之侄）、张秉午（河北人，刺史量才时开车的司机）、特务队长龚国彦（浙江人）和我接待。那天，朱下车后，先到山上去看杨先生。我因和总务人员一道准备接待朱吃饭，没有同去，朱、杨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大约两个钟头左右，朱就下山，来到杨家山会议室吃饭。饭后，

龚国彦向朱汇报杨先生情况，我也在场。龚说：杨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表示愤慨。而且他本人近半年来和杨先生关系紧张，至于上级（指毛人凤、蒋介石）交他诱使杨先生吸食大烟之事，完全失败。杨先生不但不吸大烟，就连香烟都不吸。我听了以后才明白，龚国彦除了看押杨先生的任务之外，还有个“孝敬”杨先生吸毒的任务。真是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

1949年3月份，重庆财产处结束。所谓财产处就是管理着原中美所结束前清理出来的一批物资，如被服、枪支、弹药、通讯器材、汽车零件以及大中小型美式军用汽车等。这些物质除二库被服由当时保密局西南特务区长徐远举主持招标拍卖外，其余都先后运往内战各个战场去了，所剩无几，交副区长局养浩处理了。我也根据处的指示，调往贵阳特务队任该队主办会计。

我于4月份到达贵阳，才知道这里是扣押杨先生的地方，地点在离贵阳市二公里左右的风景区黔灵山。这里有蒋介石在贵阳的公馆，所谓“总统官邸”。办公人员就住在公馆内，队长张鹄（湖南道县人）是白公馆的老所长，其人阴险毒辣，现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韩子栋先生曾深受其害。副队长为张静甫（山西太谷人，沈醉《军统内幕》一书中错写为河北人）。杨先生等7人住在黔灵山下麒麟洞，离队部约半公里处。麒麟洞有庙宇六七栋，修建精巧，为贵州名胜之地。杨先生住前面二栋内，后面几栋住了老尼姑一人，还有17岁的尼姑10多人。这里有30多名队员日夜轮流看守，宪兵一个排担任外围警戒，驻贵阳市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系老牌军统特务）也负保安责任。

这里除了寺内尼姑可以出入外，就连外围的宪兵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记得有一次，八十九军参谋长想到麒麟洞来玩，外围宪兵看到他带着少将领章没敢阻止，但他快到警戒区时，却被一个

姓汤的队员走上前来，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我们知道后，忙赶去看，那人已经爬起，声称他是八十九军参谋长。姓汤的还说，我知道你是少将，对你还是客气的，下次再来就枪毙你，说着还要打。结果还是我们把姓汤的叫回，那个参谋长才狼狈而去。从这件小事看来，这些特务队员们心中只有蒋介石、毛人凤，其他人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我到队以后，杨先生知道我是甘肃人，非常亲热，因为他在被囚禁的10多年来，根本没有见过一个西北人。杨先生迫不及待地问我，西安鼓楼、兰州金千观遭日机轰炸没有，还问了陕甘二省地方的情况。他知道我是甘肃定西县人后，马上又问：李振西（国民党师长）你认得吗？我说，他们镇离我们那里还有30华里，只知道他有个妹子名叫李莲秀，至于李振西本人，我没见过。杨先生笑了笑说，原来如此。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初次见面，在押的7人都围着我问长问短，多半是陕甘风土人情一类的话题。我非常敬佩杨先生记忆超群，连国民党一个师长是哪省哪县人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时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杨先生每天早睡早起，东方发白就起床散步，如果哪天早上吃的是羊肉烩馍，一定叫我去吃。吃完早饭，便由秘书宋绮云先生读报给大家听。杨先生听得很认真，闭目静听，如果前几天报上某个战场上战事很激烈，今天报上不提的话，他就说，那个地方已经在战事激烈的那天丢了，验之事实皆准。我记忆中的杨先生，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分析任何事情相当准确，非常乐观，有说有笑。杨先生还曾对我说：周养浩在贵阳与人合伙修建了一座楼房，当时因钱不足，把我的2000元美金（或马克——笔者注）拿去了。这座楼房，据说是租给贵阳市汽车工会了。

杨拯中（杨虎城之子）、宋绮云先生二人终日紧锁双眉，在我们相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很少见到笑容。宋夫人徐林侠女士成天

缝缝补补，裁裁洗洗，照顾着两个孩子（杨幼女拯贵、宋子振中），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拯贵长两个大眼睛，活泼可爱。副官阎继明（河北人），身体魁梧健壮；张新民（陕西人），中等个子，由于不习惯南方生活，加之长时期得不到自由，身体非常单薄。他们两人每天早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对杨先生备加尊敬，总是称杨为主任（因杨1936年前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们对别人说起话来，只要一提到杨先生，便主任长、主任短的，好像和1936年在职时一个样，视与杨先生同甘苦、共患难为理所当然，甚至连自己是个阶下囚也不在乎。

1949年9月5日左右，周养浩从重庆带领一班人马，分乘大小吉普车各一辆、六轮卡车一辆，来到贵阳杨先生住地，伪称蒋介石到了重庆，要召见，很可能获释。周养浩走后，杨先生说，释放希望很渺小，很可能又要转移，这次可能是去台湾，明天周来我提出你和我们一同去重庆转台。我答应了。第二天，周来了，杨先生提出后，周说，只有张鹄一人陪你前去，其他人员由张静甫和他两人率领，到昆明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取安置和路上的一切开支费用，都得他（指我）去报账。因此我没有去成。行前，杨先生把收拾好的一个白铁箱子交给我，并说，里边有拯中和拯贵的书籍和一个褥子，叫我带上，由昆转台。这天早饭后，周养浩和张鹄以及杨先生一行7人，和由重庆来的几个警卫，分乘大中小三辆汽车去了。第二天，我即和副队长张静甫带领全队30多人，分乘两辆卡车，由贵阳前往昆明。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说，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有张鹄、张静甫、陈宣琪（少校书记）等20多人，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只有张鹄一人。

我们到昆明后，即往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报到，处长沈醉当即任命张静甫为该处总务科副科长，我为处的主管会计，去台之事已作罢论。我家住在昆明市警察局电话队长李允全（昆明市

人)家二楼。云南起义后,我将杨先生所交的箱子丢在李家中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廖承志先生(在中美所被囚期间认识的)。廖将信转交杨拯民先生(杨先生之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要他到昆明查找遗物下落。一年后,杨复信给我说,没有找到。实属遗憾。

五、一家五口被杀,蒋介石终报西安半月之仇

沈醉口述: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本钱输得精光,李宗仁早就等待着这个机会,便趁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被解放军歼灭后,立刻把自己保存下来的桂系部队向南京移动,以武力抢夺总统职位,演出了一幕新逼宫的好戏。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骗一下人民,苟延残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龚国彦因事前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也了解国内形势,知道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后,他大笑一声:“总算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但是李宗仁虽然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而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凤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



杨虎城被囚处之一：重庆
磁器口杨家山



谢葆真被囚处，远处房屋
即杨虎城被囚处



杨虎城遇害处



杨虎城遇害后，遗体被秘
密埋葬在这里

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被囚在重庆，外间不少人知道。杨森不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怕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凤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龚只好请周养浩去劝驾，周再三说明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折磨



宋绮云的孩子——“小萝卜头”。

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内调出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批准。特务队长龚国彦调走后，改派了比龚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鹤接充。宋绮云是

杨多年秘书，随杨出国，回来后也被蒋介石连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杨隔离。宋妻在狱中也生了一个女孩，比杨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杨的请求，宋夫妇和孩子随杨同去贵州。这位忠心耿耿的宋秘书，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杨的态度。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房内。这里是贵阳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称之为麒麟洞公馆。杨在这里又住了7个多月。他每天很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节节胜利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的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军统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了所有的帮会流氓组织，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说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他还以为他那副杀人成性的嘴脸，可能还有些人认不出来呢。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对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4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

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 400 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毛人凤奉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行前并召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并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当时陆景清还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第二天杨、熊两人还把准备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并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这所“戴公祠”原来也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避空袭时用的，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



一同被害的杨拯中幼年时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杨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

杨屡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周养浩向他道喜，说这次很有希望。杨却心中有数，因为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他这次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

时间。毛人凤便下令先一天（约在1949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当杨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作好一切准备。到下午4点才由松坎出发，到重庆天已黑下来。毛人凤已派杨进兴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周养浩便回到中美所杨家山家中等消息。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300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女孩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300多级石阶。杨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引向左右两边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卧室，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痛地惊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当他叫出第一声时，杨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还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飞奔。

267

他们手握着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夫妇房内时，宋夫妇一看这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求情请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女孩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吓得抖个不停。当宋夫妇被逼得退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

面用刀刺杀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了一声“不准哭！”孩子们立刻把哭出的声音又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当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而走向孩子时，这两个天真的小女孩，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以为可免一死。灭绝人性的特务，哪管这些，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着她。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她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音，她睁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小朋友被残杀。凶手们有意识地在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他们反而感到是一次莫大胜利而互相祝贺着！杀完以后，他们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持的凶手周养浩等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一些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而瓜分了。

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对特务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能不痛恨万分！当时在场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 20 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一个人向我这个杀人的老前辈和他们的教师爷，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以求得我对他们的信任和赏识呢！

事后毛人凤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这个全国人民的公敌，世界上少有的暴君，在他被人民赶走以前，他还念念不忘报西安半月之仇，而满足了他 10 多年来杀杨的宿愿之后，才带着满腔悲喜交集的心情离开了重庆。他高兴的是宿仇已报，悲的是从此一去永不能再回来了！

深情缅怀

我的父亲杨虎城

杨拯民口述：

父亲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苦难深重的 19 世纪末叶。他由于家庭贫寒，又心怀杀父之仇，从幼小时期就滋生了劫富济贫、抑强扶弱、发奋图强、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他从刀枪血火的经历中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才有出路。他为这一理想奋斗一生直至血溅巴山。他的牺牲被毛泽东主席评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千古功臣”。

他从 17 岁参加革命活动到 57 岁牺牲，这 40 年政治生涯中，有以下几点值得追思：

首先，在政治思想上。他自始至终追随进步，与时俱进，并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从辛亥革命起，即坚持反帝反封建。他就是在反对军阀、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靖国军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当时在靖国军的将领中，名出其右者颇不乏人，但在强敌压境，在敌人打击与招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下，竟纷纷放弃靖国军旗帜，接受了北洋军阀的收编。只有他独扛靖国军大旗，在武功（后迁凤翔）重建靖国军司令部。后终因敌我力量

269

过分悬殊而失败，但他扔扛着靖国军旗帜，率部千里进军陕北三边，暂依地方势力井岳秀庇护，保存了西北一点革命种子。在陕北时，他派人密赴上海、广州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接受了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并笃信不移。中原大战后，他到西北搞“大西北主义”，主张陕甘一体、回汉一家、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其实质就是贯彻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建立革命的西北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并几次要求亲赴前线抗日，均遭蒋介石拒绝。直到1936年12月12日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得以逼蒋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使中国的前途命运才有了一个转机。

正如叶剑英诗中所写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在他的政治思想上还应该提到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既是他政治生涯中可贵的一面，也是他能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陕北时，他就与中共早期党员、陕西党组织的创立者魏野畴结为密友。从那以后，陆续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他都委以重任，引为股肱。从与魏野畴结识就开始了他与中共长期合作的历史。例如，他先后任命魏野畴为军的政治处长，曹力如为师的政治处长，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武勉之、张汉民为旅长，王泰吉、阎揆要为团长等等。其他像习仲勋、潘自立、刘贯一、王炳南、汪锋、孙作宾、吕剑人、常黎夫、贾拓夫、吴岱峰、方仲如、童陆生、蔡子伟、武志平等，也都或先或后，或长或短地在他的部队中工作过。这种传统在他被囚禁以后，仍在原部队三十八军中保持着，直到该部起义。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史上，某个地方实力集团出于当时的利害关系，与共产党保持某种谅解的合作关系的，并不乏人。但合作时间之久、关系之密切，他却是独特的，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在政治主张上的一致或相近所致。

其次，在军事思想上，他是个军人，军事活动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在军事思想上，他有他的一套东西。他在战斗中常常能以少胜多，转败为胜，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时期，他的队伍只不过是一支人数很少的民团，讨袁胜利后才编成一个营；参加靖国军后，发展到一个队（比团略大）；再往后参加国民军，发展为一个师；率部参加北伐，发展到一个军；以后又参加中原大战，打回陕西，发展为十七路军。

大约 20 年间，他的部队打过一些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很有名的胜仗。例如 1926 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 10 万之众（实有七八万）围攻西安，而西安城内只有 1 万多人，但他能坚守 8 个月，最后取胜；出关策应北伐时，在河南商丘以东马牧集一带，以一个军的兵力抗击张宗昌直鲁联军 6 个军的进攻；在山东打惯匪顾震、刘桂堂，在河南打唐生智，中原大战攻占洛阳，都打得很出色。他在用兵上有其一套做法：譬如军事行动与政治措施的配合，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军队本身的训练与建设，作战时机的选择、方式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他没有留下什么军事著作，但他的军事实践，足以表明他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智勇兼备的将军。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当时在国外，对抗日的前途就有个分析、判断。他认为中国抗战是正义的、人民的、持久战，“非民主不能持久，要使抗战能坚持到底，非巩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

三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他幼年时因家境贫苦，只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成人后深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回陕主政后，为了振兴地方教育，他不仅把教育经费独立、专款专用，还把棉花捐、卷烟特费全数用于教育事业，压缩军费开支供教育使用，并为学校配备了一些有进步思想

的知识青年任教师。此外，他还鼓励私人办学。蒲城县翼和亭先生在家乡兴办小学，因资金不够，于1931年春节到西安找我父亲。我父亲高兴地说：“我上任三个月，咱县上来找我的人不少，但都是想当官发财的，惟你找我办学，我很欢迎。”批给翼一笔钱，翼回去后办起了孙镇小学。在他卸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后还自己出资兴办了蒲城尧山中学。当时他让我去这个学校读书，我说这学校刚办起来，教学情况可能不会理想，我现在西安二中挺好的。他说：我办的学校，我的儿子都不去还能让别人去上吗？所以我就在1936年夏季转学到了尧山中学。

在尧山中学，马克思主义可以公开讲，《资本论》可以自由阅读，与国民党推行的奴化教育大不相同。学校的教职员中除进步人士外，还有共产党员方仲如、何寓础、朱茂青、冯一航、袁若愚、赵曼青、袁鹤生等。并设有军事课。建国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希钦就是当时的军事教官。在这个学校里先后培养出许多优秀分子和共产党员，校内始终存在着共产党组织。

在兴办教育的同时，他还资助优秀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深造。派往英、德、法、日等国的前后有数十人，较知名的有亢心裁、江隆基、王炳南、蒲子政、袁若愚、潘自力、周梵伯、郭则沉、原政庭、李子健等。早在靖国军时期，1921年他还曾资助过屈武、连瑞琦去德国留学。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曾说过，当国民党的官，难免要刮地皮，我把刮地皮的钱用于供给穷学生上学，绝不会错。

父亲在一生中结交了很多知识分子朋友。早期的有蒙浚生、惠又光，稍后的有魏野畴、杜斌丞、杨明轩、崔孟博、李百龄，再后有南汉宸、韩兆鹗、李仪祉、王菊人、申伯纯、宋绮云、米暂沉等。他对知识分子态度真诚，或尊为师，或引为友，有的为忘年交，有事与他们商量，能博采众议，择善而行。

以上这些说明，他虽是一介武人，但却如此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这也是他能够不断接受新思想、随着时代步伐前进的因素之一。

四是重视建设乡里。在他回陕主政前，陕西是兵连祸接，连年干旱，灾情十分严重。1930年11月，何应钦在南京说到视察陕西灾情时，认为“陕西人民之苦甲于全国”。武功县原有15万人，一年之中饿死8万。1931年1月，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报告视察陕西灾情时说：“数年间，陕西全省饿死人口已达300余万，灾情相当严重。”昔日素称富饶繁荣的八百里秦川，凋破如此，作为新上任的主席怎能不忧心如焚。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农民常遭旱灾之苦。他遂决定大规模兴修水利，以工代赈，既可救灾荒，又可以根本上改善农耕条件。从南京请来了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办其事。先后修成了泾惠渠、洛惠渠，可灌溉农田100多万亩。原本再继续修几条灌溉渠道，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为此他常引以为憾。他为兴修水利花了相当精力，多方筹集资金，经常深入工地，还带我去过两次，看洛惠渠五号洞经过大荔与蒲城之间流沙层处理情况。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陕西关中，古称“四塞之国”，意为四面都有高山与外界隔绝。从西安南去汉中、西往兰州当时都不通汽车。他主陕期间，一方面积极支持陇海铁路向西延伸，一方面紧抓公路建设，修筑了西安至兰州、宝鸡至汉中的公路。修筑西兰公路时，调动部队参加义务施工，加快了工程进度减少了费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修筑咸同铁路（从咸阳到铜川——当时叫同官）。同官出煤，运不出来，要修铁路，可省里财力有限，他找宋子文要钱。宋派来个叫刘麻子的经济特派员，此人不实事求是，被“送”走了。改由当时杨部参议郭增恺担任。当时为筹措资金，把上海所谓的“南四行”即金城银行、浙江兴

业银行、盐业银行、四明银行都动员来投资。咸同铁路修成后，与陇海铁路接轨，解决了煤炭外运问题，同官亦随之日趋繁荣。

再就是他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方法，总是那么豁达、辩证。1929年他在山东进剿土匪顾震，当时顾震占据莒县。当我父亲的部队逼进莒县时，顾匪慑于他部队的声威，弃城而逃。他带领部下上莒县城察看，有的军官看到莒县“城坚壕深”就说：顾震如果坚守，我们进攻就要费时费劲了。可他却说：这是你的想法，顾震不会这么想，他是草寇，要考虑如死守在这里，倘被我们包围，跑不了怎么办？这么一说，大家深受启迪。

我的祖母，信奉佛教，天天烧香磕头，我认为她在搞迷信。要父亲劝阻。父亲反说我是小孩子不懂事。说迷信固然不对，可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运动，每天早、午、晚三跪九叩首，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对她身体有好处。

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后，西安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外有中央大军压境；内有主和、主战两派意见分歧；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在救张问题上矛盾激化。风云变幻，人心惶惶。在那个形势下，我父亲给县长们写一封信，说明蒋答应了六条，内战得以停止，这是形势的主导方面。这既可以给人们增添信心，也正是他在极端混乱危难中所看到的成绩与光明的一面。

1937年我父亲被迫出国，我从北平到上海送行。6月28日晚，即出国前夕（他白天忙于应酬，无暇相谈）要我和他同宿一个房间。

他告诉我这次出国是被迫的，不是自愿，实在也无法子，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很客气，给了面子，给安了个军事考察员的头衔，路费给了不少，但这是调虎离山计，而他由于团体内部的原因，也不能不暂时离开。加上4月份我的小小弟弟拯仁夭亡（养母

张蕙兰因此精神有些失常)，所以他的心情很不好。他说：“本可带你出去上学，可你养母因拯仁夭亡受刺激太大，你走了她会更寂寞的，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他问了我北平上学交友情况，还谈了他对共产主义、对我党政策看法。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个好的理想，不但中国要走这条路，世界各国也要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出路。他说：我们是穷苦人出身，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我是一生闹革命闹出来的。你有革命的志向，但要好好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干好革命。世界上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从实际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当然走这条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的军事学就是打出来的。我身上的枪伤就是这种知识的文凭。另一种是靠读书、学习科学知识。不论干什么没有科学知识不行。打仗练兵没有计算也不行。你将来参加什么组织我不干涉，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基础知识。我一生就吃了没有科学基础知识的亏，你还年轻，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原本想遵照父亲的临别嘱咐，继续在北平读书，可卢沟桥的枪声，使我不能安坐课堂，却把自己的航程，驶向延安。

父亲当晚和我谈了许多，几乎一宿未眠。第二天，即6月29日，把他送上了胡佛号客轮。孰料就此一别竟成永诀！再见到的却是被敌人杀戮后，令人惨不忍睹的遗体。

血溅巴山神驰五岳功在国家垂青史；毕生忠烈情系三秦子孙图强慰先灵。

回忆我的父亲杨虎城

杨拯美口述：

我父亲杨虎城将军惨遭蒋介石杀害已40年了。在我们过着

幸福生活的今天，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

1936年12月12日，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集团卖国投降，推行不抵抗主义，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为敌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我父亲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出于爱国热忱，在西安断然逮捕了大卖国贼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乃被释放回南京。但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违背自己的诺言，随即拘捕了张学良将军，1937年又逼迫我父亲出国考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父亲曾多次要求回国抗日，愿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切。同年11月，我父亲满怀抗日救国的愿望从法国启程回国，谁料到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不久便被逮捕入狱。我母亲谢葆真带着年仅7岁的二哥杨拯中前去探望，也遭囚禁。从此，他们三人被国民党特务囚禁，辗转贵州息烽、重庆中美合作所等秘密监狱，过着非人的囚牢生活，十几年中受尽了国民党特务的摧残和折磨。在狱中，我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妹妹，产后也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我母亲对国民党的摧残、折磨忍无可忍，终于于1947年被迫害致死。母亲死后，我父亲十分伤心，将我母亲火葬后，随身带着骨灰盒，朝夕不离。在狱中出生的小妹妹无人抚养，只好委托和他同在狱中监禁的秘书宋绮云的夫人代为照管。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土崩瓦解、全面崩溃的局面。但是，蒋介石在他逃往台湾之前，密令他的特务把我父亲、二哥和小妹妹，从贵州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戴笠祠，用匕首残酷地进行杀害。我二哥当时

手中还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他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爸，刽子手的利刃已刺入他的胸膛，倒在地上死去了。他们随即也杀死了我的父亲。在狱中出生的年仅四五岁的小妹妹，来到人间还未呼吸过自由的空气，还未见过我们兄妹，就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伙吃人的豺狼，就是如此惨无人道地杀害爱国将领及其家属，真是令人发指。

我父母被捕以后，大哥杨拯民、大姐杨拯坤相继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我和三个妹妹跟着年老的外祖母相依为命，东奔西跑，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那时我外婆家也时常受到国民常特务的威胁，1948年我二舅父也遭国民党逮捕。西安事变时我只有4岁多，但当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也逃不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我上高中时，学校口试却要我回答“你的哥哥、姐姐到哪里去了？”他们妄想探听已经参加革命的大哥和大姐的踪迹。国民党特务还扬言：“杨虎城的女儿还在西安，斩草要除根”。他们的心肠是多么的狠毒！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漫漫的长夜里，在共产党组织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帮助下，我于1948年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使我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得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我还清楚地记得，1948年的一天，党组织向我转告，我的母亲在中美合作所牺牲了，并安慰我不要过于难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满腔怒火。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我们和广大人民一起，满怀喜悦，欢庆解放。我的大哥、大姐也随解放大军回到了西安，我们兄妹又团聚了。这时，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8月份我来到了中央团校，接受革命教育，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当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时候，随着重庆解放的喜讯，也传来了我父亲被害的噩耗。十几年来，我日夜思念的亲入，在东方欲晓

的前夕，终于死在蒋介石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连我想见他们一面的希望也化为泡影，真是使人悲痛万分。噩耗传到西安，我的兄妹痛哭不已，年老的外婆闻讯后气涌心头，昏厥在地，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不久便逝世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的大哥赴重庆运回了父母的遗体、骨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惨遭杀害的悲惨情景，真使人悲愤至极。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我父亲惨遭蒋帮杀害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1950年2月7日，在北京全国政协举行了隆重的祭悼，毛主席赠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发来了唁电，朱德委员长前往悼念。在西安各界人民也进行了祭悼活动。祭悼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我父母亲、兄妹和秘书宋绮云夫妇、随从副官等人的遗骸，礼葬在西安城南的樊川河之畔、杜公祠之侧的革命烈士陵园。我父母亲牺牲后，中央团校的党组织对我也极为关怀，在我学习的班级召开了追悼会，党组织安慰我鼓励我更好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我虽然因失去了父母而感到悲痛，但是恩人毛主席、亲人共产党对于我们的关怀和教育却暖如春天。

在党的关怀下，我们兄妹六人都健康地成长，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把我们兄妹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且培养教育我们相继参加了共产党，成为革命干部，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纪念母亲谢葆真

杨拯美口述：

我的母亲谢葆真牺牲在中美合作所已经41年了。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革命的。在她36年的一生中，经受了北伐战争的洗礼，西安事变的锻炼，国民党监狱的残酷折磨，在全国解放

前含着满腔的悲愤牺牲在国民党集中营里。

母亲出生在1911年，外祖父是商人，早年逝世，外祖母守寡抚养子女，生活比较艰苦。当时妇女进学校念书的人很少，母亲却进了陕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北伐战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她接受了革命思想，勇敢地走向街头游行、讲演，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记得在我童年时，外祖母经常向我讲起妈妈参加北伐军的情况。当时母亲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女，但她决心离开慈母和家庭投奔到革命军中去。她知道外婆疼爱女儿，舍不得她远离家乡。回到家里，她恳求外祖母同意她去参军，外婆虽然不懂得革命道理，但从女儿诚挚恳切的言语中，明白了女儿的行动是正义的，看到她的坚决劲，知道挽留也无用，就跟着女儿到学校去表态。当学校领导征求家长意见时，妈妈站在外婆的身后，拉拉她的衣角，外婆知道女儿的心思，表示支持女儿参军，不拉后腿，并亲手交给领导一双碗筷，请领导照顾年幼的女儿。母亲高兴地剪掉了辫子，换上了军装，离开了家人，随着北伐军走了，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女子宣传队担任宣传员。当时她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员，但革命热情十分饱满。在部队中，她什么都干，既搞政治宣传，也看护伤病员，和战士们一起吃饭、活动。后又被分配在第十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在部队中她和父亲杨虎城相识，当时父亲是第十军军长，他们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产生了感情，1927年冬和父亲结婚，在父亲所在部队进步与保守势力斗争中，母亲一直站在进步方面，积极支持进步势力。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集团卖国投降，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西北人民的抗日救亡

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母亲当时积极参加了西安的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将军被扣，父亲被迫和母亲于1937年6月29日出国，曾先后到美、英、法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华侨欢迎，每逢集会父亲都要讲抗日的道理，进行宣传。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我父亲曾多次要求回国抗日。同年11月，父母由法国启程回国，但一到香港就受到特务监视而失去了自由，父亲被骗到南昌被囚，当时母亲已带着哥哥回到了西安。父亲被囚的消息传来后，全家人都感到悲愤和痛心，母亲既痛心父亲抗日救国的壮志未能实现，又担心父亲一人坐牢，身边无人照顾，精神和身体上都将遭受很大的痛苦。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心到监狱去探望父亲。她也明知此去很难返回，在临行前，她和女友李馥清同志（共产党员）在一起谈了几个夜晚，流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衷肠和决心，打开箱子把身边积存的一部分东西捐献给抗日救亡运动。那时我和三个妹妹都还年幼，她嘱托外祖母好好照料。我还依稀记得母亲临行前带着哥哥到外婆家看望我们的情景，在外婆家的小庭院里，她看着我们姐妹四人玩耍，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带着哥哥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谁料想这一别竟是我们终生的永别。我父母亲被扣后，先被转押到长沙、益阳、贵州息烽等地，看守他们的特务队长李家杰很坏，经常进行虐待刁难，我母亲对特务很痛恨，经常痛骂他们，她质问特务：“抗日还有罪吗？！”特务被问得哑口无言。有次吃饭，饭菜难以下咽，母亲用饭碗打了李家杰，李恼羞成怒，进一步对父母亲打击迫害，强迫父母亲分居不能见面。母亲在狱中生了一个小妹妹，产后由于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加之特务的迫害，逐渐患上了精神病，病情日益加剧，虽经我父亲一再要求医治，但仍得不到医治。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父母亲又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监禁。在这期间，她曾进行过绝食斗争，终于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

折磨，特务的迫害，于 1947 年逝世。

母亲死后，父亲悲痛万分，经过再三要求进行了火葬。火葬后父亲把骨灰盒子带在身边，日夜为伴，连睡觉时都要放在枕边。1949 年 9 月 17 日，重庆解放前夕，父亲、哥哥和小妹妹被特务杀害时，哥哥手里还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子。

父母亲的遗骨如今已安放在西安南郊陵园。看今朝祖国大地万紫千红，阳光普照，父母若在天有灵，也应得到慰藉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作者=

页数= 2 8 1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经略西北
第二章	西安事变
第三章	欧美之行
第四章	囚禁岁月
深情缅怀	
附录页	

一、发起“中秋会”，劫贪官，除恶霸，声震四方
二、组织靖国军，参加北伐，卷入派系纷争
三、远走日本，养精蓄锐
四、离冯附蒋，经略西北
五、筹建反蒋基地，与中共蛛丝暗结
一、蒋介石完成“剿共”策划，内战危机空前
二、先“哭谏”，后“后谏”，发动西安事变
三、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
四、国民党耍手腕分化瓦解，西安城四面楚歌
五、投机者利欲熏心，杨母被扣作人质
一、陈立夫暗中策划刺杀未遂
二、蒋介石两次召见，明拉暗打
三、无孔不入，杨夫人上海遇险
四、调虎离山，被迫出国军事考察
五、遥望家国烽烟起，被羁他乡空忧愤
一、抗日心切，岂料甫归国即被软禁
二、要求一次抗战，加重一次惩罚
三、杨夫人主动陪囚，监中受尽非人折磨
四、狱中12年，把栏杆拍断，斗志难酬
五、一家五口被杀，蒋介石终报西安半月之仇

我的父亲杨虎城
回忆我的父亲杨虎城
纪念母亲谢葆真